

“中央宣传部”编卅五种

“四人帮”罪行材料

(供批判用)

“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上海市委办公室招待处 揭发“四人帮”王洪文吸工人血的罪恶

听了市委关于“四人帮”的问题的传达，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代表了我们广大群众的意志，我们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四人帮”一定要砸烂。根据我们去年在王洪文来沪期间接触到的情况，揭发如下：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二十九日以及七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五日，王洪文二次来沪，在东湖招待所共住了一百二十天左右，由于他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吃喝玩乐、铺张浪费，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吸工人阶级血的党内走资派。

一、对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冷酷无情。

他来沪时间很长，但从未看到他做什么工作，也从未看到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桌上仅有的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定稿），服务员每天去打扫卫生，看到老放着不动。本来这是送给他阅读出版的，可是他无动于衷，他对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同志们为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长寿健康，一直劝阻王洪文与生肝炎的儿子不要一起生活，但是他非但不听，反而十分反感，说：我不怕，有什么关系。还叫孩子在他一桌上吃饭，甚至孩子吃过的东西，他也拿来吃，还叫孩子和他在一个池里游泳。毛主席生前在上海的住地多次的请他去看看，他就是迟迟不肯去，后来再三督促，总算去了，但是根本不进屋里看看，只在园子里东转西转，打鸟玩。对其他党的领导同志也是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周总理病危，北京一再通知王洪文去，他就是不去。至于国庆二十六周年的活动，更不愿意去了。说明他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

二、生活上吃喝玩乐，奢侈浪费。

在沪期间，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据不完全统计，一百多天里，他家属和小孩一共五人，仅伙食费共用去了九千二百多元，除去警卫部队、工作人员伙食补贴、夜餐，他一家五口挥霍四千二百多元。他来的时候行李很多，什么鱼钩、鱼竿、猎枪、打兔子灯、一包包的钓饵……，不计其数，所以来了以后根本不做什么工作，他老婆也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一家大小成天吃喝玩乐，严重挥霍国家资财。他几乎天天睡到下午二点才起床，有时更晚，起来以后，吃完了饭，就打弹子、钓鱼、打野鸟、打野兔子、游泳、下棋、打扑克，一直到深夜。高兴看电影时就放电影，共放了五十六部，平均每二天一部，有的如《护士日记》连放二遍，到锦江等别的地方看的不算。电影的内容大部分是一九七五年前的旧影片。还假借“社会调查”、“检查工作”的名义，到工厂、商店、金山、崇明等地去兜风，车水马龙，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到那里，既不接见群众，又不谈工作，只是大吃大喝一顿，甚至醉倒，然后虚逛一圈，直到玩够了。有一次到警备部队去，吃了后还要发射火箭炮。这是国防上没有使用过的武器，一发要一千元，一下发射了十二发，让他取乐。甚至还搞了二挺微型冲锋枪，放在身边玩。打靶时

为了使孩子高兴，也带去乱打，浪费弹药。

王洪文一家吃的标准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还把岳父、母、舅子、朋友请来做客。平时经常请客吃饭，光是螃蟹，每次每人要吃五到六只，仅烟、酒、茶开支一千四百余元。当时天热，桔子水随便吃，为了保证他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供应要求，如田螺、海鳗、鹤鹑等，有时要三辆采购车专门为他四出买菜，特别是天冷的时候，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派人到冰凉的河里去摸田螺，另外还到出口公司专门去挑大的、肥的、好的鹤鹑和蛋，本来出口的，又去要回来给他吃。

三、对工作人员完全是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王洪文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天，他晚上玩，白天睡觉，我们工作人员整天陪着他，一直到深夜，白天还要搞卫生，得不到休息，但是，他连看到也不叫一声，特别是厨房的同志，更是辛苦，深秋夜里很冷，总要等到二、三点钟他吃了夜点心以后，才能稍微休息一会，第二天凌晨又得赶来为其子女烧早饭。对随身护士态度也是蛮横生硬，护士要他吃药就骂，甚至骂“滚蛋”。一次打预防针，每月应打一次，他不肯打，过几天又要打了，那时药已过期不能用了，他们夫妇二人狠狠训斥护士对工作不负责任。几个女的服务员同志都为工作难做而哭过。警卫处一个同志和一个老驾驶员为了开车让他打野兔，身上都留下了伤痕。警卫的解放军对他们看不惯，有反感，就一个不留的调走了。对工作人员象不认识的一样，直到离开，也没有提到要看看工作人员。

好多同志过去曾经接待过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象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还是没有碰到过的，因此同志们议论纷纷，十分气愤。

四、放任秘书为非作歹。

王洪文放任他的秘书廖祖康，权力过大，连他的老婆也叫他二首长。廖来了以后，又找来了一个秘书仇安帮，做他的小秘书。这个秘书说是来守电话的，其实是二个人搞在一起，也是吃喝玩乐，根本不守电话，不好好工作，而是开车到处鬼混，还要又麻将、打扑克，经常深夜吃了晚餐后到马路上去，到商店去，和营业员乱扯，包三角包掷着玩，还经常去演员齐淑芳的家里玩。有一次据王洪文老婆和廖吵架时骂出来，他们二人还深夜到华东医院把一个护士绑了起来。他们二人经常深夜回来，第二天也是起得很晚，由于搞特殊化，与其他同志有矛盾，就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吃饭，二人单独吃，专门为他们开饭。对服务员更加不看在眼里，想骂就骂，什么“屈死”、“阿木林”，弄得人家哭笑不得，都不愿干下去。

五、纵容老婆孩子搞特殊化。

他的三个孩子都已十几岁了，在那里无法无天，可以随使用车，二部机动车成了他们的专车。他们可以到厨房随便拿食品、点心、水果、桔子水等吃，好的吃，剩的丢，不知糟蹋了多少。警卫连长从园子里捡了送回来，叫人看了痛心。三个孩子不和，要分开吃饭，增加伙房的麻烦。有一次随使用王的名义打电话把警卫处刘副处长从家里找来了，王洪文根本不管他。有一次，王洪文把老婆丢在桌上的手表拿了到锦江去了，她发现手表不见就打电话到锦江找人回来找手表，说肯定是内贼偷去了，而且已转移了地方，要快报公安局；现在偷手表，将来还要偷文件！他的大女儿帮腔：“偷手表只几块

钱，偷文件是无价之宝”。闹得满城风雨，为此，变相对服务员搜身，污蔑工作人员，真是令人发指！而王洪文回来此事弄明白了，也不向服务员打声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

揭发吸血鬼王洪文的补充材料

1、伙食费（包括工作人员夜餐、伙补）	9207元
2、水 费（按三个半月计算）	1133.62元
3、电 费（按三个半月计算）	5295.60元
4、煤气费（按三个半月计算）	525元
5、汽车费（十七辆汽车）	5841元
6、煤 15吨	660元
7、415冷气开放	1000元
总 计：	23662.22元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王洪文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 × ×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张春桥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的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

注：这是张春桥写的《韩复榘》一文，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

韩 复 榘

张 春 桥

韩 复 榘 是 个 什 么 人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榘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榘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榘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象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注：即夏伯阳）。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作打二百五。）

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底“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材；相信梁作友那样的人了；相信相面的，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他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底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可惜的是，我从济南退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出更多的材料，更充实我底说明。只能在下面补充。

山东在全国抗战以后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山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

“九一八”以前，每年成群结队的人“下关东”，根据邮局的统计，只是旧历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就有三百万元从东三省寄回来，（带回家的不在内）使得山东很“富足”。

山东过去是在敌人底支配下，铁路，工厂，矿山，……底股票多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没人用最低的工价购买被农村破产推出来的劳动力，又用引诱人们吸“海洛英”等等手段把工人完全变成奴隶，而且使得劳动者一代一代的被奴役。

为了镇压中国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直接用武力屠杀山东同胞，造成五卅惨案。

“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在接连的水灾里，人民底生活就更苦了。一个农妇告诉我：神不保佑我们，叫我们受苦，弄得没钱烧香，他能怪谁呢？

如果在这里作民运工作是可以展开的。因为敌人底侵略给我们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虽然，北伐军到山东的时候，因为国共两党分裂民运工作没有作得好，虽然，山东过去离皇帝很近，后来是被军阀统治着，被麻醉得很厉害，虽然因为这些原因山东民众失去了“强有力的”自动性。

“八一三”后全国抗战发动了，韩复榘不应当起来准备作战吗？——青岛随时都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的。自然，应当准备的，就是一个封建军阀吧，为了保守自己底地盘也应当准备作战的。何况韩复榘有过很好的表示，象对西安事变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优待东北大学南下请愿的学生等等。又何况这时候全国上下都在蒋委员长领导底下对日作战了呢？

韩复榘怎样办的

敌人在河北作战的时候说：只打二十九军。进攻太原的时候说：只打山西以便进攻红军。自然啦，是不打山东的。你看，青岛是平安无事的。据说：敌人还答应韩复榘他存在日本银行的钱，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仍旧归还。

于是，韩复榘就平安地在济南作皇帝。他好象不知道这话是假的，而且非常相信。冯玉祥先生去津浦线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不听指挥，李宗仁先生要求换防也未能圆满解决。

我们住在济南的人，真是“幸福”，敌人底飞机不断地来，却从来没投过弹。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的时候，我很“恐怖”：济南很和平。到后来，我对于山东军政当局不敢信任了，不但我，都知道韩复榘已经成问题。虽然，韩在自己底报纸上怎样宣传自己底决心。

这时候，韩把少爷送往香港，太太送往西安，并把没带走的衣物等等，送往曹县，派国术家保护着。

像连阴天样倦人：韩复榘预备怎样办呢？

飞机来，不轰炸。有一次，丢下一枚手榴弹，济南防空司令部底高射机关枪向敌机射击，事后，韩发脾气：越打越轰炸！敌人更聪明：当晚北平广播电台向韩道歉！以后，敌机真没有轰炸过，丢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传讯的铅筒，内容据说是“荒谬的信件。”另外，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流氓到过济南没有，也是值得注意的。

敌人尽量的玩手腕，来骗他。他也是被骗到底。

已经到沧州了，政训工作还不曾作，韩说：战事到鲁境还不迟！已经到禹城北部徒骇河了，他相信敌人只打山西，不打他；津浦线只有敌人几千人，他放着自已底十几万队伍不反攻。等到敌人占领太原后来攻他，他就会把四五万人丢在黄河北岸炸毁洛口铁桥。这时候，该知道敌人不是不打他了吧，他却又相信起敌人不过黄河！听说，他每天请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替他算卦，结论是“敌人绝不会过黄河！”好吧不过来就好。

“政训处长是共产党！”是济南各机关的人都知道的。为了防止政治工作人员的活动，他一方面派人下去监视，一方面下命令说：不准作任何党派活动。政治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受到各方面的阻碍，不是无因的。这里，他是皇帝，国民党的同志们也不能自由地工作。别的人，一直到后来枪毙人的时候，连汉奸在内一律称为“反动分子！”

政训处的同志们把济南的日本财产没收并分配给民众了，韩说：他不负责。北平广播说：济南侨民财产被抗日分子及共产党没收了。

“天下太平！”

隔着黄河双方互相攻击着，炮声每天不断。敌机来，不轰炸，所以也不发警报。“幸福”的人们，每天在街头逛戏院里人挤不动！

济南是太平的。所以连保安队也用不着了。韩为了补充自己在黄河北岸的损失，缴了枪改编成他底补充团。他忘记了济南距离前线只有十几里，汉奸随时都可以暴动，使济南陷落这还不算，他把几县的人民自卫枪支也没收了。那些带枪来的壮丁呢，放在最前线，他自己底实力却调在后方休息。

民众们都想起来，在最初。后来，他们想说：“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吧！”他们日日夜夜地受着扰害。虽然他们也知道还有好的军队，也是中国军队。他们有自己的枪支，在鲁西，每县平均有五六万枝枪，很多是过去从军阀军队中里夺来的。但是，有些作政治工作的只是为了吃饭，逃难，（跟着军队容易跑）他们眼里没有群众，他们把群众看得一钱不值。有的想作，又怕“党”“派”的帽子落在自己头上！

大家只是等着敌人来，他来，咱们就走！

我想起普里波衣底小说“对马”来，普里波衣同志写出了沙皇海军的腐败，我觉得第三集团军的某一部份人比他们还腐败些，怎么能够跟敌人作战呢！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而且一直退到兖州，使敌人威胁到战略的中心——徐州。

枪毙韩复榘

退出济南的时候，我是知道济南要失守的，除非枪毙韩复榘，彻底改造第三集团军或由别的有力部队接防。这是经验冀察政权存在的时候，冀察两省的同胞不能进行武装对日战争，现在却可以了。同样的，在韩复榘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底统治之下，民众也不能进行武装对日战争，事实也证明了我底话：合众社底消息说：山东已经发展了一百万人民自卫军！

现在韩复榘是枪毙了！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也证明了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决心改造已有的军队，就是说在现在军队的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军！我们拥护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底判决，并且要求把同韩复榘一样的汉奸卖国贼处决，不要使他们混在我们底阵线里！

我们想一下，芦沟桥事变以后因为政治上的问题，使军事失败的事实吧，宋哲元，刘汝明，刘多荃，万福麟，……等错误底，是我们最痛苦的回忆。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们主张：“甲，在各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达到下列目的：（一）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二）改善军民的关系；（三）改善官兵的关系。乙，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教育与纪律统一的装备与供给。丙，改善军事技术与指挥。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改善与扩大军事处政治的学校。戊，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

希望继续韩复榘领导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先生和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先生将军队和政府机关提高得更适合于战时，把山东已失的地方收复过来。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

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看了简报，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我还是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上面这句话以外，马克思的这段话本来用不着选入了，就是为了这一句。因为那段话当中，别的意思在其它选入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地方已经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特别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敌人。当然，这两条是主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要动摇。而过去我们部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里面出现的。不管地主阶级的武装，或者资产阶级的武装，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今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因为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打碎了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呀？因为就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八个小时，机器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得多。其实，现在也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用占训练和其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要搞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

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我觉得这股劲要用在多花时间学习。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他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学习。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不重视理论学习问题，我这个军区，就让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学习以后，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必须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不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地讲，要学习理论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后，七〇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又学了。但已经变成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干部。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的。群众中传达主席的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们也传达得早，他们学习认真，动脑筋，联系实际学习马列。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说了多次，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上的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提出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说“一小部分”。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这是主席在六九年讲的。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不行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不会去传播的，但印了中央文件。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他们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脱离了群众。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回忆打土豪时，搞到了一匹布，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做衣服。现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我

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有的人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他们不会接受马列主义的指示的。我觉得不下决心好好地学，搞一阵子是可以的，甚至于你可以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没有真正理解、懂得。那样学下去，除了领导干部学不好，而且也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他们在学习中的问题比较深，他们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那些地方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银行是主要的环节。当然，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管起来行不行？他们研究列宁当时是怎样做的。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你就不懂得呀，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支持了。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反对现状作比较系统的调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能够加深理解。其它问题比较好解决。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等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象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也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除，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它的具体意见，用不着多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不对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商量商量。

张春桥写的一首反动诗

注：这是张春桥写的一首反动诗《俺们的春天》原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四期。

附件

俺们的春天

张春桥

大清早：太阳还没睡醒，
 朦胧的天上挂着些花，
 高楼吻过黑夜还恋着星，
 烟筒张开了粗大的喉咙，
 把都市底动脉喊得乱动。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街上只有俺们一伙，
 像一排犯人样走着。
 大家有些娇傲：
 “咱们是长在大地方的！”
 说起这真是笑话，
 这地方简直像个戏台：
 刚刚下去一群，一群又上来，

像件死了的机械，
 就让白天里楼上吐出
 个没名的歌调，
 落在俺们底心上，
 像微风吹过一样，
 俺们没见过春天的，
 春天只走到楼上。
 住在地下层的黑鬼，
 只能挥着黑的拳头，
 从早晨到明日连成条线，
 从一年到没数的年，
 眼前是皮带、马达，
 手里也是那东西，
 也许你有些不信：

“那里能不休息？”

实在不是谎话，
 俺们就是这样，
 一直死到里面，
 像死去只野狗，
 埋了春天和秋天
 （到底有啥分别呢？）
 很久以前的时候。

现在都忘了那些事，
 （俺们也见过春天吗？
 现在谁也忘了）！
 可是还都希望回来，
 满树的春花齐开。

张春桥早就是地道的投降派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直指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中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他们“国防文学”的路线。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见《且介亭杂文末编》）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辛辣地讽刺了根本没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说的“我们”是指当时的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阵营中的蛀虫。

这是四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当时周扬等四条汉子配合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打起“国防文学”的黑旗，围攻鲁迅。鲁迅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鲁迅致王冶秋同志的信中说：“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一篇就是《三月的租界》，另一篇是《〈出关〉的“关”》（见《且介亭杂文末篇》）。在四十年前的这场斗争中，张春桥是王明路线的走卒，和陈伯达、周扬等四条汉子是一丘之貉，是围攻鲁迅的凶恶打手。张春桥的这篇反动文章充分暴露了他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丑恶嘴脸，说明他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宋江式的投降派。

现将张春桥写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和鲁迅批评他的文章《三月的租界》一并印出，供批判张春桥用。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狄 克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

——约瑟夫——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

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励作者，对于他们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作者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傲了！假如果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别外一部，（二）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我（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判！

（抄自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上《火炬》星期文坛栏）

三月的租界

原载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期，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

“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注：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三六年写的）

廖汉生、詹大南同志在南京军区常委 扩大会上揭发张春桥的罪行

廖汉生政委、詹大南副司令员等揭发了“四人帮”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肆挥霍国家资财，贪婪地吸工人血的许多事实。张春桥的女儿结婚，请了五十桌客，收的礼物有西德进口的二十九吋电视机两部，国产电视机七、八部，可以开一个电视公司。王洪文在上海有十辆小汽车，六七十名服务员。开“十大”的时候他叫锦江饭店做法国菜，用飞机送到北京，第二天又叫上海派飞机送中国菜。徐景贤选了三百多部旧戏影片，什么《大劈棺》、《纺棉花》，乱七八糟的都有，送到北京给“四人帮”欣赏。上海市委还花了几千万外汇，买外国的黄色片，供“四人帮”寻欢作乐。到会同志极为气愤地说：“简直比外国皇帝还厉害”，“要是能到美国去，张春桥的女儿就是孔二小姐”，“张春桥讲土围子，他们就是土围子”，“姚文元讲暴发户，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发户”。

江青投降主义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

——吹捧投降派宋江是“英雄人物”

一九七三年一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一行九人来华学习舞剧《红色娘子军》。清水来华前，受日本国际放映公司委托，要求为该公司拍制《水浒》电视片学武打动作，以便回去传授。友协与有关单位研究后，认为拍《水浒》电视片，问题复杂，以教授旧戏武打实有困难为由，婉拒了。但江青别有用心地对此事异常热心，亲自出面积极支持清水协助日本三公司拍制《水浒》片，下令调天津京剧团张世麟来京为清水专场演出武打戏。江在文件上批：“天津的张世麟我们一直保着，叫他练功，教我们的子弟，如果他正在练功，那他的武打戏是很可以看看，可以组织内部演出”。她还特意为清水安排观看《盖叫天》舞台艺术影片，并向清水亲口答应复制一部十六毫米拷贝赠送，还要送《野猪林》影片，帮助松山芭蕾舞团学习武打动作。

二月二日晚，江亲自同张、姚一起陪同清水一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张世麟演出，席间，江向正在创作《水浒传》曲谱的日本朋友宗象和谈到，宋江是农民起义领袖，后来招安了。据此，外宾认为江青是把宋江看作“两面派人物”。接待小组将外宾这一反映编入接待简报上送。江看了这一期简报，突然变卦，嫁祸于人，说她根本没讲过宋江是“两面派人物”，下令追查是翻译翻错了，还是简报写错了。江并就此事亲自在二月二十二日召集中联部、外交部、友协有关负责同志开会。江在会上极力吹捧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应充分予以肯定”，并为宋江接受招安、搞投降，百般辩解，兜售“投降有理”的叛徒哲学（详见林丽韞同志整理的江在会上的黑话记录，附后）。江当即指示要向外宾更正。因清水一行已回国，即电告我驻日本使馆，派人向清水解释：宋江是“肯定的英雄人物”。

此后，日本国际放映公司等三公司，很快把《水浒》中的主要故事拍制成电视影片，替宋江之流大肆歌功颂德，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止，共分二十六次，在日本电视台上演，每周一次，长达半年之久，并向香港、东南亚等地发行，流毒甚广。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如此吹捧宋江，对将《水浒》搬上日本电视屏幕如此热心，完全暴露了江青这个投降派、卖国贼、民族败类的丑恶灵魂，说明江青和宋江是同一条藤上的两个黑瓜。

二月二十七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白土吾夫来京反映，日方拍制《水浒》片的政治背景有日修插手。友协当即上报了中央。中央召集部分政治局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在会中，江青感到自己答应帮助清水出了问题，摇身一变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未承担什么责任，也未对他们许下什么愿”，欺骗中央，推脱罪责，并企图嫁

祸于人，手法极为恶劣。当时会上，中央决定我不介入此事，《盖叫天》影片不送清水。去年清水还来信催要此影片，信中说，《盖叫天》影片是江青亲口答应过的，希望早日送给他。我们没有给他。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江青吹捧宋江的谈话

江青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同中联部、外交部、对外友协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美化宋江，现将这次她的谈话摘录于后。

《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宋史》上《侯蒙传》就有关于宋江的记载。

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宋江等农民起义的领袖。对宋江首先应加以肯定，然后再分析他的阶级出身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在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积极方面，应充分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应看到宋江由于出身于地主阶级，有阶级的局限性和动摇性。他有一种正统观念，认为不能反皇帝，以至对皇帝的招安抱有幻想，认为可以戴罪立功，可以不犯法。宋江上梁山，不是轻易上去的。在杀阎婆惜（他杀惜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后，他起初宁愿被刺配到江州，也不愿上梁山。后来统治阶级要判处他死刑，他才下决心上山。林冲也是如此，他被迫害充军后，由于高俅派陆谦火烧草料场，谋害他的性命，他才被逼上梁山。在这一点上，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人不一样，他们是反对招安的。李逵的性格不象宋江那样复杂，他心直口快，坚决反对招安。《水浒》的一百二十回本中谈到李逵反招安，要造反。但由于他对宋江死也要跟着，所以宋江接受招安，他只好接受。

对宋江接受招安，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当时，宋朝受辽、金等外寇入侵，需要抵御外敌。宋江接受招安，虽然反映了他的动摇性，但不能因此说他是两面派人物。金圣叹对宋江采取了憎恨仇视的态度。他的节本损害了宋江的形象，而且还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说梁山泊的英雄全被杀了。李希凡就不同意金圣叹的本子。还有一出戏叫《白水滩》，是续《水浒》，但写的不象样子。

解放以前，描写宋江的好戏不多，《浔阳楼》应该是一出好戏，宋江在那里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但一直没有排出好戏。

《水浒》这部书写农民起义，但只讲建立一个政权，即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乌托邦的幻想，但也不完全是幻想，《宋史》上有。

我们不能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有历史的局限性，在这方面《水浒传》七十回本把后边的删掉了，反而看不出农民运动的全貌。他们有些人就向统治阶级投降了。如宋景诗，他一生与地主斗，但以后被迫投降了。这一点不必回避。回避这个问题就违背历史。

九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

江青：这个材料里头可能印的有赵纪彬写的《孔子杀少正卯》。他是很用了功夫的。我看了两遍，我个人啊，用了工具书，还是没有完全看懂，因此暂时不发给同志们，但是那写批判文章的地方，我们准备发。这个材料里面没有印好，没有推荐。但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因为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的。赵纪彬，教授吧？

迟群：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刚才总理的这个材料，就是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中发〔74〕1号文件，这个材料的产生过程，简单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似是而非。

谢静宜：也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议，我们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

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一些提法，作了一些指示。

谢静宜：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这样以便大家好理解。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那就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这样，我们遵照这个指示，以后，我们又回去研究了。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待会儿，卡片的问题，迟群同志还补充，所以后来又写了解释，包括前言怎么写，封面怎么写，都指的很细的，内容更是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象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水平是有限的，很低呀，学习也不够，还有很多不妥的之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再修改。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现在已经通知了。

迟群：通知了，现在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谢静宜：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同志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

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江青同志同意了，象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此外，就是为了搞这个材料，我们一些工人同志，就是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两校它是应该的了，它是印刷厂了，随叫随到，有的是昼夜地干，有时因为为了审查清样，要求都比较严格的了。

江青：我的材料是这两个学校昼夜赶出来的。这两个学校的印刷厂，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昼夜赶出来的。春节没有按照旧习惯过，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要感谢这些印刷工人。

迟群：还有新华印刷厂，也是春节期间，是大年三十都一个一个找来的，一要就是很多的，其中还有个别的，任务不太重了。但是科教组的这个印刷厂也参加了的。这些同志休息的很少。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水平所限，对于一些指示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不妥当的地方是会有有的，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必将使这份材料逐步地完善起来。另外，据江青同志说，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也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再一点，汇报一下，我们和谢静宜同志带着江青同志的那个信和材料

江青：还有党校的班子。

迟群：到二十军的防化连去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那个材料，当时批的那个材料，都是反映了这个连队它对批孔这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谢静宜：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事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谈了。

迟群：这是到的这个军，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当时那个群众的心情哪，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连队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批林批孔，中央领导同志都这样的关心，而且派专人来送信，送材料，特别是亲自给我们写信。他们谈到，这真是雪里送炭，那时正好是他们在研究批

孔问题，是及时雨，是对部队批林批孔的很大推动。当时他们在座谈当中都说，林彪一伙和孔孟一样，他们根本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们的中央的首长，时刻都想念着，想着我们战士，关心我们的成长。所以当天，（那连队九点熄灯）后来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睡觉，大家因为都在看材料，都觉得非常好，很兴奋，有的在写决心，表决心了，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座谈当中，使我们也很受教育。就是说，战士们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许多问题不象我们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好象那么样的愚昧无知，好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个权威们，才能够去批。他们很概括的，很简练的说清楚了一个问题，说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个人是一样的。很简单。而且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是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大家的认识，谈的一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军里头一些领导同志了。这件事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高级干部，一个领导者，怎么样经常地议政，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怎样来议政，怎样抓大事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谈到怎样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说问题就在我们鼻子底下，但是我们无动于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样的忙，还发现了我们一个连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大事。我们却不敏感，说明不深入，政治上缺乏敏感，作风上不深入。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批评，这样一些认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当即说是我们马上就改，当即就把信的精神和材料，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当天就发了电报，噢，第二天就发电到各师，传达到团，到基层。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了二十军，也在整个军区来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对这个材料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搜集意见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战士们能不能看懂，我们调查了九个班，九个班七十九个人，绝大多数的是初中以下，初中以下的，或者说高小的占多数，初中以上的占少数，初小和文盲的占少数。那么这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一个人，他们粗看了那么一次到两次，他们就说可以懂，而且可以批得起来，那非常好。因为过去光说是批林，还得批孔，说是林彪到底有些什么孔孟的语言，找不到，这个材料非常直接，非常好，孔老二怎么讲的，林彪怎么讲的，林彪有些直接的语言、间接的语言，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靶子。七十九只有八个人，看了以后觉得难懂、看不大懂，但是后来呢，各种程度的同志搁在一起，他们一边看，一边议，就是一个班的战士，他们互相这么议论，也能够批得起来了，也能够领会这个材料里边所说的意思。所以他们最后在看到材料，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刚开始他们粗看了那么几次，议了几次，他们就谈了自己的体会了，他们说确实是批孔是批林的继续和深入，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位班长，八班的班长，他说：“批林必须批孔，锄草必须刨根。批林不批孔，流毒难肃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当批林批孔的闯将，要作批林批孔的尖刀子，用实际行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谈的，我们认为谈得都比较好。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把这个点上

的情况，因为这个点在陆陆续续地还要往上报了。当时，材料里讲的是高中了，好象只有高中生他们能看得懂，就是能够才能批孔，就是初小的呀，什么文盲，现在所谓文盲，我们到连队了解，就是说入伍的时候是文盲，现在已经都能够写家信了，恰恰这些同志呢，是可以看得懂的，可以批得起来的。

谢静宜：人家批得也很好，不见得比那个高中生就批得差，而且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初小的，还有一个文盲，就在当场我们认为他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认识得很深。

迟群：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要批孔，就是说，批林同批孔的关系，这个因为给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有些意思，我们丢三拉四，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简单谈那么几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了，因为主席对这个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从《新民主主义论》里头，那里头有很多批孔的指示的，以及以后组织的，解放以后组织的几次批判《武训传》哪，什么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问题，批胡风等等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在去年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来批孔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孔子，他所顽固推行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是孔子，他是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孔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政治路线，他的理想就是要拚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一辈子，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结果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了，淘汰了。孔子是两千多年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被称作所谓圣人，封建地主阶级在孔子的时代，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本来它是孔孟所反对的，可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外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一个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的去革命。他们就要反对变革了，他们就要强化和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随着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同孔孟所主张的复古倒退、反对变革，维护和挽救旧制度的思想路线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汉朝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发挥，这样，就使孔孟之道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段话是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的那个题解里头有一段话，是主席解放以后讲的，就是说是五八年武昌会议上讲的，但是是在四卷的同斯特朗谈话的题解当中写上的，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这些剥削阶级，他们为了拚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镇压人民，它们就要大力地吹捧同它们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路线，孔孟的政治路线。那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张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的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人民革命，所以孔孟之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三座大山的一个精神支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席

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很多。这样一个阶级斗争规律，在我们党内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具体的阶级内容。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头专门提到这段话，点出了历次的机会主义头子。譬如说，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话，他孔教之今化，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所谓共产党人，这是孔教，孔子那一套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怎么搞共产主义呢？并且说，孔孟是优秀分子，恨不能发展他们入党了。孔子有没有价值呢？他说，我敢肯定说，有。王明讲什么呢？王明称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苏修那里头骂我们，写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文章，最近他还写文章吹捧孔子为堂堂夫子，宣扬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仁爱等等。刘少奇他在二五年从那个，他就是自首叛变以后，他出来以后，六军阀还给了他“四书”，带着这“四书”，爬出了狗洞。五一年他到曲阜去朝圣。六二年又修改他的黑《修养》，推行孔孟之道，他说，孔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要祭祀他。不光他自个要，还要叫人民政府、全国人民来朝圣孔子。林彪是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同志要是在会上给大家说那么几段，我们自己理解的水平不够了。先说这么几段。这个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里头有一个对比，林彪和叶群有这么一些个话，就是他们写的条幅，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这一个条幅挂在林彪的卧室里。就在同一天，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条幅，赠给了反革命分子叶群。这就两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号，又写了一条，就是，这是反革命分子叶群写的了，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育容就是林彪。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号，还有一条，是林彪又赠给反革命分子叶群的，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多了个“唯此”两字，“育容书赠宜敬”，宜敬就是反革命分子叶群。“于苏州”。这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家伙连续地写下了四条。孔子他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自己，克己复礼呀，使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于周礼。他所讲的周礼就是讲的西周，因为西周是奴隶制最兴旺的时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制，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关于仁，在这个名词注释里头讲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要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什么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呢？他们互相赠送这样的条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头等大事就是叫作复辟。在现在来讲，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它并不是要复那个周礼，那一套东西，而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值得注意，当时的背景是，我党召开了“九大”之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里头搞的。还有一条，就是材料里边，二十四页里边所谓讲绝了的问题。他们在黑笔记里头，有这么一段，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例，绝则错，什么例子呢，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赫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

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反革命分子叶群她亲笔的笔记，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之间的。）象他对比之话，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仲尼”，讲的是孔子了，“不为己甚者”。就是说孔子不做太过份的事，不做绝了，是一样的，那么对于林彪他所讲的绝，我们也得给他加以翻译，他所谓的大胆肯定必有恶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革命，不能够造反，不能够反潮流，要这样做那就必然有恶果，这就叫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他讲“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是谁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家都知道的贝利绍娃，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支持的是什么人呢？支持的是苏修的特务。说“对赫骂绝了”，对赫鲁晓夫骂绝了，怎么骂绝了呢？当时赫鲁晓夫他们到我们国家里来，搞什么呢？说是要提出来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他们的阴谋是要控制我们。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现在的事实、别的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主席说，我们自己搞。因为他们要想搞合股一个公司，实际要控制我们，主席说我们要自己搞。他们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合起来搞，就是要控制我们，主席说，要搞，我们不要了。你不是要搞什么共同舰队吗，要搞我们一些个沿海，要控制我们整个沿海。搞长波电台，主席说我们不要了，上山吆。同志们，知道上山是什么意思吗？主席当时讲的上山，就是要上山打游击，要揍他。所以林彪在这里说，骂绝了，对赫骂绝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要控制我们，要颠覆我们。我们主席顶了他，同他们斗了，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党不变颜色。“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就是对王明，王明他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后来从苏联回来，又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主席领导全党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算了他这条错误的路线，保证我们党沿着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怎么叫乱了套了呢？说明林彪完全是站在王明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一个立场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于大公做绝了”，大公就是苏修，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什么做绝了呢？他们把专家撤退了，把我们那一些个项目工程搞了半截，他们就甩手走开了，甚至于把一些个图纸都拿走了，他们这样的整我们，想卡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搞得更好更快。所以，他这些黑笔记里讲得做绝了，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主席，反对我们主席的路线，反对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说的。

江青：也反对全国人民噢。

迟群：反对全国人民。

江青：也卖国嘛。

迟群：还有材料上林彪有一句话，是六〇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里正好对比着子曰，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就讲的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林彪讲的两斗皆仇，这完全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混水摸鱼，他骗人的，他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所谓斗，我们有两种性质，一个同阶级敌人斗，一个还有我们队伍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斗争问题，这样一斗就是仇，仇人了，敌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分裂了我们一些革命的队伍，所以我们且不要上他的当，被他分裂了的地方，我们要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两

和皆友”恰恰刻画出这一个右倾投降分子的一个面孔，他要谋害我们主席，要谋害我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砍我们的头，那里还有和呢？完全是骗人。后边一句话也是给他作了注解的，说“勉从虎穴暂栖身”，后边的话就不读了，这是抄录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

江青：后边应该说，这一首诗呀，他用了，恰恰是刻画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你得都读，因为到会的同志没有拿到这个。

迟群：“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二十七页第六个问题。“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一个条幅。

姚文元：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自我暴露他怎么搞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除了改了一个字之外，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

迟群：刚才文元同志讲，就是他后面那两句，特别后边那两句他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除了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暂栖身，原来那个《三国演义》上叫“趋身”，就是趋向的趋，“暂趋身”，他把个“趋”字改了个“栖”，栖就是住的意思。两栖动物那个栖。

江青：这一段要文元同志解释。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迟群：那就可以了，我就不解释了。文件里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就不多说。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个时候就是搞《“571工程”纪要》的时候。《“571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江青：七〇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林彪呢，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四书五经他也没有看，但是为了他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派的这条路线，所以他就找了一伙子人，为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

抄，搞了大量的卡片。这卡片上他们还有一些记号，批了一些话。

江青：我补充一句。主席说，才不要迷信他什么读了什么什么孔孟的书，他才不读书呐。这个话原文就在这个地方。哎，林彪是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是我们主席讲的。

迟群：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彪的黑窝去，我们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有四十七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们就在一些卡片上写，“两分法是思想水平低”，他们宣扬世界上一切等于一锅粥。屁也不懂，这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他是为了搞阴谋的。他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它的界限，他们利用历史来反党，进行阴谋活动。譬如说，他抄录了德国俾斯麦的反动言行，德国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头子了，一个首相了，所谓基辛格所崇拜的一个德国首相了。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剥削阶级统治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怎么上的台，怎么下的台。他利用语言文学，来进行反党活动，等等。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事情都使人很吃惊的。

江青：我想提几条给同志们，很简单了。林彪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吗？他有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孔孟呢，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必有王者，就是说出一个人材了。“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出名在世界上。这是他们的罪证。我们的主席怎么批他这一段呢？这说得过份了嘛，根本没有天才。这个我不讲，就是说他说得过份这一点，我来补充一下，我所听到的，可能不完整，和主席的意见，全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十九世纪就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不是不是几个世纪吗？而且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了一个，为什么这么自卑感呢？中国就在二十世纪初吧，还出现了孙中山嘛，主席举了，还有洪秀全嘛。洪秀全，同志们知道吧？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个还举了几个，我一下子都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他这个他这几句反革命的话，对中国人说是踏到地上，外国人他也说的不对，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因为中国人人家讲我们是东亚病夫嘛，过去，帝国主义，他接过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因为许多同志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外呢，林彪的这个政治纲领啊。除了设主席以外，就是天才论了。他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文件上发了，孔孟怎么说呢？孔孟说，“不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是说没有君子，就不能统治咱们的劳动人民，而没有劳动人民呢，就没有人养他那些鬼君子。这就是他们一个鼻孔通气。我们这儿，他们可能没有准备，我就提一下。

迟群：这些卡片中有一些个目录上面写的“上下关系”、“干部政策”、“追求真理”、“有勇有谋”、“辩证法”、“唯物论”等等。原先我们认为这后边都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主席的一些话，结果一翻呢，下面都是子曰。他的干部政策也是子曰，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子曰。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一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也写到这就是辩证法。还有他的所谓唯物论，是“顺天者存，逆

天者亡”。这就是唯物论，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江青：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不足，我要再说一下。林彪啊，对秦始皇，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孟呢，“秦……重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这是董仲舒的啊，就是汉朝的那个天下一孔孟，这个家伙。那么我们的主席怎么样驳林彪呢？我们的主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个大概因为还在档案馆了，是为了搞专案才弄出来的。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现在苏修、美帝大骂我们批孔啊，蒋介石最近他们又祭孔了，还有香港有的教授抗议呀，说我们批了他的老祖宗啦。我们的主席是有这样的气魄的，实质上我们的主席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民愤甚大的、有血债累累的，你要不杀，群众起不来。我就土改的时候就杀了一个恶霸，不杀他群众起不来。在全国范围，我们有几亿人口啊，还是比不上秦始皇呐。同志们请算一算这个比例噢。我们现在是几亿人口，将近八亿了吧？总理，算八亿了。看那个时候只有多少人口啊？这当然要去问问我们的老先生们，查一查，因为汉朝有人口的。唐朝好象只有六千万，秦更少了，连年战争嘛，又是从奴隶制转到封建制，所以那时人口是很少的，恐怕还比不上咱们现在一个省啊，这是个比例啊。我们的主席对于重要的案犯都不准虐待，养着留活口供。同志们都知道，这个传达，不许逼供信。所以在这儿主席这样子是驳那些资产阶级谬论，才这样说超过了一百倍。

迟群：他这个唯物论里边还有一句话，他们引的卡片，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余所在。”就是说他的唯物论就是说要说假话，说了也可以不去做。还有他在所谓“组织观念”这一个栏里边，他们引的孔子的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是什么呢，组织观念呢，就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天子要是宴会的时候，要找人唱，载歌载舞，天子找的是八排八个人，就是跳舞的，八八六十四个人。当了诸侯呢？就得降一级，就是六排六个人，六六三十六。那么到了大夫这一级呢？再往下降，只能是四个人，四排，四四一十六。后来慢慢地这个地主阶级慢慢地兴起来了，这时候下面就不管那一套了，连个大夫一级的，他也来了个八八六十四，他也不管你什么四四一十六了。所以关于这个林彪把它弄到组织观念。

江青：天子，天子，八佾之舞，六十四。

迟群：八佾之舞是指天子，六呢，是讲的诸侯，四个是讲的大夫。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些东西归纳到组织观念，这林彪。还有“坚持真理”这一栏里边，他引了孔子的话，叫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蒋介石他们经常鼓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追求真理。

江青：蒋介石老说的。

迟群：这是他们引的是这一些了。还有他们在论学习的这一

江青：他（指蒋介石）的老婆子当时他们那些人跑到那个岛子上去了。他们张灵甫

也不是，《南征北战》的张灵甫也没有成仁，那是歪曲，张灵甫是被我们的战士打死的，因为他杀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战士气愤不过打死的。当时要为了使起义的人能多一点，所以就歪曲了这段历史。今后至于《南征北战》我们就要改回来，他是投降的，这个样子的。张灵甫啊，孟良崮他的王牌军队，我们的粟裕同志还在嘛。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我们的主席和中央要他撤，我们的战士说打了胜仗还要撤，不哪。当时中央、主席坚决要撤，要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歼灭敌人，这个王八蛋，张灵甫啊，杀了我们的人太多了，战士打死他，应该原谅这个战士，违反了主席的俘虏政策，不是一个战士，好几个人。王牌军啊，蒋介石替他，替戴知琪开了追悼会的，都是他的王牌军，全副美式装备，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迟群：林彪在论学习的这一个栏里边，摘了孔子的这样一些话，论学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学习，“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嘛，就是金钱啦，地位啦。还有，他们在一些卡片上搞的批语，他们批些什么话呢？我也摘了一点，相当之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句了。他们批的是这样的话，“古皆真话惹祸。”就是从自古以来，说真话的，都要闯祸的，都要惹祸的，都要惹祸的。“好坏正义，非正义，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就是朋友，不利就是敌”。他们还胡说八道，说“生产前必须生活，生活前必须是肉体的存在”。（共产主义只讲生产，未从根本上说起）完全是胡说八道。再就，他们还写了这样一些话，“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这回找着根子了吧。“懂决心方能当统帅，统帅是决心帅也，希特勒未当好大统帅也。大致艺术不差，只差一字之差，所以才复国旺盛。”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决心。另外，还有的讲，他们还在卡片上题的三保：“要保官、保产、保命。”另外还讲，说是德国那个反动首相俾斯麦，他只有用轻蔑的眼光和铁的手腕来对付人类。

江青：俾斯麦，德国的，镇压巴黎公社的那个宰相，德国的，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迟群：还有他们讲所谓的养身之道，说，他们写的“口张言少”，口嘛就是嘴，言少，说话少。“心中事少，肚中食少”食就是饮食的食，吃饭的，食少。“子言虽少，以此事少，神仙可了。”胡说八道。另外，还批的三声好听，有三个声音好听，书声，就是诗书的声音；歌声；小娃声，娃娃的声，小娃声。唇是圆的，嘴唇是圆的，天是扁的，天空是扁的，话是转的，说话是转的。他因为对这个他有好多的批法，还说“嘴是扁的，嘴是扁的，舌是圆的，舌头是圆的，话是转的”。“人情大于王法。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他们还有一句话抄的，叫作“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非常之重要，这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还搜集了一些所谓一些语言文学里头一些话，象什么，他专门搜集这样的东西，叫作成语，里边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等等。还有什么“辣手造乾坤”，辣手，就是手段要毒辣，才能造乾坤，说的就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了，等等吧。所以说，林彪是历次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所以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批孔，中外反动派都在反对，蒋介石他一直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这我们大家都了解。最近，蒋经国又在说，今天批判孔子，（就指

的我们现在批孔)就是批判中国文化,就是清算中国人。严家淦,是他的副总统,最近也说,我们与中共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大陆上搞批孔运动,而我们是孔子哲学为依归。依靠的依,归宿的归。还有些话了,不说了。苏修最近发表了一些许多的文章,就是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还有象那个帝国主义的小走狗阮文绍,也在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的变革,主张历史倒退,他们反人民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坚持了一条主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们是搞中庸之道,就是讲折中主义,调和的,反对搞阶级斗争。在这个材料的二十三页,林彪讲中庸之道合理,是七〇年三月十三号口授,叶群亲笔记在所谓的一〇一谈话笔记本上。那么,孔孟呢,他也有论述,所谓的论述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了这句话,“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作了一个翻译,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翻译孔孟的话。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姚文元:这个中庸之道啊,是历史上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种虚伪的、很毒辣的武器,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孔夫子是这样,搞中庸之道,但是七十二而诛少正卯啊。林彪也是这样,讲中庸之道合理呀,他就不搞,他那里呀,他就是暗杀、要杀人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历来主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世界上的问题,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主席认为看问题,应该是要全面的看,要有分析,但是要反对折中主义,这是一致的。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驳斥了那种打着中庸之道的幌子,来反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就有一句话了,“矫枉不能过正”,毛主席就驳斥了它。什么“矫枉不能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就是这样,当蒋介石反动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当时又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拿着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想保存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就是以南北为界,要解放军不要再打。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论调,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是反驳中庸之道的。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人民和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青:我想说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也是很尖锐的写的这个问题。当时巴黎公社要起义,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可能不利的,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起来以后马克思是欢欣鼓舞,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动人。马克思从来不搞折中主义,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个在原则上不能作交

易。我补充这一点。

迟群:这个正说明了我们党,我们主席坚持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强调了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批林批孔使帝修反非常的惊恐,这正说明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开历史倒车的人都要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现在则用他来恶毒地攻击和诽谤我们党,我们主席,我们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整风等等。所以,批孔是批林的深入,是贯彻“十大”,元旦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下面座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联系实际,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两句。这个问题有些人有些糊涂认识,说是孔子流毒咱们人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人人都要作检查,都要挨批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实际,联系什么,联系最大的实际,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林彪他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要叛党叛国,要当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最大的实际,丢掉了这个实际去联系,必然要走偏方向。

江青:当我们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次会议上,主席讲,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梁先生者,何人也,梁漱溟也,他现在还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批孔。他是尊孔。“吾自得子路而谋生,无辱与尔”,这是孔老二的话,“三盈三虚”,这不是,这是荀子的话,“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我们的主席说孔老二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那么当时讲的这段谈话,象梁漱溟这样的先生老爷,会不领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赵纪彬教授很详细地考证了资料,反复核对了,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如果有的同志有兴趣学,我建议学,可是比较难一点,不过也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子。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于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

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象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该联系吗？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

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A、B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这样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是扎他一个，那几个说是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

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块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洲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另外，我们要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针对着林贼，他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要通过批林批孔，搞马克思主义。他要搞分裂，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团结。他要搞阴谋诡计，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

光明正大。我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东西南北中，那里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能左能右。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总理读了那些信，对这个信，我们和谢静宜同志我们商量过多次，怎么来看这个信？我们认为这个信，写信人也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也不是江青同志一个人的意思。第二，写的信也不只是一个批孔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场革命的问题。它也不只是写给一个连队和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关于能文能武等一系列的指示的问题。总理、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央在“十大”作的报告当中，传达了主席的声音，就是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所以，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所以，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批孔的问题，也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的不够。所以现在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要注意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经常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我们党的政策，也就是主席提出来的总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注意研究，并且提出正确解决的办法。我们要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要领导带头，要发动群众，要抓典型，要进行试点，训练骨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知难而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开花结果，遵循“十大”的路线，我们要批出一个成果来，使思想澄清，觉悟提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上研究的都是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俩领会一些指示精神，下面她还要作补充，不对的大家批评，完了。

谢静宜：迟群同志讲了。我再补充几点，也是我们议过的事了。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

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是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到了一些别的单位，去学习的时候，在座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和指战员同志们，对这个认识，那还是正确的，要求批林批孔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同志，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你譬如说，认为孔子还是个大的教育家呀，什么批林与批孔呢，关系搞不大清楚啊，有的说是批孔是宣传部门的事，是教育界的事情，是学校里面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是文学家的事情，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反正就是说与本单位无关啦，与己无关啦，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啦。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当然有些是认识问题了。还是我们认为，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一个大事，也是工农兵的大事。只有发动工农兵群众起来进行批判，才能够批深批透，才能够肃清流毒，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你譬如什么，文章难懂、难学呀、难批呀、难联呀，才不要相信这一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下去座谈，我们觉得，广大群众通过了学以后，通过大家一议一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批判的是很好的，而且还不见得是那些高中生批判的。所以，也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而是在于路线觉悟，在于识别能力，在于阶级立场，在于认真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个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也有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譬如在批林整风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好象是些难题，就是这不理解，那不理解，但是到了工农兵那里呢？很好解决问题。譬如说，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妇女，她说为什么不理解呢？她说林贼出来，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她说千尺的水深能看清，寸厚的人心看不透，你不暴露他怎么能知道呢？说他不暴露啊，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讲了，它就象我们种庄稼选种子一样，种下去之后，选完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种下去之后，我们又浇水，出来了苗又锄草，我们总希望它长个好庄稼，而最后呢？谁知道它长了一个大乌米，

迟群：有的个别的长了个大乌米。也有个别的。

江青：孔孟之道啊，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

谢静宜：譬如说，搞封资修这一套，工农兵是外行，但是批判呢，封资修，工农兵是内行。还有什么难学呀、难懂、难批，一大堆的难字，一堆矛盾。但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要不要批判的问题，这是要害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决心要批，敢批的话，就不怕困难，就会知难而进，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敢字当头，因为这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啊，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所以要把批林批孔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所以，不懂不是主要矛盾，不懂可以问嘛，不会可以学嘛。主席讲了，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关键在于觉悟，在于学习，敢于斗争。一个善于抓大事的人，一个有创见的人，一个敢于反潮流抗逆流的人，一个敢于向帝修反作斗争的人，一个谦虚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体会到，不怕人的水平低，就怕你不学

习，就是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怕你能力弱，就怕你没有干劲，没有革命的干劲。也不怕你事情多，忙，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

迟群：没有发言权。

谢静宜：毛主席就是善于抓典型的典范。江青同志这次写信，送材料，就是贯彻执行主席抓典型的指示的。江青同志抓样板戏，我们感到这是抓典型，而且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育革命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把教育革命现在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是抓典型。而对于这个，批林整风的问题，批林批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又是抓典型，是抓大事，就是要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所以，我们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因为这是一个纲嘛。

再一点，就是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那里那些框框来的，那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

谢静宜：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七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十大”精神，总理报告、洪文同志的讲话当

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嘛，敢于反潮流嘛。但是有的单位呢，对江青：在这个“十大”、“十大”的党章讲话，王洪文同志也特别提出，这是主席讲的，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的总纲上了。

谢静宜：但有的单位呢，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其实这样就是不批林的问题。二是有的同志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批林批孔，离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你军队建设还有什么可言呢？

迟群：还有国家机关建设，就是说，整个的党的队伍的建设，我们革命队伍的建设。

谢静宜：你这样的话，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提到纲上来嘛。

谢静宜：所以说呢，不批孔呢，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你领导什么？关键是领导抓大事，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所以，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个考验，是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主席指出啊，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是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要敢于反，不怕有压力，就怕不敢顶，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出以公心哪，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做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最多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反潮流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是能够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就是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毛主席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谢静宜：不斗则修。就要敢于同阶级敌人斗，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忘了，是党是人民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一切嘛，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嘛，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只能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什么，就是在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上，经常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个人不好办啦，什么不同意呀，领导就不会高兴。我们办事情要让谁高兴呢？应该是让党高兴，让党高兴，让毛主席高

兴，让全国人民高兴。要符合原则，就是符合党的原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主席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走后门，等等，领导同志批准了，某某领导同意了，不好办呀。我们说他批示了同意了，算个什么！毛主席对关于杜绝走后门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批示，你知道吗？应该按照谁的指示去做呢？谁的指示最重要呢？服从谁？应该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嘛。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建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就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迟群：所以说就在一个人的身上失去了原则，将在千万人身上失去了说服力。所以我们就在第一个人身上不要失去原则。如果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那么我们就在第二个人身上去纠正过来。

谢静宜：你这个很重要嘛。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的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江青：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话，这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了，他也是相当典型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西沙群岛为保卫祖国的主权，打了胜仗。

谢静宜：通过这次江青同志的信，送的材料，抓典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特别是今天中央首长同志这次这么重视，都亲自到会，我们还是深受教育，对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教育，是个鞭策。所以我们深信，我们有信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定会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团结。完了。

姚文元：我稍微讲几句。刚才江青同志还有谢静宜同志讲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写进了党章，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报告。我想起主席一首词，水调歌头，第一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毛主席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迎着风浪前进，比在平稳的环境里生活，有意义得多。一个革命者，毛主席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

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 江青：给你们送去。

十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跟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

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那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土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

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行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了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罕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轲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追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了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嫪毐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了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酈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酈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酈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在杭州修行宫用了两千七百多万元，还没有修完，还不算施工的部队。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

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站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勤，原来叫徐勤，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搯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愬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愬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愬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见《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袞，多尔袞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的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 × ×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 × ×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

清华大学学生揭发江青写黑诗为复辟阴谋制造舆论

新华社北京讯 清华大学电子系自动控制专业三(二)班于十一月一日贴出一份题为《〈琅玕石〉剖析》的大字报,揭发江青曾投诗《中国摄影》杂志,妄图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现将这份大字报摘抄如下: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反党野心家江青曾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一首题为《琅玕石》的诗,要求他们发表,并再三强调要保密,对谁也不准说。过了不久,《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的清样给她看时,她又不许发表了。这首黑诗是这样写的: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首诗露骨地表达了江青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发泄了她对毛主席、对党的刻骨仇恨,必须痛加批判。

(记者张选国、黄威、朱述新)

江青两次来大寨干了些什么?

(王金籽)

我完全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所采取的坚定、正确、及时、果断的措施。粉碎这个反党集团,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

这个“四人帮”反党篡权的主将江青,曾经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至九月五日两次来大寨。我都陪同她。对于她不少的言行,陈永贵同志以及郭风莲同志是明顶暗斗,作过坚决斗争的。作为我,对于她的不少言行,当时也是看不惯、想不通,有抵制,但又不好明说。现在真相大白,那是她阴谋篡党夺权的表演和暴露。现把当时目睹耳闻的事实揭发如下。

她反对毛主席

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批评了江青。去年九月,江青一来大寨就翻这个批示的案。她叫来《创业》的作者张天民、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及长影的几个领导,还叫来《山花》的作者马烽、孙谦、导演桑夫,在一次座谈中,她对张天民说:“小张,你过来。你告了老娘一状啊,你不要以为通了(天)就了不得了,就翘起尾巴了。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重拍一部新的《创业》电影。所例八条罪状,是文化部给你提的,我只给你提一条,就是艺术水平不高。”当下,她就气势汹汹地命令孙谦去重写《创业》。

今年九月五日,她上了虎头山,在大寨公社牧场的小房内休息,大寨公社宣传队准备为她演出文艺节目,先奏《东方红》乐曲,她说:“你们奏《东方红》我就不出去,很快给我停下来。”后来,她见到红小兵戴着红领巾,便动手恶狠狠地揪了下来,还说:“戴这个干什么,要戴红小兵臂章”。毛主席曾经多次和少先队员、红小兵在一起,戴着红领巾照相留念。江青竟这样厌恶红领巾,更有甚者,对《东方红》乐曲也反感,她对毛主席究竟是什么感情,不是很明白了吗!

特别是今年九月来大寨时,她已知主席病重。来大寨后,却准备在中秋节大摆宴席,别有用心地请大寨贫下中农都来玩月。陈永贵同志严肃地回绝了她,对她说:“中秋是什么节日?正在农忙季节,摆酒请客,我不理解。要是叫几个贫下中农,开个座谈会,那还可以。”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在中秋次日逝世。她要在这时候大摆宴席,实在令人怀疑。

九月五日晚,中央电话通知主席病情恶化,要她速回。陈永贵同志立即组织人作好了返京的一切准备工作,她却悠闲自得,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打扑克。她心里到底有没有毛主席,她到底是什么居心?实在令人气愤。

分裂党中央

去年九月,她来到大寨后,对人说:“我在北京心情不舒畅,到这里来很自由,我

身体不好是他们迫害的。”又说：“你们听到有人攻击我的谣言了没有？在北京可多哩。他们不骂我，他们不能活。我没有他们骂，我也不能活。”

又一次会上，她说：“有人造谣说，主席批评了我，说我犯了错误了。主席没有批评我，政治局有些人是凭造谣过日子的。”有一天中午，江青带着文化部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一些名演员去团结沟，在路上浩亮大肆吹捧江青的一次讲话。浩亮对江青说：你的讲话太好啦，我听了很高兴，还录了音。江说：“我这是和他们对着干哩，政治局有些人说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拍得不多，戏也演得少了。”浩亮接着说：“这是对江青同志的污蔑。”

在一次吃饭时谈到了评《水浒》，江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去年在大寨时，有两个女解放军和她照像，江要她们摘去帽子，江说：“我就不爱那个鬼帽子，是从外国搬来的，是修正主义的服装。我这样讲，他们又要说我干涉国务院的工作，插手军委工作了。”一天晚上，她请电影界的一些人看了外国影片《斗牛》，看完后大加赞扬，随后就说到《创业》，她说：“有些话本来是王铁人的话，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把死人的话安到活人身上，我这样说，他们国务院有些人又不高兴了。”

大造反革命舆论

今年九月四日晚上，江青在大寨供销社买了四十多件东西。买起后，她拿出钱来说：“我有钱，山西人会算帐，我这个山东人不自私。”随后，她就让售货员郭和妮等人写自己的名字。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不料，这一下触犯了江青，她批评郭和妮：“为什么不写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孔老二。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九月五日，她到虎头山上大寨公社牧场。到牧场后，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了气，说：“怎么都是男的，没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又说：“女的要掌管天下。”

江青来大寨后，一再强调女的要掌权，当时，我们不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清楚了，就是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

江青两次来大寨，每到入多的场合，都要说毛主席没有来，我来了。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去年九月来大寨时，有一次上了虎头山，在水池旁边拿出她的高级糖果来吃，一面吃一面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给我带来吃的。人们厌恶她的这种作风，不接她的糖果，她就说：“这是毛主席的糖，你不吃？”用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进行招摇撞骗。有一次被她叫到大寨来的张永枚写了八句诗，她马上叫好，并让张永枚抄出来，说什么我回去就送给主席看。

请客照相笼络人心

去年，江青到大寨住了只有十几天，就举行了两次宴会，一次请文艺界，一次请新闻

界，每次都一百多人。

她把照相也当作笼络人心的手段。凡是要求和她合影的人，几乎是有求必应，既宣扬了自己，又可以收买人心。

她用这些手段拉拢人，有的人就上了钩。有一次她和文艺界的人一起在狼窝掌照像，照完后，江青唱起了辛弃疾的《水龙吟》，一群演员围着她，也唱起了“我们永远跟着江青，随时准备战斗。”

砍大寨红旗

去年九月江青来大寨时，要在虎头山上挖条“战壕”，她选了个地址，正选在规划为新村和猪场的地方。陈永贵同志不同意，她硬要在这里挖。其实她根本没干什么活，只是扎了个八角毛巾，照了个像。“战壕”是警卫战士挖成的。她大肆宣扬她参加劳动，并在农业会议上说她参加劳动，手上都磨起了泡。后来，因为盖猪场平了这条壕。这条壕不过三尺深，也不知她的用意何在，根本没有什么用。要是说备战，大寨的地下涵洞可放几千人。所以大寨贫下中农对此不满，就把这条壕平掉了。但知道她今年来后必然要问此事，所以，大寨社员另给挖了一条。今年九月三日来大寨后，江就问她的“战壕”，四日到现场去看，发现不是原来的，就大发雷霆，说：“这是假的，是伪造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报告。这是有关中央政治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你们不听我的，就是听邓小平干的。”接着，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我的，你们的猪场是邓小平让修的。修的时候陈永贵在不在？”当时郭凤莲同志回答说：“大寨从来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你那样说，我们接受不了。”江当即用手捂住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给你吵，我不给你吵，你要写检查，陈永贵也要写检查。”从猪场到了菜园，江青又要看油莎豆，因为这个种子是她去年带来的。来到地里她问：“这油莎豆是怎样种的？”郭凤莲同志回答：“是技术人员按照首长留下的说明书的规格种的。”江又问：“下种时陈永贵在不在？”“你在不在？”凤莲回答说：“我们忙别的，都没有来种。”当她知道陈永贵、郭凤莲都不在时，就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们不重视油莎豆。并说：“为什么永贵不来种，你小郭是书记，为什么不亲自种呢？不象话。”从菜园出来，又到了玉茭地，她把每株玉茭上的小玉茭穗扳下，扳下一篮子，逼着郭凤莲说：“这就是你们大寨种的试验田，这就是你们的大玉米？”并让跟她的人看，又说：“你们好宣传大寨的玉米有多大。种这干什么？拿回去让贫下中农讨论讨论。这是邓小平让你们种的试验田。”郭凤莲同志说：“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首长可以批评。你说是邓小平让我们干的，我们接受不了。”江说：“你们太骄傲，说什么也不听。”

江青口口声声说是邓小平让干的，就是妄图把大寨和邓小平拉在一起，达到砍倒大寨红旗的目的。因为大寨人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她的话，她就说郭凤莲：“你们太骄傲了，一点批评也不接受。”

下午，她批评大寨种的果树太多了，要砍掉一些果树，栽文冠果。还要大寨和昔阳派几个人到辽宁学习种文冠果的技术。其实，大寨早已有了这种植物，只不过不叫“文冠果”，而叫木瓜，或叫木本油料。郭凤莲同志告她说大寨有文冠果，叫她去看，她不

去，并让凤莲派社员给她把文冠果树砍下一半拿来让她看。结果一样，名字不同就是了。但她却说：“这不是文冠果树，你们到辽宁去学习，马上派人去，县里也去人。”

江青为什么要滥用权威给油莎豆、文冠果争地盘呢？看来这并不是选择作物的问题。只要和她在供销社自我介绍她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侄儿毛远新，就知道她的用心了。原来油莎豆、文冠果是毛远新在辽宁的“杰作”。江青还说过，大寨也是“她”的“点”，在她看来，种了油莎豆、文冠果就等于听了她的话，大寨也就变成了她的“点”，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寨红旗也就不存在了。

九月四日晚上，江青只带了随身警卫员和司机，突然进了狼窝掌。我们知道后，她已经提着一大篮玉茭穗回来了。原来她把凡是一株两穗玉茭上小的穗都扳掉，还在供销社和陈永贵同志说：“你们有多少玉茭？我要把凡是小点的统统取掉。”陈永贵同志说：“不少，有五、六百亩啊！”她要把所有玉茭上的第二穗、第三穗小的都扳掉。陈永贵同志说：“那样不行，组织劳力干，六、七天也扳不完。”而且告诉她：“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减产。”但她还要坚持她的主意，并说：“我也不白用人，我有钱，可以出钱买扳下的玉茭，可让我的马吃。”她还滔滔不绝地讲扳掉小玉茭，可以集中力量长好一个大穗。但不论她怎么说，大寨的同志都没有听她的。实践证明，有的扳了穗的玉茭，很快就枯死了。收打结果表明，扳玉茭穗的作法确实是要减产的。

批邓另搞一套

九月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要搞一次所谓批邓会。她把她的随从人员和接待站工作人员叫到一块，她要讲话。她讲话时，不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却大讲邓小平怎样迫害她。还说邓小平到法国去时带她的侄儿走。要随她来的邬处长发言证实这件事。邬处长说：“我不了解此事。”她反问：“为什么不了解？”邬说：“我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我怎么能知道？”这次批邓会不中她的意，她准备第二天还要开，要陈永贵同志发言，她来出题目。陈永贵同志说：“我发言就从老少组讲起，要讲和刘少奇斗争，和李雪峰斗争。要讲大寨是怎样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体会，不需要再出题目，大寨斗争经验题目有的是。”江说那也算，你讲你的，但别的人由我来出题。由此可见，江青搞的所谓批邓，只不过是幌子，实际是她划框定调，她出题，别人答卷，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因为五日晚中央来电话催她急回，这次会才没有开成。要按她所出的题是很难答的。

宣扬封、资、修文艺

江青两次来大寨，每次都带着两大卡车电影片。她看的是《断桥》、《打金枝》、《红娘》。西方影片《斗牛》、《冷酷的心》、《鸽子号》，还有一些诲淫诲盗的影片。她听的戏和音乐是《二进宫》、《斩黄袍》、《斩子》、《白蛇传》、《空城计》等。不仅自己看，自己听，还要请文艺界、新闻界的人看。去年九月，她让名演员给大寨社员组织一次晚会，演奏、演唱的节目，大部分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妄图利用这些封资修毒素，毒害大寨人的灵魂，玷污大寨红旗。她在吃饭时或是让她叫来的“艺术家”吹奏演唱作乐，或是播放旧京剧，旧昆曲等唱片，她还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随声和唱，真是丑态百出。

贵族老爷态度

江青去年九月来大寨时，要陈永贵、王谦同志陪同她骑马上虎头山。王谦同志如实告她：“我不骑马，可以步行陪你上山。”不料，她却大发雷霆，大骂王谦同志：“胆小鬼，你骑上去！”今年来到大寨后，一下车就骂大寨接待站的负责人，连连追问：“你给我盖的窑洞呢？”原来去年来时，她不住平房，要住窑洞，选好了十孔窑洞，却不进家。要我连夜动工，把十孔窑洞的窑腿都拆去，打通变成一大间。这是无法办到的事，我给她解释，不行。还是陈永贵同志给她讲：“那不行，那么一拆，十孔窑洞要塌毁，连窑洞上面楼房也要塌下来。”江说“十孔不行先搞六孔”，陈永贵同志回答一孔也不行。这才勉强作罢。但临走时，又要大寨接待站另外给她盖一个院子，盖六至十孔窑洞，相互打通。陈永贵同志以及我们都认为这个要求太荒唐，根本没有安排盖，因此今年来大寨后一下车就骂。

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江青两次来大寨，乘着专列，随从五十多人。带的东西是上自冰箱水柜，下至大小便盆，一个人用毛巾一百多块，一块毛巾用一次后就要洗刷、煮沸消毒，才能再用。她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大院，占用十孔窑洞，三个套间，能住一百五十多名外宾的大院全被她占了。她的住房分作休息室、卧室、会客室、餐厅、打扑克的娱乐室。她没有占的房间也不许别人住，连她的警卫战士也不准大声走步。她住在大寨后有几不准，不准参观、不准车子进院、不准开有线广播、不准开水管、不准用吹风机、三十里以内不准放炮。群众气愤地说：这那里还象共产党，真比资本家还厉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

侯 隽

江青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到毛主席逝世前几天，曾三次窜到小靳庄，打着毛主席旗号招摇撞骗，妄图捞取政治资本。这三次我都在场，现根据记录和回忆揭发如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小靳庄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接待她，她问周叫什么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哪。”周说：“您给我改个名字吧。”她想了想：“你叫周克周吧，克制周礼嘛。”我怀疑她这是影射周总理。

在去麦田的路上，看到当地农民戴的草帽，她要了一个，说要把她头上的草帽送给我，并反复说：“我这个草帽是在延安开荒时戴的，好多人跟我要，我都没舍得给，今天把它送给你了。”“我这个帽子还是延安时的，戴着它开了半年荒，我把它送给邢燕子你们俩，你们轮着戴。”可是草帽比较新，只有几处开了线，根本不象三十多年前的，很可能是她骗人的。草帽现在我大队。

她在场上看了晒的麦粒，要买五斤，又要买我们大队五斤八百斤地块上的麦子，扬言“给主席看看，主席一定高兴。”不知是否真给主席了。

她穿着裙子、白凉鞋，走路都象要摔倒，非要割麦子，拿刀也不会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砍下一小把。在场上非要翻场，翻了半天，一叉子也没挑起来。装了装样子，她摸过的镰刀、叉子和大家帮她割下的麦子，就被当成“革命文物”珍藏起来，正好达到她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目的。

那天临走，她讲了一通话：“解学恭同志，你要经常来，这是我的点，你要是管不好，要敲打敲打。我这个人不知黑天白天，就是干。我的点，不知多少时间来一趟，你们通过记者同志给我来信，多反映情况。”本来小靳庄由“老大难”变先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绩是毛主席的，是党和人民的，她却说是她的点，真也不知羞耻。

她还借赞扬小靳庄，吹嘘自己：“你们小将生龙活虎，老将也不示弱，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样板戏是我搞的，你们唱的比我好。”

江青第二次去小靳庄是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参观。名曰陪同，实际客人去了两小时，她迟迟不来，大家对此很不满。小靳庄当时还没顾上新农村的建设，村容不太整齐，接待外宾是有一定困难的。她搞突然袭击，弄得我们很紧张，说句老实话，我当时真担心外国记者到处照像。因有外宾，江青好象没多说什么。

江青第三次到小靳庄，正是毛主席病重的时候，她不在主席身边，到处乱跑，兴高采烈，说什么“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吃得好，睡得好。战士的帐篷真舒服，我都睡着了。”

临走时，我和邢燕子问她毛主席身体好不好？她说：“很好。”我说：“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我们见主席的机会少了，真想他老人家。”她说：“你们给我写信，我转给毛主席，看他们谁敢扣我的信。”结果我们真把给毛主席的信交给她了。她还让小靳庄的社员把讲话稿、诗歌抄成大字交给她，说带回去给毛主席看。她给主席是假，捞取政治资本是真。

她上厕所，让我和邢燕子留在身边，对燕子说：“你和吕玉兰参加农业学大寨会，是我叫你们去的。”又问燕子为什么没穿她送的大襟衣服，说：“你穿吧，穿坏了我再给你做。赶明我给侯隽做一件，不然该说我偏心眼了。”想以此来拉拢我们。我们成长全靠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培养，她想贪天之功窃为己有，那是枉费心机。

她下午四点多到小靳庄，转了一会，照了几张传真的镜头，就到战士驻地吃饭、睡觉了。七点多才醒，群众一直在外面等。驻在小靳庄劳动的战士们为不影响她睡觉，直到快八点了才吃饭。

她睡醒后组织座谈会，小靳庄党支部和司家庄、窦家桥两个大队的代表（她下令两村来代表）分别汇报，她放出“我是炮筒子”的烟幕弹，在插话中讲了许多错误的话，伪造毛主席指示，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充分暴露了她篡党夺权的野心。

小靳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杜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说到“邓小平说小靳庄是国家拿钱喂肥的”，江青插话：“邓小平讲学小不学大，小靳庄要什么给什么，我可没说这话。”说到小靳庄交爱国粮，她说：“主席讲要藏粮于民，你们还要交，这怎么理解呢？”（指交公粮）。

王杜讲到七、八、九月份我们憋了一肚子气时，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整了我两个月。我都被他们斗争了两个月，何况你们呢？”江青对在座的同志说：“这话不要往外讲”。

王杜同志讲到邓小平压我们，是我们的光荣时，江青说：“对！对！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敌人反对，那叫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压光荣。我天天挨骂，觉得光荣”。

王杜讲，去年，我们到北大、清华找迟群、谢静宜，江青说：“你们就忘了我啦！为什么不找我呀？当然，找他们也可以吗？我昨天派他们来，让他们问好”。

王杜讲首长工作忙，当时没有找您，江青说：“当时不敢找你们，不敢找天津，找你们就遭殃了。咱们是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的气哩！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毛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我不说了，一说就有气。”

王杜同志继续汇报七、八、九月份同邓小平对着干的情况，江青说：“我有一个时间，不敢惹天津，不敢惹小靳庄。我为什么不找天津，我是跟主席学的。主席总批评我。我这个炮筒子，尽放炮，尽给主席找麻烦，以后我也要讲点策略。”又问：“三个小册子你们有没有？”王杜说：“有。昨天迟群、谢静宜送来了”。在场同志补充说：“小靳庄一百本，司庄子二十本，窦家桥二十本。”江青说：“是我派他们来的。你们没有就找他们要，就说我说的。我有一个时间不敢来，怕我来了，你们再遭殃。”顺便

说一下，迟、谢去窦家桥时，我正在北京。听我爱人司福玉说，他们冒称毛主席的“使者”，说是毛主席派他们去的。

王杜讲到七、八、九月份，斗争十分激烈时，江青说：“岂只七、八、九，早了！”王杜讲到那时候，我们更觉得斗争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江青说：“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一条罪状。我送一点批林批孔材料，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也是罪状。我是请示了毛主席才来的。你们的信，我给主席看了。我们受了灾，更要为毛主席争口气。”

江青说：“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我去部队搞三个点，邓让撤了。八连到没有？”（八连同志答：到了，说“搞了六个半月就跑了”。）江青说：“主席批我，斗争要讲策略，到时候就得退。”

当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司福玉汇报时，说到“我们以小靳庄为榜样”时，江青说：“小靳庄是解学恭抓的，是我委托他抓的，他的点。”还说：“他们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指小靳庄）。

司家庄大队副书记焦清芝同志汇报时，问江何时去司家庄，江青说：“小焦哇，小焦哇！你真是个小焦啊！你不知道我这次来碰得焦头烂额呀！”

焦清芝讲，七四年你到小靳庄，把南泥湾的草帽送给燕子。江青说：“不是南泥湾，是延安时的。到南泥湾是我和主席去视察。草帽是我上山开荒时用的，那时比你大，不了一两岁。我农活不行，开荒可以，顶半个劳动力。男同志说女同志不会干，让我们留家洗衣服、烧饭。不让我去，我也上山。开始上山脚肚子吐吐，后来习惯了就好了。我们的窑洞、飞机洞，都是我们自己挖的。我进城时手上还有六个老茧。我们挖窑洞，你们挖地洞，又抗震，又备战。我们家乡没棒子，我这次来想要同你们学掰棒子。”焦清芝讲，我们那有，你上我们那里去吧！江青说：“我想去，可事情太多，这包里这么多文件要看（拍拍挎包），早想来，他们不让我来，我急了，向主席打报告，批准了我才来。”

焦清芝讲，你亲手抄材料给我们，江青说：“那也是我的一条罪状，邓小平说我有罪。他在大寨会议上，把我们说的那么糟，说我们产量不如解放初期，我作了补充，我说那是个别的，不能那么说，他说我插他的话。他那讲话是今不如昔，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反对。我说，第一书记都要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当时那燕子去了吧？你去了吧？我讲评论水浒，他说是说他，知道不知道？他斗我，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是差低头，揪辫子。他在主席那里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新华社也告了我一状，是不是？主席就批我，批我（指自己鼻子！）不得了啊！他造我的谣，说我犯了错误，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自杀了。我说，这不是活的好好的吗！我才不怕呢！（对记者）涉及到政治局的话，不能往外宣传，要守纪律。我是拿你们当亲人才对你们说的。”

小靳庄下乡青年赵秀丽汇报时，谈到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江青说：“我要为妇女说几句话。女同志负担太大，有例假，生孩子。政治经济学有一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男的、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有的同志笑）是嘛，男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精虫。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有人还撒哩！（江青作转头撇嘴动作）他们

笑话我，你们会不会笑话我？这都是邓小平的影响。大男子主义不能贯彻男女同工同酬。有的人一进门，锄头一撂就躺在炕上（作仰身，张手要饭吃的动作），在延安，女同志生了孩子，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说，那怎么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全世界消灭了吸血虫就好办了，男的不能靠体力强想怎样就怎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材料写得仓促，可能因记忆不清，内容有遗漏，文字不准确，我续继回忆，进一步揭发。如有不当请批评。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象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三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现在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五二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三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儿好。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我们是最大的石油国之一，人家的眼睛都瞪着咱们哪！去年，杨振宁回国。我接见了她一下。他问我是那儿人。我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他说，哎呀！资本主义国家搞石油化工的人，都瞅着你那个家乡呐！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地下都是石油啊！你看，不仅是咱们的大庆，不仅是天津的大港油田，多啦！现在我们的大陆架全有油。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

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的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不过，全国搞得这么复杂的级别、工资，那是全国性的。搞单干也带有普遍性质。全民所有制也有所突破。但是，主要的还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集体所有制也主要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就有那么些地方，象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并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那就更早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胡风分子、对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京剧会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哲学方面的“合二而一”，历史学方面的“让步政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孙冶方（比苏修的利别尔曼还厉害哩！）叫“利润原则”，你们过去叫“工分挂帅”吧！那是叫“奖金挂帅”啦！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到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的主席说“放”，让他们跳出来，不怕。我们都在报纸上先登他们的文章。他们放够了，然后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攻，一下子就把他们打退了。但是刚一打退，新的斗争又来了。五八年大跃进，刘少奇、陈伯达那伙人又搞什么“一平二调”，同志们知道吗？“一平二调”，不要货币，还有几样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病，知道的不多。就是说东西都不要货币啦，我到你那儿去调，搞绝对平均主义。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到了五九年，彭德怀就又跳出来了。彭德怀是苏修的人，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把大跃进的成果破坏了很多。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其实我们只欠他们三亿美元。我们欠的主要是抗美援朝的钱哪！我们就勒紧肚带嘛！我们的主席很长的时间带头不吃猪肉，为了出口还债。苏修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个狰狞的面孔，在中国表演的是足够了。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彭德怀就跳出来上万言书（他那个万言书我是看过的）。后来就打退了。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名堂的高薪，高薪到一千、二千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二千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

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后就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实验。我们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要跟资产阶级搏斗，公与私也要搏斗。我们总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这两霸，还有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主席本着马列主义教导的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有两个多月的经验，即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总结了这个问题，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实践经验比马克思就多了。但是，他退了几次薪水，退了多少次礼物，也阻挡不住。列宁去世得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这个问题，提得也是非常尖锐的。我们的主席，除了采取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外，也是退过、降低自己的工资多次，没有用。所以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特意提出要读三十本书，就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都要读这三十本书；还对《简明哲学小辞典》写了按语。《简明哲学小辞典》第三版是毛主席同苏修斗争的结果。其中还有错误，我们的主席在按语中说了，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就更明确的看出它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它那里头有那么好几条不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讲国内矛盾。列昂节夫（这个人现在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在三五年以前，这个版本是好的，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写的。我们在延安就是读的这个版本。如果没有这两本小书作基础，读马列比较难；并且还得读一点历史。我希望大寨人，除了生产上带头，学习政治带头，学理论也应该是带头的！要不要啊？我学得不好，学得也很少，记忆力也不好。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汇报时的指示，其中有的我过去学过的。我对《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没有读完，就是选了那么多少本读了。主席这次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第一段就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我们的主席最相信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军的广大指战员。使每一个人懂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啦。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查了几个点，有问题。比方说，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下。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批过吧？主席在第二段里头又讲了我们现在还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现在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你们这儿有商品啊！我们那个钓鱼台也有商品，因为我们种了中草药，我们得把它卖给公家，是我和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种的。我们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中草药，又可以美化庭院，又可以为国家增加财富。我们种的菜也很多。主席说怎么办？对这个问题，你总不能空想吧！不能一步登天就到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跟旧社会截然划开嘛！怎么办？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搏斗，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搏斗，怎么办？主席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

限制。”我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发展。就要不断地搞运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广大干部、党员，告诉广大指战员，擦亮眼睛。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鸣”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四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五段（这是主席下达的具体措施）：“《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同志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七十一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五四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头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六十五回本，一九七三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六十五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

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他那四句诗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哪儿是什么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是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一百二十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你们现在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是了）。到了汉朝，就有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标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啦。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着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有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在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

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的是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象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十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呀，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洲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是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不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你们看过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

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暂且藏着。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己内部就缓和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象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二十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一九二一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我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样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宽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拚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

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象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七十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入。没有理论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作“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

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睡了。我又犯了错误，没有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大楼房子里头太热，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同志们。我昨天来晚了，正好散会了。我那时还没吃饭，就跟他们一块吃饭，然后去看唐（岐山）师傅，恐怕很多同志都没有看见，也没有机会都能看见。上次五省会议和十二省、市、区会议，我和大家扯了一下。楼上温度高，过堂风很大，很容易感冒，我就不到楼上去看同志们了，到这儿看看同志们。另外，我也想跟同志们讲一点事。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啊，多了，你们大家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连《创业》也是他授意，信确实确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的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纪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咏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骕、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失败了三次，有一个戏失败两次。那时我说，替他们付学费。这个《海霞》有两部底片，最主要的底片还有一

出戏。画面片和声带片还没有合成的原始片，就拿去看了。后来丢了，丢了两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丢一本就等于一百万元。我怎么知道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霞》，那个电影我到现在还记不清楚名字。我去年一整年为了主席，也为了推陈出新，抓词曲、古典唱腔音乐，就是把各种流派的音乐变为曲乐。我正在排曲目录，开会，文化部的人老是很紧张，把我叫到旁边去说，江青同志，不得了啦，丢了两个底片，工作底片丢了就完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知道，都是中央首长，这个转那个，那个再转那个，就那么丢了。这个事很多同志都有责任，将来在政治局我要讲一讲，因为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能看双片。我就看拷贝，不看双片，看了就得负责，看了，他就认为你负了责了。看双片，在外国就是有这样的权威。往下剪容易，改就难了。比方说，一块布已经裁成西装了，你能改成中装吗？我是一个比较单薄一点的人，我现在比进城初期胖了一点，裁成我这样身材的衣服，你能穿吗？已经裁成小孩的了，你能改成大人的吗？大概中央的同志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就是要看电影，就那个样子弄来弄去就丢了。我说，报告春桥同志，春桥同志主管文教，后来不晓得怎么找回来了。后来我也调来原始的底片看，画面上已经坏了很多，可见看的那个程度。因为我怕他们销毁那个底片，我说，那不行啊，都得保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长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说话，那我保留评论权。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这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个电影，谁敢批啊！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什么叫粗暴，这才叫粗暴，抄人家的家。中央有两个部倒霉，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负责人用了新人，其实底下老的解放了相当大一批。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

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的道路上很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每秒就那么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完全的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吧。不可能，那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主席的重要指示同志们都学了吧？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年才认清的。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因此，同志们要允许有认识过程啊。这里有受了气的青年同志，有受了冲击的老同志。不要发泄怨气，发到群众身上，发到青年同志身上，这是不对的。邓小平实际上对老中青都干。主席说了嘛，我是最老的。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呀，不能想想自己的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

（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头脑失掉了平衡，老呕吐，怕声音，怕光，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什么光，别人一碰我的床，就象晕船一样，黄胆都吐出来了。这样有两年，以后我就锻炼，那两年我也刻苦锻炼，护士扶我在外头走一走，出出汗，一天出几十次。我今天舌苔很厚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楼太热了。他欺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了，更何况同志们呢。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安定团结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恐怕对你们也没有说过吧。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团结安定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现在公开发行的主席批的叫《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有个按语，你们都有没有？是不是普遍都有？这本书有个内幕，我不晓得同志们知道不？是我们的主席和苏修斗争的结果。主席说，还有错误，不要紧，读的时候加以分析就是了。我去年全部复习了。哎呀，那个阶级斗争熄灭论，利润挂帅等等，都是那里头的，不保留一点不行啊。另外，主席在这儿说了（拿出来念），“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座的参加过庐山会议的老同志大概都知道吧。彭德怀事件那一次，是不是主席批的这个过时的呢？从中央政治局起，到地方上的高级干部，我认为没有过时。主席说，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主席说，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学，搞突然袭击，斗了我四个月。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

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读了，这一件没有公开。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了。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五月三日，主席开了会，那天的记录我没有找到，就是批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批教条主义。我复习了主席的一系列批示，从七届二中全会起。我把邓小平六八年《我的自述》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统统研究了一下，他是个什么货色呢，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个王明路线的支持者、拥护者。这些话你们自己去找。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太挖苦了，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只有一个组长一份，要人手一本。那个整的还不完整，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总理去世了，总理的自传上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那时已经斗他，他还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嘛！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味，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可能有的没有谈。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上面写的字就不印了，也没有修辞，有一份是我给主席的，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这个“土豪”是好“土豪”，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这上头，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是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我每天都要选一点国际国内的东西给主席的，随便写了那么几句，所以我觉得不要印。上海马老揭发的材料，你们可以看一看。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

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同志们，这是个什么事？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一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风庆轮”的问题，上次没说全，我把文件又调回来了。“风庆轮”是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看了一份东西（手举材料），我愤恨，我在这个东西上批，我还正式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上一次因为记录的同志记不了，我的话也快，没整上。我得读一读其他同志的批示。

王洪文同志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洪文 十月十四日”

春桥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张春桥 十月十四日”

文元同志：“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姚文元 十月十四日”

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当时我批了不少材料，有个气浮

陀螺，是一个工人发明的，比世界上的都先进，但就是压着他。有一个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两三年，后来这个记者垂头丧气了，不敢报道了。批林批孔开始后，他又觉得应该报道。我看到这份报道，就建议，反正花不了几个钱，请他到北京来谈一谈。气浮陀螺是飞机、轮船上都要用的。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心他味，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那个李国堂是个坏人。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可是没有想到他就是李国堂的大后台，也没想到他为什么跳起来，完全想不到的。不过，后来他去挽救了，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是多长啊。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就这个样子。你认识邓小平这个人吗？很早认识吗？他是个逃兵。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啊，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有这么四份材料，同志们可以看。在座的同志，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嘛，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品，那没有办法，自找的嘛，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想把我那个讲话拿去当上方宝剑，我说，那不行，不能传。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群众的觉悟比我们高得多。说老实话，我没有有些群众那么高的水平，主席批评得对，往往下级比上级高明。我没有背下来，大概意思吧。你们谁背下来了，谁带

着主席最近的指示没有？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刘少奇、林彪事件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根本不惊奇，而且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来，这是我看到的群众的材料是这样的，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我也去了清华，前天晚上去的。建议你们把文件带走一份，建议你们都去清华。我听说一个组长一份，那怎么行啊，我的警卫员都人手一份，搞得不对头。现在大字报选编第八期出来了，我收到了，你们有没有？我建议，大字报（一）到（八），应该每个省有一套，他们可以翻印，那是主席亲自抓的点啊，我们都得去学习。现在群众都去抄大字报，叫他们也到那去抄，这不对了，想得不得周到。每个省，每个军区要有一套，从（一）到（八），要是出了（九），（九）也算上，要给别的省、别的军区补发，补齐，以前那个不够，只是出了（九），（九）也算上，要给别的省、别的军区补发，补齐，以前那个不够，只有增刊（一）、（二），没有别的，我说的（一）到（八）是大字报选编。增刊（二）那个形式是我出的主意，原来出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对照着批。看大字报的人太多，就看到一点，三张还没看完，就不得了了，出不来了。要取经啊，他们的经验，一个是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巨大的贡献，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提到理论的高度，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巴黎公社两个多月，他也没去，给限制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指示，尖锐、精辟的讲话，但是很不幸，去世早。斯大林，主席在这上头讲了，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还有一些小修的主要是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嘛。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啊，确实有这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那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但是我们主席总是希望，象我这样的人到群众中去。我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群众中去，不然就有暮气，就不革命，就反对革命了。主席说了，青年的同志，中年的同志，每年要有几个月时间劳动，主席是说每年三个月，要回本单位去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参加集体劳动。呆在上面久了，就会成为官僚，成为小官僚，容易脱离群众，只在机关非常容易。邓小平到大寨，中午也不在那儿，上火车，群众都不见，这个样子，很少有的。他对干部也是这样。我对他的认识现在还在发展，对于他，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有弄出来，基本上认识他了。如果同志们看了这四份材料，他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大多数同志应该有认识过程，要承认这个认识过程，不能一步登天。账要算在

邓小平身上，这不是替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来开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得罪了群众，得罪了造反派，那他应该作自我批评，应该赔礼道歉。以后他要再犯错误，还可以再批，是不是？河南就应该向唐师傅赔礼道歉，整得他好苦啊。（唐岐山：我有错误，我有缺点。）那是另外一回事。群众的意见，恐怕不完全是针对铁路。大家要认真对待。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说初澜（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一个服务员那样造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意见多、深刻的是春桥同志。你愿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后来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小，不看。但是我还没有一条意见没有说，就是说作为湘剧音乐，能演现代戏，我对它还是肯定的，我只不过是没有说。我还是讨厌它那个内容。我为什么对花鼓戏那样帮助呢？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还有一个《半篮花生》，这两种戏我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戏不敢随便说，音乐不敢随便说，但是我还是对它那个内容有意见，这个你们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也得去研究一下湘剧呀，这是我自己的本业。当时，好些内容很不好的电影也要出笼了，出笼很好。我觉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让群众鉴别，这是主席的方针嘛。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张：不是。）你是好得不得了阿，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样映嘛，然后再改嘛。已经拍成了，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还很有一点热心。他把园丁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拿原来的拷贝给同志们看一看，大家评论评论。我还说那个《园》剧毕竟是演现在的人，过去是演才子佳人。你在那里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他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因为我听得少，看得少，我九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我在湖南，主席嘱咐我回来传达要读点马列，要春桥、文元写文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把这三项连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也不敢用。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

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我说，你这次回来，要搞清楚一下这个东西。中央的文件都有啊，有三件吧，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呢。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听说空军有个同志抵制了他一下，就把这个人干掉了。打电话让他们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传达不力，派了两个人去，臭批了一通。不能把自己说得那么高明，我到九月初听到，直接在政治局听到，觉得不对头，也不敢问，搞不清楚。因为有两个我是听到的，但不是在一块儿，后头这一个我没有听到。各地的同志都要对着邓小平，自己有错误、缺点，执行了，有的坚决执行了，有的执行得差一些，空军不那么坚决，把个政委给干掉了。这个话你们不要记，没有去核实，反正是有这么个事。上了中央的文件，我都没有看出来。在一个会上，临时念文件，他们要把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搞掉，我提出来了，说你这样是阉割主席的思想啊。这个文件就那么发了，不给人思考余地，来不及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当时反映很紧张。看起来，在哪儿？在邓。邓小平很紧张，他说照改照改。事先发文件，叫我们看，想一想嘛。不是，而是临时发，发一大堆。他这个时候，发军以上的照改了，军以下不是发全国嘛，还是删了。后来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一份，我拿来看了。你们不信，回去看一看。发军以下的文件，把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弄掉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恐怕也没有注意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最近这个，结合实际。还有个点在那里，同志们都去了。主席说开三天，你们来已经四天了，如果问题比较多，回去解决。回去解决，就是要双方都要学习主席的教导，各自作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

（对张平化）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说话。我很不希望象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了，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的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我就是想说一点点这个斗争的内幕。邓小平他们不仅对青年干部，对老年干部。主席说我是最老的，邓小平对主席欺负，残忍。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咱们的主席统帅咱们反击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嘛，执行了一些东西嘛，中央也有文

件嘛。所以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有些老同志可能是比较厉害，有的不厉害了。有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厉害，比如七机部。我占同志们时间很多了，觉得这么多问题，能说话的同志，不管老、中、青，有的省份不是所有的，得说说话。错误严重的同志都要下决心改过来，能够正确对待，还要有精神准备，不要叫人家捉起来。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指福建）太厉害了，有人说，“来、来、来，咱们复辟复辟”。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两个省，七百多。他是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就开始战斗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啊。我们没有职责保护主席吗？请问同志们，有没有这个职责？群众气大了嘛。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看了材料，好象都有精神准备了，争取不要那样，因为有点经验了嘛。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主席不是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嘛。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嘛，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一方面，也要顾大局。不要限期，不要把人揪起来，这不好。我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主席这个指示，回去能说话的，老中青都应该说话，陈佳忠就出来说了话，群众给了三条，把廖放了。别的地方还没有。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我不能上那个大楼了，我原来想去看你们呀，那儿风大，我现在怕那个大楼，因为我有慢性上呼吸道感染。我来看看同志们。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过去我还不知道是他搞的，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在这儿废话。同志们学习的恐怕比我还好，政治局到现在只学了一次，还是最近才学的。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更何况我也有缺点错误。我愤慨的是他对着主席，对着许多跟主席走的，走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他呀，不管老中青，他都干，对着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的。我还没给你们如实的讲，因为我不替他扩散那些玩意儿。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

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就知道了。”“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可以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楚）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不要受孔老二徒子徒孙那些东西影响。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的，比较正确的都是肯定她的。你看，一部《三国演义》，把曹操搞成什么样子了，咱们看戏，曹操是个奸臣，白脸，但是《三国志》是肯定他的。这个人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诗人。这个书还是挺难翻的。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曹操的戏了，就是这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给翻过去了。陈寿的《三国志》不是这样。唐朝的诗人都是歌颂他的，李白有一首“古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所以我们的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冯天瑜的那本我快看完了。他这本书联系实际，比较容易懂。最近，他有一篇文章，我还没看。从这个书联系实际，只有个别的地方有点差错。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天津市委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 小靳庄等单位代表揭发批判江青的反党罪行

新华社天津讯 中共天津市委于十月三十日召开声讨大会，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党篡权的滔天罪行。参加大会的有市委各部委、办和区、县、局以及各条战线的代表，共两万五千多人。大会设立了八个分会场。在会上发言的有天津市委办公厅、天津市文化局、小靳庄等十个单位的代表。

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孙德祥同志在会上揭发批判了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八次来天津乱批文件、为她反党篡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孙德祥同志说，江青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曾窜来天津八次。她住在高级招待所里，吃喝玩乐，看黄色外国电影，有时以参观、视察为名，以个人名义乱批文件、到处送材料。她所批的文件、送的材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惊人的。一九七四年元月她第一次来天津，就批发文件、材料四十四件，印了七十八万份。从市委领导到区、局机关，从工厂到农村，从她的“理论”班子到随同她的医护人员、司机、警卫、理发员等，想批给谁就批给谁。由于她批的材料多，数量大，全市几家大印刷厂连夜给她印刷，其他印刷任务都为她让路，急用的小学课本都停下来，致使全市小学开学两个月后才发课本。今年八月，她又跑来天津，胡说什么“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了一条罪状。我送一点批林批孔材料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也是罪状。”“我天天挨骂，觉得很光荣”。她到天津手表厂，既不听工厂负责人的汇报，又不找工人座谈，却装腔作势地参加“劳动”，摆样子照相。她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逢人便讲，“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的。”从以上的揭发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

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杜在会上揭发批判了江青在小靳庄犯下的反党罪行。他说，江青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九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三次窜到我们大队。她打着“抓点”的旗号，实际上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为她反党篡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这个大坏蛋假借毛主席、党中央的名义，无耻地吹捧自己，欺骗群众。她第一次来小靳庄时，逢人就讲：“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一九七四年九月，江青陪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小靳庄时，她吹嘘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她又窜到小靳庄。进村以后，她一口一个：“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这完全是欺骗，是造谣。她还借批判邓小平为名，发泄对毛主席的极端不满。她说：“主席把我的讲话（指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在邓小平讲话时的插话）都圈去了。”又说：“邓小平要撤军队三个点，我就和他斗。主席说，‘按邓小平同志意见办’。”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她还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我不敢理

你们，也不敢送材料啦。”“送材料成了一大罪状。”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还大讲什么：“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一个他们没办法，只好要我。这回要改变。”

王杜同志说，江青这个大坏蛋打着提高妇女地位的幌子，为她实现当女皇帝的迷梦大造反革命舆论。她来小靳庄时，大讲破“男尊女卑”，胡说什么：“现在大男子主义严重”，“在政治局我是单干户”。还叫嚣什么：“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得是女同志”。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到处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江青来小靳庄时，送给这个发卡，那个草帽，还给大队送来了莲蓬籽、油莎豆、玉米种、菲律宾玩具等。她每次来时兴师动众，车水马龙，大摆资产阶级威风。她不喝小靳庄的水，自带崂山矿泉水；不吃小靳庄的饭，带着特制的西餐和点心，甚至还有沙发式的专用厕所。她睡觉，就下令把全村的鸡狗都关起来，闹的全村鸡犬不宁。她作风低级庸俗，出尽洋相。尤其是她第三次来小靳庄，装疯卖傻，时哭时笑，借机散布十分低级下流的话，说什么：“男人简单得很”。“男人有什么贡献，就是一个精虫的贡献”。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王杜同志最后说，大野心家江青来小靳庄散布了很多谬论，对我们是有影响的。过去我们路线觉悟不高，对她的反革命谬论认识不清，总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就是听到她一些不顺耳的话，也是往好的方面去想。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小靳庄贫下中农心连心，在斗争关键时刻，华主席对我们小靳庄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和鞭策，“四人帮”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敌。大敌当前，我们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天津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许世昌在大会上揭发批判了江青在天津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行。许世昌同志说，今年初，江青通过文化部提出要揪出《创业》的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她打着保留传统戏资料为名，大看思想反动、内容腐朽堕落的旧戏。她还以“观摩”、“借鉴”为名，给文艺工作者大放内容反动、色情的进口电影。她还提倡文艺工作者要讲究发型，衣饰，要演员穿她设计的连衣裙、命令演员一律烫发。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江青还为许多内容反动的旧戏录音、录相。经张春桥批准，仅天津录相点购买录相器材就花了国家外汇五万美元。天津梆子剧团拍了一部《辕门斩子》的电影，就浪费了二十三万元。文艺战士们指出，江青决不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复古倒退的吹鼓手。

天津市妇联副主任巴木兰揭发批判江青借口提高妇女地位妄想篡党夺权的罪行。她说，江青在天津到处散布说：“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妇女也可以当总理”。她还叫嚷说：“氏族社会是女人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甚至露骨地叫喊：“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等，为她当女皇制造反革命舆论。

会上，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彻底揭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把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记者马杰、史博、申启方)

吉林省委常委揭发江青扼杀《创业》 和去年在大寨的反党言论

新华社长春讯 近几天来，吉林省委常委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十六号文件，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

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省委书记阮泊生，常委蒋天录和崔海龙，揭发了江青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重要批示的罪行。他们说，一九七五年初，电影《创业》问世，它歌颂了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可是江青却极力反对，授意文化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把它判了死刑。四月，在江青指使下，文化部把主管文教工作的省委常委蒋天录和《创业》剧组叫到北京，责令省委和长影党委检查。作者张天民想不通，给毛主席写了信。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对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江青极为不满，疯狂反对。

九月十五日，江青在大寨对省委书记阮泊生（当时阮正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说，“此片无大错，还是有错嘛，是写真人真事的，要重新再拍一部片子。有人攻击文化部，我给顶着。为了避嫌疑，主席那里我也不去了。”并且让阮泊生给王淮湘打电话，让王和《创业》的导演、编剧、摄影、主要演员来大寨。

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在大寨接待站，江青当着王淮湘的面，对《创业》剧组的同志破口大骂说：“张天民你告了刁状（指他四月给主席写信），谎报了军情，老娘我要教训你。你们剧组四月份写的检查我都压下了，后来批送张春桥同志，春桥同志一直没有批，我正在考虑怎么办呢。你（给主席）写了信，告了刁状，你说，你是否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不然你斗胆！你要给主席、中央再写封信，主要讲（影片的）缺点错误。再有，你是否建议不要向国外发行，再拍一部片子。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

今年二月，中央召开十二省、市、区来京同志座谈会，江青背着主席、中央单独开会，声色俱厉地说：“《创业》总是有错嘛，我不是让再给主席写封信吗？怎么我没看到？王淮湘你交代交代。”

王淮湘同志揭发说，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主要是九月十六、十七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大放厥词，对抗毛主席，分裂党中央，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主要言论是：

（一）自封为左派领袖。江青说：“苏修说我们党内有温和派、激进派，把我说成是左派领袖。主席说，温和温和，温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只你江青一个人是左派也不好嘛。他们把我说成是左派，我什么时候讲我是左派呀，他们把我们分成左派、温和

派，笑话嘛。”

(二) 分裂党中央。江青说：“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就是怕搞到自己头上，上了贼船，潜伏在党内。看看宋江是怎样架空晁盖的。有的人把谣言材料印发给中央政治局的每个同志，唯独不送主席，我在上面写上送主席。”

(三) 贬低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吹捧美化自己。江青说：“三月以后，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给政治局的同志传达了。有人片面地散布出去，而且是部分内容。有的省份的省委书记带头传达政治局尚未讨论而且是部分的内容。还有人造谣，说我下放劳动，自杀了。”（当张永枚同志说有人把江青比做武则天、慈禧太后时）江青说，“我这个人差不多三天两头有人骂，苏修经常骂我，不骂我，我还是什么共产党员？有人造谣，攻击我，老子不怕。谣言你们愿意抵制就抵制，不抵制我也不在乎。现在主席最累，其次是最累。我每天看四个多小时的书，政治局其它同志忙于事物，连三十三条语录都没学完。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杀头坐牢容易，不死不活地活着难受。我这次来大寨，很自由，在北京不自由。在这里我吃得好，睡得好，体温也不高了。”

(四) 贪天功为己功。江青说：“有人要把文艺革命翻过来，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从一八七一年到列宁留下多少文艺作品？文化大革命前留下多少文艺作品？文化大革命后剧就有二十多台，还有小说，仅长篇的就三十多部，还有中篇、短篇的就更多了。主席讲过，对文艺工作者，只要不是国民党还是要帮的。浩然同志，我还是帮你一把吧。我这次找你们来也是帮。”

(五) 大骂电影厂的负责同志和演员。江青说：“电影厂，长影第一，其次是上海，北影最差，珠影也很糟糕。北影搞‘三自一中心’，就是没搞自负盈亏，因为它赔钱。谢铁骊、钱江连资产阶级良心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无产阶级良心了。电影《海霞》是什么东西！找了个资产阶级大学生演我们的民兵，把眉毛画得很细，选了一批资产阶级阔小姐，就有一个阿洪嫂还不错。《创业》无大错，小错也不少哇。《海霞》是要批的，当前评《水浒》，先不批。”

另外，在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党委揭发材料中说，原本所保育院长华萼（此人已于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文书，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被捕，后来写了“悔过书”出狱。华萼曾说，她的同狱中有一犯人叫兰蘋的，就是江青，和她同时出狱。华萼的丈夫钱保功（该所六室副主任）揭发说，过去华萼曾对他说过，当年在狱中她认识一个叫兰蘋的犯人。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华萼的历史时，她说，如果我是叛徒，江青也是叛徒。

长春市金属材料公司杜宝田（原空四军转业干部）揭发说，文化大革命中，空四军搞了个张春桥问题专案组，组长是杜中。去年杜中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不久突然失踪，一个月后在一条河里发现了杜的尸体。这是否被“四人帮”谋害死了？

（记者苏午辰）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洋奴

中共国家计委核心小组

计委电影电视工业办公室、财贸组的同志，愤怒地揭发批判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电影电视工业的罪行。同志们说，四人帮成天高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国”“最恨崇洋媚外”，动不动就骂这个“洋奴”、“买办”，那个是“汉奸”、“卖国”，甚至闹出“蜗牛事件”的大笑话，实际上，他们闻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看月亮也是外国比中国的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洋奴。

江青使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相纸，甚至连洗印药，都非要进口的不可。她为了搞到洋货，竟采取非法手段，从香港偷运进来。一九七二年，她亲自派中国电影公司一个人，拿着她弄来的通行证，到香港买伊斯曼彩色底片，一次就买了六万米，偷偷地用麻袋背回来。江青对国产电影设备根本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元旦，在电影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她把国产的电影设备一概贬低为“三十年代的”，强令“派一个班子出去，买一些先进的东西，各个电影制片厂配一套。”她一句话，五百万美元就花掉了。电影工业战线广大工人气愤地说：“每个电影制片厂都进口一套外国货，我国的电影工业还要不要了？”其实，他们买进来的东西，有许多并不比国内的先进。例如，录音用的混响器，国产的效果很好，有些技术指标超过西德，每台成本只有几百元，而从国外进口每台花近万美元。我国生产的钢琴，早已出口，国外反映较好，江青却说它是“低档货”，指令为殷诚忠进口美国钢琴，一架就得一万多美元。

四人帮崇洋媚外，横行霸道，要进口什么就得进什么，别人不能有半点异议，否则，不是骂你是“坏人”，就诬蔑你“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系”。一九七五年五月，他们以录制传统节目为名，提出要从日本进口一套录象设备和全套录音设备，价值六十七万三千美元。张春桥批：“这些设备是特殊需要，建议批准，不再传阅了。”事隔九个月，张春桥又批准录象设备改由西德进口，追加一百万美元。文化部在提货单时，又增加了彩色电视中心设备等项目。他们要增加进口的电视中心设备等，国内已经制造使用多年，有关部门专门开了会议，进行了研究，建议组织国内生产。文化部硬是不干，还向四人帮告黑状，说外贸部不肯给他们进口，耽误了时间，要追究责任。实际上，文化部提出的进口货单，超出了原来批准的范围，外贸部当时坚持按批准的货单进口，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四人帮蛮不讲理，质问国务院领导同志，“我们批点外汇，你们为什么不就是不办。”有关部门敢怒不敢言，只好照办。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去博茨瓦纳拍一部新闻纪录片，张春桥就批准进口十二万美元的电影摄影设备，连电线、话筒等也要买外国的，又公然违背外贸规定，硬要由出国人员自带现汇跑到巴黎

市场自由选购。有关部门和工人同志对他们到国外拍电影不用国产设备，很有意见。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以势压人，说什么“国产的不可靠，出了故障谁负责？！”

四人帮大肆进口黄色影片。仅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张春桥打着“了解国际电影创作动态”，“艺术上和技术上有借鉴作用”的幌子，一次就批准进口影片五百五十部，其中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三百五十部，香港二百部，加上其它器材费用，共合人民币一千五百多万元。为了进口这些影片，他们专门派出三个组到世界各地去选购。毛主席逝世后，我国驻香港的有关单位提出暂停进口，但四人帮不干，一再催逼加快进口。四人帮进口外国影片数量之多、内容之腐朽，是前所未有的，比旧文化部厉害得多。他们为了看外国片方便，张春桥还批准紧急从西德进口五套双片道放映机，供他们享用。

同志们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罪行累累，仅从上述事实，就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洋奴，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四人帮”在上海大量选拔培植亲信阴谋篡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权

新华社上海电 长期以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上海搞了大量阴谋活动，进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大张旗鼓地培植亲信，公开叫嚣要向国务院各部委派部长，要向全国各省派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在上海，“四人帮”和市委中某些人，议论中央这个部不行，那个部也不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拚命在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有的已经安插进去了，有的正准备安插。他们内定了许多亲信到中央各部门去掌权，连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人还在上海，就传出某某是中央什么部的部长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蓄谋已久，早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张春桥就多次以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要为党多输送干部的名义，准备夺中央的权。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春桥说，“我们也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根据他的黑“指示”，由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金祖敏亲自挂帅，选调了八十名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培训，准备两年后分配到外事和外贸单位“熟悉工作”，一旦“四人帮”篡权后，即派往国外担任大使。一九七二年八月，王洪文提出“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多次通过金祖敏，布置抓紧进行挑选。一九七三年一月，王洪文迫不及待地指示市委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各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都参加了会议。王洪文也急急忙忙从北京赶往上海，亲自到会上作“指示”，要各级领导抓紧这件事。会后，金祖敏、王日初抽调了大批人力，分赴工厂、农村基层单位进行选拔。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份，物色了二百余名干部，从中选出一百人，集中在工人文化宫办学习班。

这一百人的名单报送给王洪文，王看后大为不满。因为在当时选调干部时，没有完全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标准去办，这一百人中，没有多少他们“熟悉”的。他们只选定九人当“十大”代表。此后，王洪文多次密电金祖敏，要他寻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选。他说：“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让你金祖敏睡觉，你必须连夜给我找出人来”。于是，金祖敏找到黄涛（市委常委、王洪文的心腹）密谋，指名把连“十大”代表也不是的祝家耀、周宏宝、汪湘君、张国权、陈佩珍五人，塞进上海参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这五人中，除了陈佩珍同志以外，都为王洪文所熟悉，对其有感情。“十大”以后，王洪文、张春桥得知四届人大即将筹备召开，以为时机已到，就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份，指示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王洪文强调指出，“十大你们选了一批人，结果没有用”；“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是方向路线性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张春桥也反复叮嘱：“要吸取十大的教训”，“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王秀珍、金祖敏秉承他们的黑旨意，为了

选派“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专门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进行考察选拔。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和王日初秘密赴京，借口汇报批林批孔情况，刺探情报，了解气候。王秀珍在京的七天中，多次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谈。王、张、姚对她作了一系列黑指示。王洪文说：“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青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他还具体提出“冯品德可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头头”。张春桥生怕错过时机，一再叮嘱：“上海市委开个会，抓紧部署”；“还要抓好上层建筑”；姚文元叫嚷“要注意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经过第九、十次路线斗争，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不要怕，林贼和小林贼，他们是非常关心要害部门的。上海也要抓要害部门，抓好电台、报社、机场、铁路、电厂以及港口等单位。”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四人帮”的野心很大，他们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专政工具到宣传工具，掌握和控制越来越大的权力。他们妄想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在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网罗党羽，为篡党夺权作好组织准备。王秀珍对“四人帮”的黑指示心领神会，三月二十九日回沪后，急急忙忙跑到组织组，大谈特谈“四人帮”的黑指示，强调说：“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她还和组织部门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措施。

一九七四年四月底，市委组织组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中央副部长备选名单，报送给在中央学习班的金祖敏。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以为篡党夺权时机已经成熟，加紧活动，大打出手。他们一方面背着党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妄图搞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加紧在中央各部安插亲信，准备组织他们的“内阁”。这时，王洪文指示王日初：“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市委某些领导人闻风而动，坚决贯彻，先后提金祖敏、周宏宝、张国权、王乐亭、吴玉琴等派送中央有关部门。与此同时，王秀珍、金祖敏、黄涛、王日初等加紧活动，搞出一个二十一名部长备选对象名单，印出材料，供市委选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黄涛、王日初等六人，在锦江饭店神秘讨论，逐个研究，正式圈定十六名，连同材料报送北京。

据王日初交代，他们还内定了这十六人要去中央部门：陈佩珍去商业部，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工作，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乐亭去邮电部，沈鸿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张秀清去文化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痛斥了王洪文诬告周总理，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四人帮”气急败坏，暂时收起组阁名单。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又到，“组阁”活动又死灰复燃。王洪文说：“要注意发展一些骨干”，“要锻炼一支反潮流的干部队伍”。张

春桥说，“形势发展很快，你们（指上海市委）要跟上。”在一阵紧锣密鼓后，王秀珍粉墨登场。她一方面布置收集整理几位副总理的讲话材料，印发给群众，组织批判，妄图搞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一方面到处乱窜，煽阴风，点邪火，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在一次组织组的干部会上，她胡说什么“现在中央许多部不行了，七、八、九月，中央各部跟得很紧，只有文化部是顶的”，“邓小平是还乡团头子，下面还有分团长”，“各部老爷不好好看看，不行。那里有长毒蘑菇的土壤，一下雨就发霉，就长毒蘑菇！”她还说：“辽宁过去中央要人不给，现在思想通了，上海也要准备人”，“今后送干部，要多少给多少”。王日初也煽风点火地说：“在天安门事件中，中央各机关只有两个半单位（文化部一个，全国总工会筹备组一个，卫生部半个）经得起考验，那里都是上海的人在主持工作。”他们一唱一和，态度极为嚣张。与此同时，王秀珍布置组织组挑选一些干部，再次准备往外“输送”。毛主席和党中央洞察一切，及时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打烂了他们“组阁”的诡计。（总社赴沪记者组）

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操纵舆论工具， 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一些情况

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

事实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在毛主席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全国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 不要招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 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即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前两条指示。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却别有用心地将“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拿这个题目大做反党文章。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乔冠华同志九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戳穿了他们的伪造。张春桥在文件上批了：“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圈阅后，划了一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他们一面阻止下达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一面又用“梁效”的名义，炮制了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十月四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为他们分裂党，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造舆论。

为了查清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用报刊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情况，我们查阅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十二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六种报刊，现将有关情况简要综合如下：

一、制造谣言，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首先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行文中给人造成一种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印象。社论说：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决心按既定方针办时，公然造谣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报道说：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胡健说，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按既定方针办’。”“学校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森收听了重要社论，含泪再一次向伟

大领袖毛主席表示决心：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对我们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检查对照自己的工作。工宣队员王玄元含着热泪说：‘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二、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从九月十七日开始，特别是华国锋同志致悼词以后，到九月三十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六种报刊，不突出宣传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不突出宣传悼词中强调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而是突出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九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的长篇报道中，都宣扬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广东省、广州军区和广西自治区的报道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从九月十七日到九月三十日，据初步统计，上述报刊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共三百九十八篇，其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二百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五十九，而引用“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只有二十一篇，占百分之五点三。

从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上述各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当作毛主席的语录登在报头上。其中有两、三天只用这一条。

从九月十七日到三十日，上述各报都多次出现“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字通栏标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九月十七、十八两天，都出现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十七日两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文汇报》从九月十七日到三十日，通栏大标题出现“按既定方针办”的共六次。其中九月二十日第五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 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夺取更大胜利”。九月二十一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解放日报》九月二十一日报道上海市百万产业大军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活动中，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九月二十二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郊区四百万人民坚决按既定方针办”。九月二十四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九月三十日的头版正中，还刊登了题为“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幅宣传画。

《解放日报》、《文汇报》九月十八日都在第三版以大字通栏标题提出：“牢记毛主席的亲切嘱咐 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十期，刊登了本刊记者写的文章，标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国庆节以后，特别是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将“按既定方针办”删掉后，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报头上的毛主席语录栏内，仍然刊用“按既定方针办”。直到十月十二日，《文汇报》在报道“一九七六年上海美术

作品展览展出”的新闻中，还继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十月九日，《文汇报》刊登中央两项重要决定的同一天，还在第四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组宣传画，总标题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按既定方针办”。

三、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对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作别有用心心的解释，社论说：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先作了别有用心心的解释，社论说：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的驻清华大学记者组写的报道中说：

“自动化系党委书记邝守仁，留校工农兵学员、机械系党委副书记许凤琴，学习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庄严地再一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决心”，“他们指出，‘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哲学，时刻准备迎接今后十次、二十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永远发扬‘五不怕’的反潮流精神，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彻底破除‘路线斗争不可知论’，随时准备为坚持真理而战斗，让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永远高高飘扬；‘按既定方针办’，就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坚持继续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进行反修防修的大演习，今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也要这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以“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中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袖的时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当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四个醒目的标题宣扬：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文汇报》在“上海军民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的报道中，把“按既定方针办”和《悼词》别有用心地扯在一起，说：

“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向我们发出了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的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文汇报》在“上海一千万军民热烈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的报道中，硬把“按既定方针办”和中央的两项重要决定连在一起。如报道上海京剧团的反映说：

“自从毛主席逝世以来，我们一直惦记着这两件大事，我们是多么殷切地盼望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世代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呵！我们又是多么急切地希望早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以后各卷和《毛泽东全集》呵！现在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这将进一步教育和鼓舞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四、打着“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了上海分社写的《上海干部群众决心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努力奋斗》的报道，说：

上海钟表元件厂“四车间党支部书记丁长根说：毛主席的谆谆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修防修的强大武器，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谁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谁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我们就要同他展开坚决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荣咏霖、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的文章《按既定方针办，同走资派斗争到底！》说：

“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正是毛主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最主要之点。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牢记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刻苦学习、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决实践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同一切妄图改变既定方针的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要始终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我们都要造他的反，坚决同走资派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了驻清华大学记者组写的一篇报道，说：

“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还清醒地认识到，‘按既定方针办’，必然要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走资派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建工系工宣队员吴庄根说，自从我们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以来，和走资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按既定方针办，就必须把眼睛盯在党内，永远坚持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总结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中国钟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文章，说：

“我们只有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长期的斗争，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才能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实践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以“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我们只有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代传下去，方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破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鬼蜮伎俩，看清他们的实质，坚定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徐景贤同志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摘要）

文元同志阅后一并存你处。

春桥、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

同志怕露了底，拼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哪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

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的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蚩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看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同志个别对我说：“洪文同

志那里调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它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 贤 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迟群传达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 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 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件)

一、关于学习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理解，要学好，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到真正理解是相当难的。常有这种情况，在没有知道毛主席指示时，非常想知道；知道以后，好象一下子都懂了，就不太下功夫去理解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都说清楚了嘛。”越是毛主席说清楚了，越是要下功夫去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查查老祖宗的书（马列的书），在那里找不到。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理解。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理解就难以联系实际。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不认真学习，没真正理解，自己的问题就联系不上。

比如，走资派可不可以改悔，该怎么理解？邓小平彻底暴露之前“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以后他的矛盾性质变了，走到对抗性方面去了。如刘少奇、林彪那样。”该怎么理解？毛主席说过，机会主义头子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改了吗？没有；张国焘改了吗？没有；瞿秋白、王明、高岗、彭德怀改了吗？也没有；刘少奇、林彪、直到邓小平改了吗？都没有。一个改了的也没有！国际上也是一样，从普鲁东到伯恩斯坦，从考茨基到托洛斯基，从布哈林到季诺维也夫，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他们改了吗？没有一个改了的！纵观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头子，有哪个改了的？！所以毛主席说，“改也难”。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难改。

不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不可能认识斗争的长期性。有些同志认为搞得差不多了，斗争中的差不多思想同斗争开始时的吃一惊、吓一跳是一致的。先是“吃一惊”，后来就觉得“差不多”，下次再“吃一惊”……，几乎成了规律。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影响很深！再就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说“走资派还在走”？为什么它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并不见得真懂了。过去有的同志不明真相，觉悟不高，一时跟着他们跑了，说了错话，改了就行了。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否则就成了不许人家革命，连自己也否定了。历次运动中总有一些人跟不上，有人犯错误，总要拉他们过来，不然的话，怎么能取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所以说，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反复讲，经常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理解。

有些单位出现厌战情绪，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它恰恰说明了，要深入领会

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学好两报一刊这篇文章，还要持久地花气力。我们的教训是，往往一边在讲毛主席指示，一边又上走资派的当。阶级斗争是纲，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毛主席几十年来一直讲，但是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承认它，在实践中清醒地坚持它，却并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批判过了，声名狼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地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为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二、学习的重点

学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这篇文章要有个重点。重点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重点就是：走资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从这个问题看到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它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篇文章批邓，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也还是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文章讲到斗争没有结束，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仍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里包括了许多问题。我们是站在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旧痕迹，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讲到教育阵地，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授，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养了新的，但也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基本照旧”，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外，也差不多。主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然后主席又讲了一段话，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民主革命后，列宁为什么没有停止？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官”压他们，所以要革命。走资派“大官”要维护他那个既得利益，汽车、楼房、高薪、服务员，他那个“根据地”，他怎么能继续革命呢？打起仗来先想到坛坛罐罐，扛不动，一个军队都拉不走，他怎么能打仗，怎么能革命呢？！所有这些，概括起来讲，还是走资派问题。

文章最后讲形势和任务，还是围绕对走资派斗争这个问题。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搞清楚走资派的本来面目，阶级实质，他们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比资本家还厉害，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搞清楚这些问题，其它问题就容易弄懂了。有人问，是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害是把走资派问题搞清楚。邓小平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邓小平，还有一大串人物，直到吴晗、廖沫沙，挂帅人物是刘少奇。林彪的下边有陈伯

达，黄、吴、叶、李、邱，大小舰队，死党，林彪挂帅。这次邓小平，下边已经点了好几个，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光这几个人还成不了气候，但挂帅人物是邓小平。批判的大方向、重点，是批邓，偏离大方向就是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批判的大方向，深入下去，进行到底。包括搞好清查。

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

“和平演变”是相对而言，本身也包括不和平的一面。苏修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这个问题。复辟的行动并不是不知不觉、舒舒服服地过去的，只是没动用飞机大炮就是了。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他们的一个拳头，看一看有的省市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就知道了。有的同志不太理解，就是因为没搞到你的头上。党内资产阶级要复辟，他们要付诸行动，先造舆论是不够的。当然不同于出动飞机大炮，因为那样更容易被人们识破。然而武装政变、右派政变是可能的，林彪不就企图这样搞吗？！当然，这在中国是不容易的，搞政变是可能的，但肯定是短命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是反革命暴乱，他们会冲击中央驻地、人大会堂、中南海，会夺取电台，发表所谓告全国人民书（实际上是反革命宣言），会呼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兵，建立国际的反革命同盟。这种情况在国际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肮脏的记载。56年匈牙利事件中，纳吉就呼吁帝国主义出兵。所以不能低估天安门事件的严重性。

四、关于走资派的面目

十大文件里有一句话：“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当时是针对第十次路线斗争讲的。这次同邓小平的斗争也差不多，七、八、九月一些人跟着说，跟着搞了，有的地方没有派性也跟着反派性、整顿领导班子。

一个时期攻击毛主席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四起，同时又大肆吹捧邓小平。刘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搞到学校来，并且急于要传达。我们告诉他们，需要请示市委后再决定传达不传达。下午回来告诉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但他们已经传达下去了，就半天时间。“老九不能走”，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毛主席不会这样说。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一个，“老九”不是我们的语言；第二，“不能走”，怎么走了？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从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交待，已经充分暴露出党内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狗屎不如。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象挺“左”的，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不能犯了罪就不算了！有的人他还在布置清查呢，恶毒的政治谣言不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干脆把那几个人的交待公布于众。我们说现在公布不策略，讲原则性还有个灵活性呢，不能只求一时痛快，不能那样干。说那些人犯了滔天罪行，一点也不夸大。对他们的疯狂性、危险性、顽固性、斗争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可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有你就没有我，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点都不能含糊。但处理上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无产阶级应当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学校的斗争讲一讲，特别是在干部里边讲一讲。那时候刘冰几个就是同我们对干，但是双

方谁也没挑开，象演戏一样。他到处讲跟线不跟人。其实他连起码的马列主义都不懂。人和线是分不开的。怎么不跟人呢？共产党不跟马克思、列宁，不跟毛主席行吗？不崇拜马列，毛主席行吗？那还是共产党！？他们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根本不懂马列。

五、关于斗争策略问题

我们出去开门办学，有一条原则，不介入。就是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搞运动。由于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考虑到全局上的复杂情况才这样规定的。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斗争要有策略。我们过去已有些同志上过一些当，和人家一块贴大字报。今年，有个县要开常委扩大会，有两派，要求我们参加。两派怎么参加啊，即便是一派也不参加。他们开的是常委扩大会，引到历史问题上来，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有人会利用清华的影响造成很复杂的情况。如果是开批邓大会，要我们发个言，贴出大字报，那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走资派对运动的抵触，不只是什么加夜班费问题，你去说两句他能听吗？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个过程。有的同志急躁了，而走资派正希望你急躁，急躁了，就可能在策略上犯错误。所以我们要斗，要有革命造反精神，但策略问题上也要注意。

六、目前形势下斗争的特点

走资派现在怎样走的问题。目前还有没有正在走的走资派？谁也不会说没有。既然有，怎么在走？当前形势下很值得我们研究。那种公开抵触的是一类，有的人并不是这样，他相当积极，有干劲，追查反革命和谣言，他还亲自挂帅追，但不是真追，是假追，为了保护自己，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有的追谁呢？追的不是反革命，而是追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中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有个地方，邓小平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了。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年老体弱，有病不能工作的人，去年都被请出来，提起来，当第一把手。他们在干什么呢？首先组织班子，你们想他能组织什么班子？他们也讲话，讲的是什么话？他们能执行什么路线？这些人心里不仅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阴魂不散，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积下的怨仇不解。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平均年令52.4岁，地委书记54.7岁，省一级干部40岁以下的只有一个。有一次提干，统统提的是60岁以上的。我们不是说老的不行，毛主席说我就是最老的，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前推行错误路线，文化革命中有气没出完，所以去年邓小平一声令下就杀气腾腾地出来了，有的人带着氧气袋来整革命派。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包括老、中、青的。

七、关于斗争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

毛主席讲，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又讲到斗争、矛盾，讲到一万年还有矛盾。主席这样讲，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监督“大官”们了。

走资派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就是主席早就讲过的保护既得利益，甚至讲过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是说让中央、省委的领导都去住平房，那样也要犯错误。但有的人连儿子、孙子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这些人在考虑什么？所以问题是路线。资产阶级的

欲望越来越高，没有止境，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剥削也越来越多，贪得无厌。一座小楼，还有两座小楼，这是他的“根据地”；设备还要最好的，差一点也不行。高薪还是纸面上的，不在纸面上的远远超过他的高薪。我们清华职工借家俱还要扣点钱，走资派那里沙发、地毯、风调设备，你从“高薪”里扣？他才不干呢！

所以说如果苏修出兵来了，这帮人能象邓小平说的那样，横下一条心，拚老命干？我看是相反地干，去当投降派。有的人一重新工作就讲，东西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那么放。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放东西的位置，他是在示威。邓小平盖房子，面积虽没有林彪的大，但高级得多，其实他现在住的本来就很高级了。

走资派在一段时间里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什么“五子登科”之类，有的人一听以为是邓小平关心群众生活。其实，不说全国的，你邓小平到清华来解决一下两地分居和房子问题，试试看，他们讲的都是漂亮话，搞的是修正主义，要拉人们跟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群众生活应该关心，每年党委都要化一定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每次基建劳动我们都参加。生活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社会问题，首先要讲革命的需要。另外还有前边讲到的那个“老九不能走”，这个话是煽动和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是对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否定。就是要继续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统治文化宣传部门，专无产阶级的政。有些人听了很高兴。我们针锋相对地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强调掺砂子，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强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从根本上关心爱护知识分子。而邓小平则是坑害知识分子。

走资派是骗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去年最早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东北有一个铅锌矿就拒不执行。

天津小靳庄在刮东风时，什么人都跑去，报社、出版社、县里，都派人。刮西风时全都撤了，只留县里的一个人，还是“观察”的身份。小靳庄的同志说：“一个也不要，给轰走！”那时候小靳庄受到的压力我是知道的，但我也使不上劲。一些出版物提到小靳庄就不让出版，小靳庄的名字到处都要拿掉，可见压力之大。小靳庄的同志不吃这一套，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他们团结战斗，硬是顶着干，一直顶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年，他们粮食产量过了长江；原来的水不好，又打了甜水井，喷灌也有了；还自力更生盖了好多新房。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干了这么多事情，真了不起！他们不搞歪门邪道。工分值高达一元三、四角，社员只拿一元，其他公共积累。粮食也多，一年能有七、八个月吃细粮。小靳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他们集体种自留地，发给社员菜票，凭菜票去领菜，清除自留地的私有观念。因此社员们收了工就可以去上夜校、学唱样板戏。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榜样。

八、关于批邓联系实际问题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邓要不要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抓阶级斗争，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会说，这是矛头向下，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的头上，解决你的问题，当然把问题搞清了，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这些问题不解决行吗？我们就是要整这些问题。

迟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清华大学 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九日讯 九日下午二时半，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共八百人参加，校党委书记迟群极其沉痛地在会上宣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全体同志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起立默哀后，校党委副书记荣咏霖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通知和吴德同志在北京市委的讲话。接着，迟群讲了话。

迟群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通知精神和市委的部署办。我们学校是毛主席亲自关怀的点，每一场大的斗争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我们要继续为毛主席争光、争气，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前，就是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守岗位，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把各项工作搞好。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的民兵师要真正做到毛主席教导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各单位要加强战备值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了解群众思想动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专政对象要严加管理，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学校一切活动在校党委统一领导下安排。迟群强调指出，我们要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把毛主席为我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五不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就看到无产阶级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他们不怕孤立，坚持斗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包括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头子的破坏和捣乱，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必胜，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毛主席在党内曾经遭到十几次排挤和罢官，十年内战时被夺了权，在一个山洞里生活，相当艰苦，但毛主席并不悲观，指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马列主义必胜。我们要以马、列、毛主席为光辉榜样，不管今后遇到多大的风浪，斗争多么艰巨复杂，都要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我们相信党中央能够带领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大会之后，校党委又召开了系党委书记会议，迟群再次强调，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要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我们要做好一切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清华的期望。

下午四时，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分单位集合在一起，收听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迟群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和 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主席病重时，我准备了一次讲话，请一些同志，准备了一些资料，着重想讲主席的丰功伟绩，主席五十多年来伟大的革命实践，马列是如何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发言还没准备好，主席就逝世了。

主席逝世，中央用了恩格斯悼念马克思的一句话“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损失，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

主席五十多年来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有一位同志讲，自己三次通读毛选，第一次是61、62年三年困难时期，坚定了战胜困难的勇气；第二次，入党时读，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这次通读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五十多年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我们参加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一斗争比夺取政权更复杂、艰巨、时间更长些。我们没有经历前一个万里长征，却经历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万里长征，我们有幸参加主席领导的这个长征，主席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无价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法宝，崭新的法宝。夺取政权胜利后怎么办？共产党怎么办？马恩曾经预言：“党的发展要通过内部斗争来实现”，但他们没来得及实践，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列宁经历了，但时间短，主席领导我们的党五十多年，二十多年取得了政权，由共产党来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这个经验很重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有个比较，斯大林留下什么，斯大林逝世给苏联留下一个大错误，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以隐患很大，不久出了个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主席的伟大。党为什么叫伟大、光荣、正确的，有这么个定语，是因为主席领导，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有这样的比较，才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不要杞人忧天，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什么阶级斗争不可知，前途怎么样，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的赶下来就是了。怎么理解“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还会有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主席思想的坚定性，对主席路线的坚定认识就无法建立信心，坚定不移地同走资派斗，同帝修反作斗争，不然老是悲观失望，对前途陷于盲目性，怎么能革命？主席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六七年主席给江青的信里最后一句话，是结论，这是一句完整的话，丢了哪半句都不行，丢了后一句，盲目乐观，只要后一句悲观，也是盲目悲观，都一样地要失败。二者失掉哪一条，必然陷于盲目状态。

形势是大好的，大好的形势是斗出来的，既然是斗出来的，是和谁斗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出来的，是革命派同走资派斗出来的。既然是这样，就会是长期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当大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许多人泣不成声，悲痛得昏倒在地。收听后，各系党委立即组织大家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多工农兵学员到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好革命接班人。各单位立即挂起了悼念毛主席的横幅。大家都自动带上黑纱和白花。在悼念活动中，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向江青致以衷心的问候。

(驻清华大学记者组)

的。是这个基本形势决定的。肯定在某一历史阶段，可能会出现反复，无非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可能进行多次，有人说搞一次就够呛了，其实是太好了，按革命派来讲，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么讲太刺激人了。如果象邓小平那样安定，就复辟了。你们的团委也不用改名，路线变了。苏维埃的名字也没有变，列宁的故乡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马克思的故乡，一半变了，一半根本没变，一半变了又变回去了。同志们要研究历史。但是历史的总趋势没法改变，这一代变不了，下一代变，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必然的。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列宁都不是中国人。由于毛主席缔造了我们党，规定了一条路线，有主席坚持马列主义，这是我们赖以自豪的。如果变了颜色，我们耻辱，就将背叛主席，背叛马列主义。只有斗，才有好形势。如果邓小平还在挂帅，主席逝世了，那不更复杂吗？幸亏主席除了一大害。因为他向主席保证，永不翻案，主席又让他试一试，当上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结果他一上台，就对准主席。全面翻案复辟，那么恶毒。除了这一祸害，是不是安然无事呢？不是，我们面临艰巨复杂的斗争。要研究政策、策略、方法，否则是要失败的。

作为我，某些时候，可以少讲话，不讲话，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不讲，不能因为走资派害怕，不能因为某些人不愿听，就不讲了。不是我谦虚就不讲了，青年团和学生们的代表会，我想无论如何要见见大家。

我们很有希望，大有作为，因为我们有青年一代，出了一批小将，敢革命，敢造反，没旧框框，没那么多旧习气，敢破敢立，有反潮流的勇气。最近有几部影片，很好，表现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精神，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件，连我都希望有一个红卫兵袖章。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红卫兵的形式造走资派反的，将这场斗争展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小将身上的精神很可贵，这种精神也体现在老中身上。搞复辟的也要一些中和青，点缀一下。我们要的青是扎扎实实干事，按接班人五条，埋头苦干的。跟你们在一块很高兴，我们多大也感到年青了。我们年青时比你们差多了，我们当时单纯，简单，没你们丰富、太幸福了。

希望团委，上管改委员会要把工作搞好，把份内的事搞好，上管改口号本来是清华喊出去的，影响到全国。去年人家要取消上管改，我们要恢复过来，现在你们又叫上管改委员会，那就得把这份工作做好，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也要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指导。共青团的任务也一样，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离开反对资产阶级，都要迷失方向。讲形势首先讲政治形势。同走资派斗争的形势好，抓住了这一条，才能抓住具体的路线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今天重读一下，有何感想，建议你们重读。还有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主席的一些讲话，主席公开发表的指示。还有社教的批示，六六年致江青的信，巡视南方各省市的讲话，四号文件，至少这四个要认真学。四号文件不多，可印发给大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不是武装几个人，这四个给大家讲，连反革命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讲，有些人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老九不能走”，可彻底呢，当

然，传达要有步骤的来，是应该的。

清华不能自满，最近江青同志多次到农村分校和同学们座谈，也算是考试，考得怎么样，江青问一个人读一遍社教批示，他说都明白了，江青问：走资派为什么比资本家还厉害，结果他讲了半天也没讲到点子上，讲了半天，连资产阶级法权也没讲到。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自满，主席的指示不是一下子都懂的。路线对了头，六十岁也能管青年团，路线不对头，十五岁也管不好，这儿（注：指清华）管不好，团中央也是空的。

共青团，上管改都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党委路线不端正，你们就轰，目标是要革命。你革命，我也革命，就到一块来了。有个不革命的，唱对台戏也好，经常提醒我们。清华有刘冰就好，有个对立面，要是能有这一天多好，刘冰能出来接待外宾，说：“我就是那个反对毛主席的在清华二万多人中十分孤立的刘冰，现在我改了，人家又用我了。”如果行，我都可以给他马上检查，错了就改，我们欢迎。当然顺着他不行，还要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复杂，走资派不好抓，有的人还见报呢！有的错了，又改。一睁眼，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也存在。

现在，清华摊子越来越大，书记就这么几个，都来了，小谢病了，住院了。农村分校也越来越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太需要了。还要求办兽医、财会。我这个党委书记心中有愧，绵阳分校的同志都没见过，几次想去没去成。今年曾下决心要去，后来点名批邓，六月份主席病重，后来决定不能离开北京了。后来又报了主席病情好转。9月5号，又发了个通知，实际上，9月2号就病重了。

凡事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主席对党员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要分析，以路线为标准，什么都可以变，路线不能变，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发展，不能搞折衷主义。你只要承认基本矛盾存在，那就要随时准备他们复辟翻案，无非是要复辟，无非是五不怕，无非是罢官、撤职，开除党籍，不当官怕什么，我们原来都不是官。去年年底，有人见了我就说，胖了、瘦了，就是不问我骨头硬了，还是软了。你们还年轻，我们也不老，咱们准备同走资派斗争一辈子，才是继承主席的遗志，否则就是对主席的背叛。

（校团委整理76.10.14.）

毛

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远新：

送你现已出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卷一、二分册，四卷一、二分册。尽管有些部分尚不确切和完整，但基本是事实。语言比较明快，好看。写书者的目的且不管，看后，长点中国人的志气，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英国人比中国的走资派的崇洋媚外要好些吧？！

另，送你看一个反动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增加了点知识。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宗明兰同志放的那一炮如果把这句话的辨明关系讲进去，无疑将是划龙点睛。

上次谈话，很受教育，什么是继承主席遗志，这就是。不理解主席思想，讲继承主席遗志，岂不是空话。

望多多保重。

迟 群

十月五日

宗明兰等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给毛远新的信

远新同志：

我们学习小组忍着极大的悲痛，又坐下来学习了。没有语言能表达我们对毛主席深深怀念的心情。因此，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一致决定给你写封信，虽然我们不知道不应打扰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想念你，非把我们的心里话告诉你不可！

我们这些人对毛主席比对自己的父母亲百倍，我们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坐板房也不背叛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事情很明显，没有毛主席能有我们的什么呀？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泥腿子，小教员，小干部，谁能拿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当回事呀？然而，就是这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竟然可以在省一级的大机关里出出进进，指指点点，说长论短，毫无卑怯的奴颜！为啥呢？还不是有毛主席给我们掌腰作主吗？如不是毛主席明察秋毫揪住了邓纳吉的尾巴，使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这些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红祸”的“勇敢分子”“派头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简直要把九斤老太似的老爷们的眼都气炸了！）还不是被镇压、打击，迫害于死地吗！细属（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无不浸透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查查我们前进的每一个足迹，无不印着毛主席路线的培育。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那样和毛主席息息相关，血肉相联。怎能想象我们没有毛主席呀！但是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眼泪只能表达我们的感情，

代替不了战斗。从现在起，我们要把革命视为生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视为粮食和空气，不管党内资产阶级怎么以势压人，不可触犯，不管前进的风浪多么狂动，我们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号召——我们信赖党中央，它和我们工农兵是紧密相联的，正象列宁悼念伟大的工人阶级领袖斯维尔德洛夫时指出的，要选一个同等能力的人去代替他，那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从无尽的源泉——工农群众中选拔出大批忠于他们的优秀人材，遵循去世领袖们的方向前进，去完成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任务是势不可挡的。毛主席领导的五十年革命实践，是世界上传奇般的特殊政治大学校，它培育出了千千万万世界上最优秀的，英勇善战的，视死如归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这是我们的事业不可战胜的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这些忠于毛主席的人是不容许党内资产阶级掌权的，即使他们靠狡猾欺骗爬进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他们也是短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实，也看到了苍松周围有乱云，我们作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走曲折的路。别看我们是普通的人，但我们却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我们横心作资产阶级眼里“刺头”了，何止“刺头”，还要做利剑，直刺他们的狗命！说到这里我们有沉痛的教训，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你和其他领导给了我们一片热心的帮助，可是我们至今还是蜗牛的脚步，还仍然呆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堆里不得解放，以至给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当了推销员！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刻苦学习改造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工农兵的本色，努力团结多数（特别是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革命推动作用。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今后漫长的斗争风雨中请你考察我们吧。

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就是希望你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你，就更加感到需要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千万千万注意呀！

我们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都紧握你的手，向你致以热切的阶级问候！我们计划自学四卷，集体重学五卷，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请批示。

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明兰、吉忠、久祥并学习小组诸同志：

来信收到，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安慰与鼓励。同志们说得好：眼泪代替不了战斗。哭泣之哀，实非英灵之所愿，我自己会注意的。

建议同志们认真学习近年来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近一年来，主席指定我给他担任联络员的工作，主席逝世后，我这个小传令兵已申请归队，我的岗位在沈阳，估计会得批准的，到沈阳再见。

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委一些人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初步调查

新华社上海讯 关于上海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记者作了调查，现将初步调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策划反革命暴乱的过程

十月七日晨，中央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上午九时，市委召开常委会，马天水同志在会上说了此事，并商定到京后两小时就给家里通电话。

当天，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情绪紧张，他们急急忙忙分别给“四人帮”的王、张、姚和迟群、谢静宜等打电话，均未找到。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于会咏、祝家耀、周宏宝，要摸中央出了什么事，这些人都不知道，并告诉他们没见到王、张、姚。马天水约好的电话，也没有打回来。这时，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更为紧张，第二天（八日）上午即召开常委会，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一起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同日，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北京，王秀珍亲自布置缪到京后赶快打听“四人帮”的情况，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这天，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和缪文金分别用暗语打回电话，说明问题严重。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当即胡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于是他们便加快了搞武装暴乱的步伐，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策划。

八日下午四时，徐景贤、王秀珍召集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宜爱和民兵指挥部的李彬山、施尚英、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开会，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八日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召开常委会，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于是，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工作就紧张地开展起来。当时就决定分三路准备：一路由徐景贤带领，抓笔杆子，搞反革命舆论，转移到了丁香花园招待所办公；一路由王秀珍带领，抓枪杆子，转移到民兵指挥部办公；再一路由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在会上，还决定设立个秘密联络点和组织武装民兵值班。

这天晚上，策划活动十分紧张。徐景贤、王秀珍除了布置民兵外，还要拉军队。当晚十一点多钟，他们把平时紧靠市委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找去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

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还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九日凌晨一点了。李仁斋到了丁香花园招待所，他住在一楼，徐等住在楼上，过了不久，徐景贤亲笔给他写来了一道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记者注：刘是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电台第一把手，紧靠上海市委）同志的指挥。三连（记者注：负责康办的警卫工作）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李仁斋接到徐景贤的手令，没有报告警备区，便直接向连队下达命令。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当晚十一点多钟时，王秀珍带着三十多人窜到市民兵指挥部。他们当中有：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汪湘君、廖祖康、吴立义、施尚英、马振龙、钟宝栋等。王秀珍再次胡说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并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地方要起来造反。廖祖康煽动要罢工。在他们的煽动下，这些人大放厥词，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歇斯底里地叫嚷，要和中央对着干。他们制定了民兵行动的方案，确定了建立秘密联络点。这些人一直策划到凌晨三点多，这一夜他们没有睡，接着就分别进到黑据点里去了。

十日，徐景贤、王秀珍接到上北京开会的通知。他们准备到北京决战。走前还作了布置。要叶昌明等人坚持斗争。

十日、十一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警备区的几个人因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再参与了。

十二日晚八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了秘密的反革命黑会，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胡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王知常中途来到会场，他一到会场，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说：“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可以象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据黄金海本人交代，他与其他人一起还拟了二十

条反动行动口号，铅印了一百〇三份，因阴谋败露，后销毁。

十三日凌晨，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周、徐、王十三日上午都要回来了，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竟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十三日上午，叶昌明、汪湘君等人得知马天水等人回来的消息后，还继续顽抗，以市总工会、妇联名义，找区、县、局工会、妇联负责人开会，继续造谣，说中央发生了“政变”，要民兵继续维持一级战备，要“召之即来，血战到底！”并要各区工会、妇联负责人往下“吹风”。企图造成混乱。

未遂反革命暴乱的实施计划

(一) 密谋策划上海各新闻单位(电台、报社)配合反革命暴乱，大造反革命舆论。(1) 不登党中央有关揭露“四人帮”的决议，向上海人民封锁党中央的声音。十月八日下午四时，徐景贤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命令。”当晚，朱永嘉对解放日报王景说：“报纸宣传要多登自己的，要准备坚守阵地。如果新华社发出什么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报道，你们不能登，这是右派搞左派。”(2) 准备发表上海《告全国人民书、全世界人民书》等反革命宣言。(3) 为反革命武装暴乱大造反革命舆论，蒙蔽和煽动一些人对抗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月八日晚，朱永嘉要电台播送两首歌(这两首歌中央台已通知上海台不要播了。其中一首是《按既定方针办》)。朱对电台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听中央台的，继续播。”

(二) 策划建立秘密的反革命暴乱指挥所和单线的秘密通讯联络系统。民兵指挥问题，设了两个秘密指挥点。第一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以下简称江南点)；第二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简称中纺机厂点)。江南点设十六人，其中有七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十三人，其中有六个报务员，由吴立义、邱玉泉(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负责。九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 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十一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十二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没有实施。(2) 秘密电话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陈振安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 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陈振安再转告江南点。(4) 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没有实施过。

(三) 滥发枪支弹药，大搞暴乱民兵武装。这次市委一些人搞了武装民兵三千二百六十人，配备一百辆卡车，二百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还搞了预备队伍三万五千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上海全市民兵现在武器装备总数二十二万余件(库存一万五千余件)，有各种步枪、重、轻机枪和各种火炮。各种弹药按每件武器的半个基数下发。凡下发的武器弹药，一般的情况是郊区各县发到公社(沿海地方除外)，市区发到工厂，规定党委管弹药，武保组管枪。十月八日至十三日，上海民兵发放武器情况是：(1) 市民兵指挥部批准下发手枪六枝，子弹二千三百五十发；(2) 有些区、县也有下发武器弹药的情况：黄浦区枪六十枝，子弹七千五百发；长宁区枪二十枝，子弹四千五百发；杨浦区枪五十枝，子弹五千七百六十发。据杨浦区民兵指挥部反映，十月十二日，国棉三十厂、吴淞化工厂还向区民兵指挥部提出“要与区指脱钩的问题”。据市民兵指挥部介绍，在这次预谋暴乱中发给个人的武器弹药，均已收回保管在基层单位。

另外，今年七月，市委批准下发了七万余件武器，上海警备区和市民兵指挥部有关同志，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很可能是上海市搞民兵反革命暴乱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四) 民兵武装“保卫”重点目标和上海的方案。

十二日晚，钟定栋首先提出要搞一个重点目标武装保卫的方案。江南厂点的人研究了民兵要对康办(康平路市委办公所在地)、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没有进点。

钟定栋还说，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章金根根据钟定栋在地图上圈的点，拟了方案，并叫蔡韧(办事组副组长)写：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包围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包围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包围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以上方案未来得及向下布置、实施。

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上海人民对这起未遂的反革命暴乱，十分气愤，一致要求迅速揭开市委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可是，自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以来，市委对预谋暴乱事件的内幕还未作出认真追查，其主要原因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至今还没有同“四

上海黄金海等人在策划武装暴乱时炮制反革命口号的经过

人帮”划清界线，立场还未转变过来，特别是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参加策划的一些骨干分子至今还未交代问题。不仅如此，徐景贤还胡说，工人民兵搞暴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王秀珍还企图把策动民兵搞暴乱的严重责任下推。

据市委书记马天水说，下一步市委将分题目开些会把问题一个一个地弄清楚，他说，当前要弄清两个问题：（1）把反革命武装暴乱从头到尾的经过搞清楚，向中央写个报告，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2）搞清同“四人帮”的联系和影响。

目前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没有弄清楚，（1）十月七日，马天水同志去北京前是否已经有了谋划？因为他的秘书房佐庭八日同徐景贤通电话，说“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房过去并没有胃病，是否去前已定了暗号。我们多次问房，他表示是双关语，一是确有其病，二是暗示“四人帮”出了问题，一直否定走前定有暗号。（2）“告全国人民书全世界人民书”以及其他一些反动的纲领性文件是否已经搞出来了，至今未拿到实据。根据十二日晚，朱永嘉等人的嚣张气焰来看，这些反动文件搞成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对一些反动家伙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动证据可能已被销毁。（3）这次发放的枪枝弹药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等等。

（总社记者组）

新华社上海三十日电 在上海市某些人策划的反革命预谋暴乱中，黄金海等人按照徐景贤、王秀珍要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干的反动意图，密谋拟定了二十一条反革命口号，企图印发张贴，以蒙蔽和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四人帮”招魂，猖狂地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这伙人怕阴谋败露，已偷偷销毁罪证。

据参加炮制反动口号的一些人回忆，这些口号中有的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有的含沙射影，有的恶毒攻击。主要口号有：“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决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

黄金海等人策划起草反动口号的经过是：

十月十二日晚，黄金海说，要干（指搞反革命暴乱），首先要造舆论。他要王尧鸿（市水产局东海渔业指挥部领导成员）议一下张贴的标语口号，第一步正面的，第二步要有针对性的。王和江南造船厂吴斌等人共拟了十七条，其中有几条是含沙射影的，由国棉三十一厂邹天龙交打字员打印约四十多份（未散发）。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许，王明龙（市总工会常委）拿出打字油印的标语口号对唐行南（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说：“你看看，文字上把把关。”唐又根据黄金海等人的意见在油印单上加了四条反动口号。据唐行南交代：拟的这些反动口号完全是把矛头指向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当时加后四条反动口号在场的有：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沈涵，市总工会常委王明龙、马振龙。他看了十七条口号后说，文字上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在十七条“防止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防止”二字不力，是否改“决不允许”，沈涵说：“对！这样有力。”接着黄金海、戴立清（市总工会常委）进来了，黄金海说：再加一条“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戴立清说：再加一条“决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马振龙说，最好加点有号召力的字句：“要团结起来”等等。叶昌明、沈涵说：对，是要有号召性的内容。黄金海、马振龙提出加“全市、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接着这伙人同意加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改后，王明龙又拿到国棉三十一厂交邹天龙负责打印。这次共打印一百〇三份（未散发）。十三日上午，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返沪，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上海市某些人策划反革命暴乱的阴谋，参加炮制反动口号的首要分子黄金海等人妄图逃脱罪责，要王尧鸿、邹天龙等人销赃灭迹。十三日夜，王、邹等人把两次打印的反动口号连同底稿等罪证一并烧毁。

（总社记者组）

其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

省委领导和各位同志们：

咱们来大寨参观学习，至于参观一路上的体会收获就不准备讲得更多了。对咱们山西省的同志们这样的热情招待和欢迎，感谢的心情也不准备多讲了。要不这么大的一个会我要讲这些东西恐怕太自私了吧！生来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所以，压力再大我还是有信心把话讲得好一些，如果我要是讲不成功的话，那这么几千人我恐怕就犯罪了，罪该万死。真是的还是生来第一次的。昨天在昔阳讲了一次，大家都不太理想，人哪差点没有讲散了。今天依靠大家捧场哪。

同志们，光辉的一九七五年过去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又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刚开始的日子里边，大家时刻不该忘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努力想拼命的向大家来说明白的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主要危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呢？修正主义必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咱们教育战线就当然如此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结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党的基本路线阐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大又重申了这一点。要认识修正主义在我们教育战线也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下历史，因为，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苏联在一九一九年，也搞了一次教学改革，当时苏联主管教育工作的是列宁的夫人，卡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同志，她遵照列宁的教育思想批判改造了沙俄帝国主义传流下来的旧的教育制度，为苏联开始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破除了很多的资产阶级的陈规戒律，提出了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正是教育界的改革刚刚开始，就被苏联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疯狂地镇压下去了。在我们国家里边呢？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边，教育革命第一次的在我国蓬勃地开展起来，当时，象我二十几岁的人刚刚记事。曾经记得当时真是一破旧学校几千年，学校开始和社会息息相通了。工人、农民选送上大学，厂办学校，校办工厂，函授教育，多种形式办学，等等吧。大量的新生事物涌现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很快地就被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镇压下去了。一九六一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高教六十条，开始在我国全面地推行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整整的统治了十七年。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再呢，仅仅是在一九七二年出现了一股右倾回潮。资产阶级刮起了一股批极“左”的妖风，其实就是要反攻倒算，要革造反派的命，把林彪形“左”实右的帽子扣在我们身上。资产阶级也象一九五八年一样地骂我们，质量低、乱糟天，最遗憾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在反动的势力压力之下，低头认错。《决裂》电影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通过

那个电影，研究和分析使我们对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有了更初步的了解。总结整个十七年的历史教训，所以，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在四届人大会上主席又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且要使全国都知道。一个是要广大群众都知道，今天又告诉我们要使全国都知道。主席的再三强调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为什么说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呢？我们看是有着它非常深的思想根源，有很深很深的阶级根源，有特别广大的社会基础。单就这个问题愿意和大家讨论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是个历史结论。十七年，我们又对教育战线有两个基本估计，可是这两个基本估计，至今仍然有些人不服气，不理解，甚至有的人抱有抵触情绪。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首先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思想路线上来看，封、资、修的教育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从教育路线上看呢？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为精神支柱。从组织路线上看呢？真是封资修盘根错节。我们说盘根错节，有人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就等于客观不存在了吗？首先让我们从十七年我国的教育大权来看，十七年我国的教育战线，教育领域上由刘少奇、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一统天下。下有四大金刚，八大怪，再下边条条专政、块块统治，也就是说十七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里边到处布满了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有些人对十七年的基本估计就是不服气。我们可以搞个调查吧！如果我们把十七年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检查一遍，请问有几个大专院校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又有几个大专院校他们执行的不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再把十七年大专院校的一把手都把他们请到咱们这个会场里边来，逐个的给他们作鉴定，究竟有几个执行了正确路线，恐怕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在这些老干部队伍当中最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犯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执行了错误，甚至于在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投降派。十七年的教育大权，就是这么个基本情况。这就是结论。不管你服气不服气。不管你认账不认账，这是客观存在，这是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见证。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特别特别广，而且至今顽固的存在，至今还有不少人，包括我们党内的有些领导同志，还远远没有和他划清界限。在我们辽宁，有一位抓教育工作的老干部，老资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位老资格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后，十年来，一直大撒手不管，消极怠工，你要说他不管吗？十年来他也管了两次教育，这两次教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管得呢？第一次就是在一九七二年，人家搞右倾回潮的时候，这位老资格，老干部跳起来了，要反攻倒算，大喊乱糟天。抓第二次教育，就是一九七五年后半年，右倾翻案风，他又一马当先。在我们沈阳农学院，也有这么一个老院长，老资格，十七年他不辞劳苦，起早贪晚地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是头发都干白了，蹶着屁股干，可是现在呢，教育要革命啦，他老人家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倒不干啦，搞消极怠工，可见这些人对教育革命格格不入达到什么程度，对旧的教育制度又是多么留恋。

我们学校这位老院长，在一九六五年间他曾经组织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农业教育大全”，就是中国的农业教育学，其实就是苏联反动的教育学家凯洛夫，他的教育学在我国教学战线的翻版充满着修正主义的黑货，由此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系，在我们这位老院长脑子里边不光光成形了，而且都写成经典著作了。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就是根深蒂固。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如果完全去依赖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极大的矛盾，完全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粗手大脚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农民上大学，都是破天荒的新鲜事。有点无产阶级感情的人都有说不出的痛快，真是大快人心。咱们山西昔阳的一条经验根本在于路线、关键在班子，这是一条真理。对于我们学校那位资格很老的老院长的问题，第一需要我们帮助他改正和认识错误，第二需要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当中去教育他。可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他抓了几十年教育了，已经成型的教育思想和他那非常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要想在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让他彻底的转变相当不容易的。八、九年时间啦，工作我们没有少做啦，我们等啊！等啊！等了一年又一年，转变了没有，一点也没有转变。从理论上也没有服气，从态度上更是顽固，一直对教育革命抱有很大很大的抵触情绪，而且满腹牢骚，搞消极怠工，这样的人我们帮他搞路线分析，做他思想工作，提高他认识。可是呀！人家比你更高明，一点也听不进去，不改，死也不改，硬可把花岗岩脑袋带到棺材里去，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他进行等待，迁就，恭敬，而且，照旧把他摆在一、二把手的位置上，叫他继续统治学校，如果那样的话，我看我们共产党有点太消极啦！恐怕是右倾。十七年我们失败的教训，这个亏就吃在这里面，我们不能这样，决不能这样。今天，我们办教育，也是在搞阶级斗争，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婆婆妈妈的哄着来，不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咱们学校就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对农学院的领导班动一个大手术，听了之后，特别特别高兴，这个大手术我们动啦！现在还正在动。我们彻底的改组了过去的领导班子。在我们的领导班子里边结合了三名工人师傅，从农村选拔了三名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选留了班子当中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年干部，提拔了一批啊提拔了一位年轻的教学干部，而且党委里边第一次的工农兵学员代表也进了党委，在班子里边还保留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党内的老教授，一共由十一名组成。阶级成份大大的改变了。这个班子，这个新的班子，要在资产阶级看来，一个普通的工人当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一个小小的农村公社书记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当大学院长，这些事情啊，恐怕都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这个班子刚刚成立，就有的人就放风啦：说这么能行，大学的领导班子没有几个懂教育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们只知道作工、只会种地。大学呀！搞大学嘛，还得那些教育家，还得象咱们过去那位老院长。而且，还有的人，要把那位老院长请回来。我们说请这位老院长，你们就别想啦。被你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院长，我们派他回家抱孩子去啦，连顾问也不让他当，给他小楼、给他地位、给他高额的工资，给他待遇，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让他当一、二把手。就是不让他继续统治学校，把他养起来。至于外行内行的问题，我们看，我们那位老院长搞修正

主义的智育第一他最内行，出名的内行，顶尖的内行，搞教育革命极大的不适应，绊脚，甚至达到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的程度，别的不谈，咱们就单从办农业大学嘛，单就业务专长来讲内外行我们看，我们那位权威的农学院的院长，全国都有名的院长，如果把他带到农村去，什么内行！我看呀，连五谷杂粮他都认不全，还写书，还写著作，还有的人吹嘘他，还内行呢！我看他内行个屁！有些人老是在下边捧场，说什么老院长有功。什么功劳！十七年执行错误路线，确实付出很大的劳动，很多的辛苦，这一点咱们承认。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严格地讲连苦劳都没有，有点徒劳，白劳，帮了倒忙嘛。帮了共产党的倒忙，什么功劳，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我们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优秀代表，我们的革命干部，我们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观点，有立场，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知道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的需要，他们知道贫下中农对于我们这个学校如何办。有哪些要求，有哪些预望。他们最知道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大学，应该怎么办，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们最理解我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来一场革命，他们也最知道，最清醒，他们进驻大学以来是执行特殊使命来的，是占领上层建筑的，总的来讲，他们搞教育革命，办社会主义大学，他们是最内行的。我们这个被人家称为最外行的领导班子，刚刚改造，刚刚成立，时间不长，学校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朝农就真正走上了正规了。学习大寨呢，已经轰轰烈烈，学校的各项工作大有改观，现在，我们正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下决心动手术就动这么一次，不光要院一级的领导班子要动，中层的班子也要动，下层的班子还要动，一句话，这样做就对啦！上层建筑部门，必须大胆百倍的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份，加强党的班子建设。其实资产阶级搞右倾翻案，他们最注意的最关键的就是在党的组织路线上搞右倾翻案，这一次右倾翻案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所以，要保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施的执行必须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反攻倒算惯用的王牌，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所以，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反我们党组织路线右倾思潮，狠批党的组织路线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克服头脑中的模糊观念，更重要的是要狠狠的批判，我们党以至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把党的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组织路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远远没有受到批判，好多单位甚至都没有接触，理论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没有批判，所以，导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不清，党的班子队伍建设不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性质、目的和意义，没有严格地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些民主革命派，论其社会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边，由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要他们掌权，历史必得倒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掌权，革命就将发展，这种前进与倒退的辩证道理，通过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连刚一上学的小孩子们也都能够懂得的一般道理。

要分析在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的民主革命派，需下很大的力气的。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多数的同志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当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能够坚持继续革命，能够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为人民服务。对主席是有了一些阶级感情的，这样的老同志是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这样的老同志是最可亲可敬的，也是很多的。第二就是在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些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弄懂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不同，根本的转变，他们还是一个劲的坚持偏见，继续在那里搞他们的民主革命，不搞社会主义，这样的人最容易犯右倾错误，最容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确实有。再如，就是一些民主革命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就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人民，对于革命战争时期有点贡献，所以，他们就由商品价值规律所支配，把自己的那点功劳，当成社会主义革命当中的高价商品，当了官啦，有了钱了，没有人再欺负他啦，有了舒服的日子过啦，不愁吃不愁喝啦，达到他们的目的啦，不想革命啦，就把社会主义当成了安乐窝，吃、喝、玩、乐，一天哪在那里打麻将，生活上逐步开始走上了资产阶级化了，逐步的量变到质变，思想政治路线上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不干社会主义革命，搞倒退。在组织路线上也必然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另立司令部，开始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这样的人出了我们党内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官就是走资派。如果他们不接受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教训，死不悔改，搞右倾翻案，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同人民同无产阶级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他们必然要对抗群众运动，运动以后他们就一定跳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反对党中央，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直接发动的，所以，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那些民主时期的民主革命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有一个最需解决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民主革命派向何处去？有不少的民主革命派，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对于人民有功、有劳。但是如果也真的到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时候，当人民群众、当广大的农民分了他家的房子、分了他家的土地，分了他家的财产，他就一下把屁股坐在他反动阶级、反动的家庭、反动的老子那边去了，对抗土地革命，反对土地改革，对抗社会主义改造，也必然的不搞社会主义，混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民主革命派，一下立场就能够转变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一下子就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去了呢？就是因为，这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性质、任务，它们的目的宗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关于民主革命派的问题，这个呀自己理论水平很低，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应当注重研究。现在在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派，他们最大的特点，共同点，就是不承认基本路线，不懂的路线的斗争，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也最容易转变成资产阶级的人物，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些不继续革命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在现实的革命阶段当中，他们都是搞今不如昔，厚古薄今的，他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儒家的。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看作是极左的产物，把一切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看得更是刻骨，一点也不理解，甚至于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两个字也不愿意听，听

了难受，听了刺耳。复旧、倒退、厚古薄今，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在现革命阶段那些不继续革命的民主革命派，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往往是自命不凡，主观武断，搞唯心主义，搞经验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就是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变种，也可以就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大祸根。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用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去顶替党内那些固步自封的因循守旧的民主革命派，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马克思主义、搞共产主义，还是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继续在那里边用民主革命的思想宗旨，顽固地在那里搞民主革命，我看这两样人、这两条路线，也就是前进与倒退的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经过流血牺牲从资产阶级那里边夺过来的国家政权，反过来去交给我们党内的那些民主革命派，去让他们掌权的话，在由这些民主革命派把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的大权，再反过来，交给那些所谓懂得科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去管理、去治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阶级投降派。我们就要犯罪。一般地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些民主革命派，他们到现在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教育革命，这一点是不令人奇怪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否认他们历史功绩，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符合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可一点也不能够去迁就他们那些原则的问题，原则性的错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违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在咱们的革命的队伍当中，几乎每一个同志对于人民能够做一些有利的事，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离开了正确路线去引导、任何人只强调自己的作用、自己的功劳，也只能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同时，如果有的人把他们过去战争年代里那些功劳，作为同正确路线相对抗的资本，那么，他的这点功劳，这点资本，就改变性质啦！就要走向反面，就要搞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真有这样一些人，特别令人注意的，当文化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当革命的造反派把他们拉下马的时候，真是好话说尽了，什么“彻底服气”呀！“永不翻案”嘛！“感恩不尽”哪等等，实际上从路线上不认账，理论上不服输，态度上他也没有服气。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运动当中，凭着几句好话，掉了几滴眼泪，求得了人民的谅解，甚至表现得非常积极，到了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比较明确地看到了，在焕发革命青春老干部队伍当中，还有这样一批政治骗子，由此可见，当初，他们哭鼻子，掉眼泪是在克己，今天，搞右倾翻案，就是在复礼、克己复礼，得志便猖狂，这就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路线。东郭先生和狼这是个历史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在今天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尤其不该忘记。这样的一些人上台了，人多了，势力大了，有了社会基础，还有组织保证，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得意忘形，他们一边疯狂地、狂妄地搞右倾翻案，一边用折中的手法，继续贩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个修正主义黑货。其实他们的种种奇谈怪论，也没有什么新鲜玩艺，都是我们党的八大、九大曾经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我们如果把他们现在的一些奇谈

怪论，从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奇谈怪论相比较起来看，也都是他们自己的老调重弹，仍然是以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以这个东西为基本理论，仍然以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为奋斗方向，推行的仍然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的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尤其是在四届人大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奇谈怪论急聚的增多，小道消息更是数不胜数，右倾翻案也达到了猖狂造极的地步，甚至公开化、合法化了，名正言顺地搞反攻倒算。大家再回忆一下，一年多来，在我国政治谣言到处泛滥，把一些什么人吹捧的神乎其神不得了，简直比主席还英明，把中央某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首长攻击的、造谣的、污蔑的一踏糊涂，真是唯我所用，我们看，这些谣言的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出现，就是我们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奏，也就是在我国复辟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他们做的很好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前些日子在中央，单就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黑信问题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我活了二十几年，这个打招呼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文件，向全国宣布，对反党分子陆定一，宣布最后的处理，也就是政治死刑，大家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处理的死狗陆定一，为什么要在今天处理呢？自己看，他有着非常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们那里是这样理解的，处理陆定一，就是象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们，斩首示众，杀陆定一这个小鸡，给那些蠢蠢欲动的；反攻倒算的搞右倾翻案的那些猴子们看一看，看谁还敢翻案，看他还跳出来反攻倒算，没皮没脸的，不识时务者，和陆定一一样，就是下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手腕。因而，我们必须大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上赶快撤消，宁可提拔应用那些对旧的教育接受不多，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经验缺少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集的垃圾清除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教育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在用最有力的办法，用组织手段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句话，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样做，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资产阶级搞复辟，总是在党内找他们的代理人，总是首先从组织方面采取他们的措施，其实，这一招倒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发明，创造，有些人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话又唠回来了，咱们铁岭农学院搞教育革命，没有很好的经验，但就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辽宁省委的一条好经验，如果全国的教育部门，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能够这样的，果断地采取措施，那么形势不知该有多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危害是很大很大的，几位大人物，几次讲话就把我们全国闹的人心慌慌，好多省都程度不同地往回扭了，后退了，可见，在我们党内，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国家出修正主义的最大祸害、最大危险。以上我们谈到的是上层建筑领导权问题。

再想谈呢，就是我们教师队伍的状况，对于我们的教师队伍应该有个很好的估计，想重点谈一下，尤其是大专院校原有教师队伍的问题。

我们认为旧的教师队伍当中的一些教师，他们基本上是有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有的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地看到，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大多数人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前半生所受的教育是封资修的。他们十七年搞的教育路线也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旧中国带过来的旧的世界观，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当然了，是在向无产阶级来靠拢了，为什么？我们强调旧的教师队伍的世界观，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无产阶级的新的教育大军还没有造就出来，我们文化教育工作当中，尤其是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当中，教学工作当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往往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是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要对旧的教师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和大胆使用，要这样的话，就必须对这个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知己知彼嘛，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中央一九七一年的四十四号文件两个基本估计，也就是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阶级分析，没有任何恶意。解放初期，我们搞土地革命的时候，都是凭着土地、房产、剥削率来考察他们的政治态度、考察他们的阶级立场，来划分成份。到了今天，怎么划成份呢？现在公有制了，基本上是公有制嘛，如果我们再用过去的办法划分阶级，搞阶级分析的话，那么，一般的农民，一般的人口多的工人，恐怕都是无产阶级，挣钱多的，分值高的农民，恐怕就成了中农啦，成了小资产阶级啦。所以，我们对待教师队伍的阶级分析，就必须在思想路线方面，也就是在世界观方面，必须有一个阶级分析，必须搞一个基本估计。有些老同志听到有人把他们划到归属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知识分子范畴之内，他们就不高兴了，甚至于背后骂娘，真不应该，实在不应该。其实也不用别人说，就是请这些老教师同志们自己去掂量掂量，究竟在你们的头脑当中，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究竟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上风，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占主要地位，请问有几个老教师能够站出来说，我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恐怕不多吧？最起码百分之八十的这样的老教师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切实走实事求是的，咱们又不是一定要你说你是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那么个问题，咱们是在搞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在世界观方面的阶级分析，这样的话，能够有力地、促使我们努力地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无产阶级方面来靠拢，也有利于我们对于旧的教师队伍去团结、改造和使用。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基本估计，有的人，尤其是一些老教师同志，不服气，这些人不服气，我们却是很服气。这个事，我都服气。在我的头脑里边就有不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过，再多恐怕也达不到百分之七十吧，基本上还恐怕不是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放过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能放过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咱们是在搞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级的世界观，不能捏在一起，必须划清界线。所以，我们把主席说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这是个真理。所以，咱们在学校里边，在班级里边，经常地开门整党，进行了党内整风，班级整风，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我看哪，都是这个目的，都是在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全面专政，所以，就得衷心地希望这些老的教师同志们对于这个基本估计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应当主观上自己去积极地改

造自己。毛主席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我们理解，教员的问题，主要还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教师队伍的世界观解决了，其它问题，教育革命啦，教学改革啦，教学工作呀，都会迎刃而解的。因为澄清了思想路线，所以说教师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存在的问题，必须注重地解决，正如列宁同志所讲的那样，第一改造旧的教师队伍；第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教育大军。改造当中进行培养，培养当中还得注重地进行改造。我看呢，这就是培养和改造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一条基本方针。尤其是经过文化革命，经过教育革命，有一些老年教师真是焕发了青春，他们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划清界限，吸取了一些反面的教训，又吸取了一些正面的经验，在教育革命当中表现的非常积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一大批年青一代的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教师，也在不断地成长。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的这样一批积极分子越来越多了。不过，不管怎么多，这个队伍同我们形势的需要来看呢，还不大，还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队伍，很多的人，大多数人对待我国的教育革命这个新形势还不能够适应，有的甚至格格不入，这也是个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愿意走老路的人不多，习惯于走老路的人可真不少，这就是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再有，我们这个国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并存的这么一个国家，小生产已经是汪洋大海，这个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那种知识私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就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我国的经济基础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非常顽固的现象，这也是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修正主义思潮，一遇合适的气氛条件就极度泛滥的危险因素，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在武力上被我们打败之后，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之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就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的最后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里边，资产阶级还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党内走资派，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有着很深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有着修正主义良好生存的肥沃土壤。也正象姚文元同志所论述的那样，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也仍然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加上帝修反遥相呼应，再加上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世界上没有过的教育革命，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苏联搞了一次，也没有搞成，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一个样板，只能去完全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探讨、开创教育革命的新途径，这个新生事物，缺少经验，存在不足，有薄弱环节，所以好多问题，好多薄弱环节，就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可乘之机。

所以说以上所说的一切，就足以说明，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最大最大的危险也仍然是修正主义，大家都知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我国的教育阵地开刀的，然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他们也完全可能从我国的教育战线打开缺口突破，一九七五年，也就是今天，在我国又突出的出现了一场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形势非常好，现在，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群众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寨人的精神，充满信心地奋斗着，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二十世纪末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将有一个高度发展，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真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形势一派大好，也就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人们欢天喜地地为了早日实现我

国四个现代化，这么个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向我们的反攻倒算，首先拿教育阵地开刀了，而且首先拿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学校，清华、北大开刀了，在全国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的妖风，这一次右倾翻案风，周荣鑫是罪魁祸首，祸首是谁呢？咱们不知道，这一股右倾翻案风有点象五八年修正主义要扼杀我国教育革命，那个时候那股来头，有点象刘少奇要疯狂砍断三面红旗的那股架势，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那股思潮要利害的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再次猖狂进攻。肯定地说，这次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在党内就是路线斗争，是党内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党内的长期路线斗争当中的又一次的突出表现，大家都记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向党猖狂进攻，我们搞了一次反右斗争，我们看，今天反击右倾翻案，其性质和反右斗争一样的，当然了，这次右倾翻案风的刮起来主要还是表现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地体现在走资派身上，正因为清华、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两个典型，所以，走资派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革命的案，攻击毛主席，就拿这两个学校开刀。咱们辽宁省因为在教育革命当中也坚持了正确路线，搞出了一些新鲜经验，所以，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成了走资派，这个否定文化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开刀的一个重点，自己是一个辽宁人，决不是我们自卖自夸啦，几年来，辽宁省委执行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理解主席的教育思想，都是比较认真的，比较坚决的，我们还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农大——朝阳农学院，也就是说，辽宁在我国的教育革命当中，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和贡献，所以，搞右倾翻案的人们，就要首先砍断朝农这面红旗，借以全盘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革命，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到十二月份，在咱们辽宁，最严重的还是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小道消息可多啦，咱们这些学员在山沟里的大学里边消息闭塞得很，但是，我们有的好多的教员，他们的消息特别的灵通，真是四通八达，他们可能是拿到了周部长的讲话，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来了，过去对待教育革命，一直不热心，不出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们，却从来也没有过的活跃起来，高兴起来了，这一支一直保持沉默的、消极的教师队伍，开始发表讲话了，有些人好象要恢复十七年统治学校的那股元气，腰杆子硬起来了，有点不服管了，好象应该轮到革造反派的命的时候了，反攻倒算，恐怕有朝一日了，他们听到了上面有人喊，说要有热心于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对下边他们就胆敢指名道姓地大骂工宣队。上边有人喊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是对的，但是强调过分了，他们在下边就胆敢把工农兵学员的组织踩在脚跟底下，他们说，工农兵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自己，改造世界观，这是屁话，上边有的人说，基础课的教师都成单干户了，等等，等等，下边就有的人提出来，要恢复老三段教学，要重建基础部，恢复旧的教育制度，那时候，自己感觉很深，过去，因为我多多少少地在学校里边还负点责任，当一个所谓的头头，好多人对我还是比较谦虚，说一些好话，给点笑脸，这个时候，笑脸不见了，好话也听不到了，有点冰冷冷地，那些日子，吃饭吃不下，睡觉也睡不实，半夜睡觉老作梦，作梦不作好梦，死爹死妈，天昏地暗，好象中国要变天了一样，好象有人掐我的脖子，

要掐死我一样，再加上咱们学校条件不好，半夜冻醒了真是觉得寒气逼人，到了十一月的中旬，那时候的压力就更大了，半夜睡不着，就想问题，想的可多了，开会也开不下去了，就到外边走一走，和同学们谈一谈，谈的也特别广泛，我们和同志们谈到了这一次这股来头，非同小可，这是一次斗争，非常严重的，大家从学校谈到社会，从辽宁谈到北京，从小人物唠到大人物，从文化革命以前唠到文化革命以后，从过去唠到现在，又推测将来，越唠越觉得问题的复杂，问题严重，越觉得事情的后果特别可怕，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上课也实在上不下去了，我就给同志们写了一个小条，在条上写着，大概内容就是写着有人要反政倒算，而来头不小，应当反击，就是这么个内容，十月份，咱们班级的同学，对“教育革命通讯”第九期，进行了研究，有很大争论，在全班组织过讨论，观点没有达到统一，因为过去咱们班级写大字报，观点都是一致的，这一次就产生分歧了，分歧还很大，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第十期一发表，所以很自然地就引起了咱们班级的同学们的重视，引起了咱们班级的讨论，这个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刚刚拿到手，看到第一篇文章，就觉得大有问题，看这个题目就觉得不是一般的问题，“教育革命通讯”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评论，评论的名字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说什么正确的道路，仔细一分析，看一看内容就知道了，什么正确道路，言外之意，就是以前的路子不正确，没解决好，我这个是正统，我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修正主义，那篇文章里第一段就谈到大好的经济建设形势，给人们的印象就是缺文化，缺科学，缺人材，然后用四段的篇幅，大抄中央文件，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要宣传的倒不是中央1971年的四十四号文件，他们其目的就是要抽掉四十四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利用一些方法性的问题去扼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五年来教育战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这么一个罪恶目的，紧接着又抄了两段导师的讲话，列宁的语录，我们看它要说的不是导师的话，是他自己的话，绕来绕去的，在最后说实话了，形势逼人哪，怎么办哪，同志们要想一想，最后一段提出问题，又解答了问题，用主席语录解答的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恶毒，什么需要科学家呀，新闻记者，工程师呀等等，就这么解答问题的，整篇文章充满着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目的是非常险恶的。同志们马上就印制出来，问题严重，同志们也就马上就认识了，马上就给这篇文章下了定义，是一株大毒草，然而，也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大毒草，这篇文章却被有些人捧为珍宝，大吹大捧，因为这股翻案风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出了他们的咽到肚子里想说的，又不敢说的话，适应了他们的世界观，加上部长大人讲话，一些消息在他们的耳朵里边已经灌满了。也认为教育革命是过头了，搞糟了，应该矫枉过正了。所以在我们学校里边，就有一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放心大胆地在政治课的讲台上向学员们推荐了“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第一篇评论，说这篇评论对于我国的教育革命有着指导意义，说这篇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战线上是我国教育战线上重新调整政策的一颗红色信号，高度评价。然而，同学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气愤。什么红色信号，他是绿色信号，是绿灯。有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险。必须不顾一切加以批判。也就是在这位马列教员推荐的第二天，我们工农兵学员代表也毅然地登上政治讲台，对那位马列先生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国家教育部主办的权威

刊物提出严厉的挑战，尖锐地批驳。驻院工宣队的师傅们，工宣队长立即站出来，当场表态，热情地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而且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就这样，在我们学校里边一场革命大辩论就开始了。开始就在咱们一个寝室里边，晚上一辩论到半夜，同学们各不相让，吵吵嚷嚷，其他班级的同学，因为住的是楼房，影响人家睡不着觉，都向咱们提出抗议，敲窗户，有的女同学跑到咱们四楼上来给咱们调情，还叫不叫咱睡觉啊！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所以很快地，咱们班支部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就因势利导在全班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辩论。咱们班级党支部很快就达到了观点的统一。在大辩论会开始以前，因为我是班级支部书记，给大家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表态，我们争论的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认识问题，这一点必须肯定。第二不许讽刺挖苦，不许搞人身攻击。第三请大家不要被文章的内容约束，要从战略上，从路线上去看问题。第四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不以个人名义和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以班级教管小组的名义统一发表。紧接着就给大家提出几个思考题，一共有四个思考题：第一个我就讲“教育革命通讯”一共办了三十多期了，为什么七五年的第十期反响这么大，那么引人注目，那么令人高兴。第二，如果一九五八年我国教育革命一直胜利到今天的话，请大家设想一下教育革命的形势应该有多好。第三，“教育革命通讯”那篇评论与沈阳机械学院第一张大字报有什么区别。第四，和我们班写的大字报有啥区别。就这么四个问题。这次大辩论全班同学都动起来了，从来形势也没有那么好，同学们纷纷地翻马列、马列著作，翻中央文件，把三十多期“教育革命通讯”都搬出来了，从头研究，但是，比较遗憾的，对待这篇评论，这株大毒草反动的文章，持赞成观点的同志占上风、大多数、绝大多数。批判派的很少很少，当时学校领导比较重视，咱们总支领导就决定，把这篇通讯打印，人手一份，在全系范围内展开大辩论，这次辩论在一个班，一个寝室，一个系里面辩论也辩论不清楚，没有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所以，当时我就和领导同志们商量，要发动一场全校性的大辩论，所以，过去一般那一个集体里面，那一个班级里面都存在一点派性、宗派，这么一辩论宗派就打开了，形成两个学派，一个是辩护派，一个是批判派，很快地两个派别就扩大到全校。辩论到高潮的时候，学校的两派，各选派自己的代表，能说善讲的同学，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展开全校的一个大辩论，在会场上都是用的麦克风进行辩论，声势比较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但是，毕竟批判派还是少数，辩护派势力雄厚，嘴也多，道道也多，他们都分析说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充满着唯物主义，说我国的各条战线都在调整政策，都在找差距，教育战线也跑不了，说运动快搞完了，应当安定团结了，落实政策，教育革命就是矫枉过正，就是这么个问题，群众运动都是这样，都是这么理解，对待教育革命就是矫枉过正，就是这么个问题，群众运动都是这样，都是这么理解，对待教育革命的形势有点厌烦情绪，不太理解。当时批判派同学压力特别大，有点吃不消，那么多的嘴，周围都是辩护派了。两派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各不相让，连一个裁判员都没有，到那儿去说理呢，压力确实太大，尤其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清华北大的文章发表了“教育革命正确的方向不容篡改”。当时正是早晨六点半钟，同学们上操刚回来，窗户一打开，同学们都提着个耳朵静听，饭都不吃了，越听越高兴。开始的时候，辩护派的同志们都说你看看，有人篡改啦，篡改了正确方向啦，他也不知道怎

么篡改的，还是谁篡改的。后来文章播到有四、五分钟以后嘛，这些同学就觉得不是味，就有所察觉。当时咱们班级批判派的同志，有一个小同志，二十三岁，就从二层床上跳下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到各屋奔走相告，胜利了！这次斗争又胜利了！我听了以后，尤其吧那个广播员是中国第一流的广播员，用非常激昂的声音播送的，高兴得不得了，来到我们寝室里，我就喊，这可好了，我说这才是一个红色信号，这个反击全国都动起来了。听到两校的文章发表后，批判派的同志们欢欣鼓舞，趾高气扬，扬眉吐气；辩护派的同志们就有点受压，有点难受，因为当时他们正处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正在得意的形势之下，所以，听得两校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吃一惊，马上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文章不是孤立写出来的，不能单就文章论文章，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辩论。所以，全班同学全校同学立即统一了认识，一致重新用批判的观点共同去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十期，批判那些奇谈怪论，好多同志就说，无论如何，怎么样我都没有认识到这篇文章是这么大的问题，这场斗争啊，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斗争，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所以，在咱们的总结会上，多数同志们都喜欢作个检查，当时也是有点谦虚啦，有些同志还讲，我的观点错了，我们应该投降，应当接受“招安”，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观点错啦。当时我就觉得，同是一个班级的同学，都是认识问题，这么讲话，这个倾向不好。所以，我就掌握会场，就向大家讲，我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被篡改，教育革命的成果没有被否定，我们大家都胜利了。同时，我就问同学们，为什么这次大的路线斗争能这样快的取得一些胜利呢？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历史的经验，人们都没有忘记，更尤其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咱们是背靠大树，毛主席健在什么都好说，在这场紧张的大辩论当中，我根据同志们的发言纪录整理了一篇文章，这个后来就登在报纸上了，登在《人民日报》，那不是答卷的全文，咱们《辽报》登的是全文，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了张铁生的名字，实在不应该，有点贪天之功，其实呢，是咱们大家的认识，全班同学的观点，我不过是及时地反映出来了就是啦。

沈毅：我简单地就这问题说明一下，当报纸发表了铁生同志的新答卷以后，议论不一样，绝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地看到铁生同志几年来，由于自己主观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自己能够在斗争当中不断的继续革命，在这一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当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大家很高兴。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有种种的想法和看法，其中有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因为铁生同志，这个新答卷的写出恐怕不是他自己的文章，更有怀疑者因为铁生同志是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肯定和中央某些领导有单线联系，所以这次大辩论，这次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刚刚形成，恐怕他就有了了解，上级有个别领导跟他单线联系告诉他了，所以有这场斗争啦！所以，张铁生能够在斗争中写出一个新答卷，这个情况，我们以后呢确实也遇到一些同志，有些好心同志向我们打听，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我们还有点发言权，比较了解，铁生同志要说有单线联系呢，这个只有我们知道，一点没有。他有联系的只有他那个生产队，他现在仍然还是他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因为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呀，不是为了扩大差别，而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当个好农民。铁生同志有句话，他上大学是为了农村，在学校

想农村，大学毕业回农村，坚决当个好农民。他对他那个生产队是经常有联系的。每年他要回去三至五次，安排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直接抓，安排生产。即使不回去，他每年要给生产队写信四五十封，每一封信讲得非常高，讲到路线问题，讲到阶级斗争问题，讲到生产斗争问题，非常关心那个生产队。他至于跟上面一些领导同志确实有些接触，因为他经常开会，有些接触。他接触到一些问题呢，他能够很好地来进一步来研究。怎么很好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时呢，也正因为接触一些问题，他就研究一些问题。比如他关于这次右倾翻案妖风，他的察觉前后，他这个新答卷的写出，这个《辽宁报》的发表是以十一月二十九号这天，作为这一天发表的。因为这一天省委领导同志拿到了，省委领导看了以后，感到铁生同志这个观点明确，路线清楚，很说明问题。实际这篇文章是他在十一月二左右就写出来的，已经写出来了。为什么发表在二十九号呢？这里有个过程，他当时，他方才不是讲了嘛，他组织同学，他现在除了是院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以外，他又担任班党支部书记，他组织这个班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特别第十期发表以后，在他这班掀起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同学们在争论当中，相持不下，张铁生同志引导了一些同学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当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什么能够很敏锐地觉察这些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张铁生同志他能够积极地努力地去刻苦地读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他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不是在十一月份才察觉的。对于一些小道消息，一些奇谈怪论，他在八、九月份的时候，他就有所察觉。我记得他在这个八、九月份曾经到省、地开了几次会，开会回来的时候，因为在会上也传达一些人的讲话，也看过一些讲话，回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怎么看这些人的讲话，我觉得怎么很难受的呐，觉得味道不对呢？什么原因呢？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也只得跟他一般地谈，对这些我们的认识也不清楚，况且加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不敢大胆地很放肆地去讲这些问题，所以他只能自问自答。作为我们只是跟他一般地谈一谈。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积极去翻主席著作，翻马列的书，他是不分黑夜白天去读书，抽点时间就读书，在火车上，汽车上，在走路，在学校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山沟底，因为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在一个小山沟，在山沟里的树根底下去读马列著作，看毛主席著作，看列宁的有关文章，通过这个来解决他当前一些认识问题。所以，教育界奇谈怪论一出现以后，他就看得比较清楚，他也很气愤，所以那一段都像同志们说的，铁生瘦了，确实那一段瘦得很邪呼，他非常感到压力很大，问题也很多，怎么样组织大家反击这次右倾翻案风，他想得很多，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方才他已经讲了，他不仅在这方面有觉察了，一会儿他可能要讲，你比如他对当时报纸、电台，也曾经也讲过，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说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个指示为纲，他对这个问题他就认为是不对头，他认为这样讲，这就没有纲啦，抽掉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这个纲，这究竟什么是纲，这个事情他给我讲了就不止一次，所以，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要警惕出修正主义，所以他的注意力呢，就注意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高度上来了。所以，在辩论这个基础上呢，所以就很快就写了这样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形成，当时因为没有到省里，省里也没有开会，这个学校教育革命比较紧张，所以铁生同志也就没有把它拿出来，他整理个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去，我们

辽宁省是在十二月一号到五号，省里开了一个干部会，这次会议是由省委常委、各市地委第一书记和各个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这么个干部会，这次会议专门来讨论教育革命问题。

我们接到通知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是这样，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学校派两名同志参加会议，和地委书记一道在省里开会，铁生同志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因为他也摸不到这次会议到底研究些什么问题，但他知道既然要大专院校开会，当前这样一个形势，因为当时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大批判文章没出，大批判文章出的是十二期杂志，这是十一月的问题，他也感到究竟当前我们辽宁省委抱着什么态度，他就跟我们学校的到省里开会的这个负责同志讲了一下他的意见，反复讲，说当前这个斗争可不能是一般斗争，希望你到那儿一定要站稳立场，要斗，他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结果，他说一定要站到清华北大朝农这一方，即使省委要是动摇了，我张铁生也得跟他拚，不能动摇，希望你别动摇，跟我们这个负责人讲的，对我们这个负责人很鼓舞，完了，这就是天气就已经很晚了，他就回去了，回去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复去睡不着，睡不着看书，看书完了再想，怎么想怎么觉得去两人开会仅跟一个同志说了，工宣队长到底是个啥态度，他还不摸底，他到知道工人阶级一定能够站稳立场，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冲锋陷阵，他在这次在小将上讲台讲政治课，工宣队长首先站出来支持的，当然这一次省里头别屈服于压力，省里头这次会如果弄不好，咱们也都倒向一边，反对起朝阳农学院，反对起当前这个新生事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所以，他第二天早晨别人都睡觉呢，他四点钟就起来，他一宿也没怎么合眼，起来披起棉袄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同志，因为他住的地方和我们工宣队住的地方相隔三里多地，中间隔一个山包，路还很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就这个同志和他一起，就到工宣队师傅的住地。到哪儿砰砰敲门，这把人敲毛了，这是干什么啦！这么早来，问：“是谁？”说是铁生。这工人师傅正爬在床上，他就进来了，他就给谈。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工人师傅，你不能动摇，坚决顶得住，这次斗争一定是很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站在朝农这一边，即使省委变了，我们也不能变，我们坚决斗争到底，这是翻案，这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不能答应！跟那个师傅谈了三个多钟头，四点多到的，七点多钟要吃饭了，工人师傅说，你就回去吧，你讲的那么多我记了一些，但是我还记不住，你是不是能写个材料我带着，这样我到那儿说话更有依据，拿着东西我上去讲去，铁生说，行！这样回来他早饭也没有吃在宿舍躺着写，十一点钟就要到我省宾馆开会，说十一点以前就交给他，不交给就晚了，下午就开会了，铁生回来饭也没吃披着棉袄趴在桌上一气呵成，把原来那个大字报重新整理一下成了这篇文章，这是报纸发表这个答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点发言权的，知道铁生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是由于自己主观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和路线斗争中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够继续革命，补充一点说明一下，完了。

张铁生，我讲话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上口音大家听了也不习惯，主要吧讲话质量不高，好放炮，再加上自己牙齿长得也不整齐，说话有些漏洞，在咱们那个学校里边我讲

话吧老有些负担，由于咱们那个学校有些人记我帐，他们说，张铁生的每一次讲话我那儿都有记录。言外之意就是说你那个小子呀，讲那么多错话，到时候跑不了你，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没有没记我帐的人呢？反正也不敢讲，恐怕有也不多，讲话比较放肆大家谅解一点，我就随心所欲，想啥讲啥，教我尽讲那些保险的话，唱些高调子，我还没学会。在大辩论当中，尤其是受压的时候，心情和一九七三年进考场考试的时候，是同样的激动，心呀蹦蹦地跳，当时我就和同志们说，一九七三年，咱们省委，为了回击修正主义回潮，拣了一块石头，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就这么讲，所以通过这次斗争，使我认识到很多问题，方才咱们领导同志讲了，有些人猜疑我有什么单线联系，确实是单线，没有双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呀，有着直接的联系，紧密的联系，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格格不入，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被人民群众把我推上政治舞台，如果这一次周荣鑫他们搞的一次右倾翻案风得逞的话，周部长继续当部长的话，那么这个小人物，就得成为一个殉葬品，就得会被从政治舞台上拽下来，打下来，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断头台，立即宣判我的政治死刑，下场也就只能这样，所以对这场斗争更加认识到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自己也清楚地理解到：反动的阶级对他的叛逆者，深恶痛绝，这我们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这些家伙们，都是仇恨新生事物的专家。都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对于他们的顽固性，残忍性，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人，只有亲身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次修正主义要复辟的出现，仅仅又一次地说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只能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没有得逞，远远没有得逞，只是又一次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最现实的最生动的路线教育，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同学讲，说以前吧，我就担心，技术知识学不好，回去对不起贫下中农，他说我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路线觉悟低，政治上糊涂，上当受骗，跟着反动的思潮跑，能够对得起谁，同学们讲的非常深刻了，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咱们师生在一起共同的再一次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老师讲，他说呀，十七年的时候，资产阶级也是打着关心我国的国家前途呀，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的这个旗号，所以他们名正言顺地宣称，说学校就是培养什么所谓红色专家的地方，红色专家的摇篮。但是，十七年的事实呀，回答了我们的，所谓的红色专家，其实呀，就是戴着一个红帽子的，也就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红色专家，剥去画皮剩下的也只能是骗人的说法，如果说我们还象十七年那样，按着那个路线去培养红色专家的话，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他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唯心史观之中，我们连半点都不能够信赖，因为我们有十七年的沉痛教训，就够了，够够了，咱们也不是凭着赌咒办事的教徒。那些反动的文人，所谓的科学救国、技术决定一切等等论点通通都是鬼话连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才能使这个国家永不变色。“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这纯属资产阶级特别顽固的偏见，这一点，咱们很好理解，但是，资产阶级又总是把读书无用，撒手不管，这个坏现象，罪归给咱们教育革命派，他们总是这样干，其实，“学而优则仕”与“读书无用”，搞“智育第一”和不抓智育，这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极右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反对

教育革命的两张王牌，两张王牌，他们都是来自于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体系。

所以，如果咱们不是认真地看书学习，不能够端正我们的学风，没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光凭着咱们这一点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办事，我看也只能是上当受骗，给修正主义危险出现提供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搞形而上学，历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边批判智育第一，他就说我们不抓智育，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实质，他就说我们不要教育，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就说我们不抓生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他们又趁着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善的时候，他们搬出了一个教育质量的问题，捡起这些鸡毛蒜皮来吓唬人，我们说看质量嘛，应该首先看政治质量，要看方向，看路线，看学生的世界观转变程度，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时，读了多少“本本”为标准，周部长他到基层很少去，辽宁也没去过，朝农还没去过，他说教育质量，他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没有发言权，要是有了发言权的话，只能说造谣污蔑，否定文化革命，咱们这些直接参加教育革命的，参加开门办学的，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是学兽医的，咱们实行开门办学也有很多的事情也愿意跟同志们讲一下，咱们和他俩讨论教育质量问题嘛。我们班开门办学到一个县兽医站，这个县兽医站呀，有一个老权威，六十几岁了，大概是六十六岁吧，是他们县里边顶顶有名的，出大拇指头的，这么一个权威，去了以后，对咱们比较冷淡，搞知识封锁，技术垄断很厉害，什么也不告诉咱们。有一天，一个生产队拉来一匹马，这个马得的是结症，恐怕多数同志都知道结症是怎么回事，相当于人的肠梗阻，吃的草料结到肠管的某一个部位了，再也下不去，非常危险，容易使肠管破裂，造成死亡，这个结症，老大夫要决定进行手术，当贫下中农听到他要手术，贫下中农就在他跟前央求，老大夫呀，无论如何这匹马也不能手术，这个马已经二十多岁了，是个老马，一手术花多少钱咱们不说，治好治不好咱们还不说，就算你治好了，可是这个老马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剖腹手术，基本上也丧失使役能力了，如果你要手术话，我们就回家给它一刀子算了，我们就吃肉了，大夫不是那么想的，他想的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财产。他想到我是一个兽医，我本职就是治病，我就管治病，我还管你使役呀！我不管！把你的马病治好了，把它的命救活了，我就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了，他就是这么想的。再一个想法嘛，就是考虑到手术是比较高明的，别人都认为是比较奥妙的，他是一手垄断的，要用其它办法都非常危险，不见得治好。有一个治结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掏结，把手从后边伸到马的直肠里面去，把那个结块，把肠子里堵的那个草团摸到，把它捏碎，然后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个方法，第一危险，马的肠壁非常薄尤其长期肠梗阻，那块肠壁的血管都有坏死的可能，所以他不敢动，担心用掏结的办法把马的肠管掏漏了，马死亡了，丢名誉，有损于他的尊严。所以，他一定要手术，谁说也不行，当时咱们有一位老师在跟前，姓袁，贫下中农就苦苦地哀求咱们这个袁老师，说袁大哥呀，袁大哥，千万不能手术呀，急得把老师都叫大哥啦，咱们看到这个场面特别气愤，这个时候，这个老权威给社员们说，你这个马必须手术，不手术我就不治了，要手术的话，回去取钱，要押金，这时候社员们说，我们也不同意手术呀，说不手术你就拉走。他那块正要钱啦，这一块我就把上衣脱掉，就用那种铁的手腕，掏结的办法，从马的后屁股里面伸进去，把这个结块就摸到了，不到五分钟，结块就

捏碎了，肠管就通了，马的病就基本上治好了，他那块还要钱呢，我说老大夫呀别要钱了，不用花钱，病已经治好了，贫下中农感激的心情就不用说了，老权威受到一次打击，受到了一次教训。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天，有一个生产队又拉来一匹病马，得的还是这个病，结症，来了一个队长，来了一个饲养员，还来了一个赶车的，老大夫还坚持要手术，咱们有几个女同学说，老大夫啊，咱们就别手术了，咱们还掏结吧，担点风险，不嫌脏，吃点苦就可以了，贫下中农还不用花钱。“不行！”这回能掏也不掏了，就这么大劲，我说了算的意思呀，我是个权威，我是门诊大夫，主治大夫。最后他决定手术以后，咱们同学就给他讲，咱们给你煮器件，给你递个针线，帮帮忙行不行，“不用！”咱们那个女同学回来就告诉我，这家伙可了不得，一定要手术，咱们给他打下手都不要，其实咱们也会手术，那玩艺咱们也不外行，这时候，老大夫已经把那个马推上了手术台，麻醉完毕，器件消毒也都完毕了，把手术蒙布都放上了，背毛也刮掉了，就准备来这一刀，在这个紧张关头，同学们都气得够呛，这个生产队长和饲养员急得团团转，不能手术呀，这个马咱刚买来，才两岁多一点，小马驹，这么手术，起码一年不能使役了，再也吧也真受折，不一定能治好，马，大牲畜手术，消毒也不象人手术那么严密的，所以容易感染化脓坏死，急得够呛，看到这个情况，我当时正在开会，我就去了，到那儿我就赶上啦，我说：老大夫先别动，不能动，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我就走了，也没有，我还好歹的有点法权，他还真还没有敢动，当时我就想，这是个无产阶级的兽医站，共产党办的，应当贫下中农说了算，就你这个老糟头子说了算？我才不服气呢？我就到他们党支部把副书记找来了，当面我就把他叫来了，我说你摆个理，你说为什么这个马一定要手术你摆清道理。他就把整个病情啊，检查的过程啊从理论上摆了一大堆，从实践上还讲了不少，中心意思就是为他的观点辩护，讲的是悬天悬地的，他讲完我就讲，他摆他的方案，一定要手术的方案，我说不用手术，不花钱可以治好这个方案，最后还是不同意，最后我干脆我不跟你商量了，我说试试行不行，我说你说行不行，他说那就试试吧，他就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干上了，出去以后，我就和同学们讲，我就和那个队长讲，我说咱们来掏结，不手术，咱们试试看！这一家伙同学们都活跃起来了。可真有人替他说话了，那个队长马上就帮助我拽马尾巴，同学们打来洗脸水，拿剪刀给我剪指甲盖，因为很危险，手指甲盖划破了肠管，掏破了粪便流到腹腔里去，这家伙中毒就会死亡的，同志们就帮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当时队长就鼓励我，一边拽着马尾巴一边对我说，铁生呀你就干，反正这个马也得手术，咱们贫下中农啊，不会计较他的后果的，它死了，咱们就等于杀肉吃。就这么讲。它好了，咱们感谢你。咱们争气。在这个老队长的鼓励之下就干上了，用了十来分钟时间，结块特别特别大，大面包的样子。很危险，用咱们比较先进的方法，咱们国家发明的锤结，就是把那个肠子里的结块，搂到肚皮的下边去，没有骨头的那个地方，外边用一个大棒子，把这个结块捣碎。非常危险。用这个办法，大胆地把这个马的结块捣碎了，结块一捣碎，前面的肠衣呀，前面鼓胀的空气呀，都顺着这个肠管都排出来了。这个大马呀噼里啪啦排了不少屁，正式宣告这次路线斗争胜利了。真争气呀，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老队长呀就拉着那个马，说了那么多好话，高度地评价，哎哟，还是咱们自己的大学生哟。高兴得够呛，说实在

的，你说你这个老权威怕丢名誉，怕把这个马掏死了，我就不怕丢名誉，我这个权威比他那个权威还大，但是考虑的倒不是这些事情，就怕给主席路线抹黑。真正掏死的话，这家伙就得意忘形的，不就向咱们反攻倒算，不就给咱们造舆论。担心的是这个事情。

再有吧，你说讨论，自然，从这个理论水平上来看，我和这个老大夫对比，说实在的，说老实话，差得很远很远。人家搞了好几十年了，我刚刚上学，理论知识不多，确实不多，实践经验呐也没有他多，人家搞好几十年了，这一点咱们如果不承认的话，咱们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呢，我们理论不多，可以继续深造，实践经验不丰富，可以大胆实践。我们讨论教育质量，决不能离开阶级内容，决不能抽掉他的阶级内容。为什么两个人，出现两个处理方案。一个呢，不花一分钱，可以给贫下中农解决那么多问题；一个呢，化那么多钱，手术以后不见得治好，而且呢，还要丧失使用能力。这两个方案，你说那个高明？我说我这个方案高明，为什么出现两个方案，一句话，两种世界观针锋相对的，两个观点，两个立场，两种思想感情。他和贫下中农的那个感情呀，可我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呀，就那么两股劲，不一样，当时我想得很多，我对于这个大牲畜呀，尤其是对马，特别是有感情的。在农村呐，这个工作，接受再教育呀一共五年时间，还当过生产队长，咱们小队的牲畜特别缺少，病了，我拉了那个马，走啊走啊，治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确诊。咱们小队还穷，没有钱。今天借钱，明天化，明天借钱后天化，就这么给马治病，特别特别啊，那苦处不用说，我这拉着马呀，晚上还没有回来呢，社员呢，在那儿伸着脖子等着我，怎么还没回来呀？马病了究竟怎么样呀？还有希望没有啊？所以贫下中农那个感情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愿意上大学学兽医，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对待这个贫下中农，对待这个马那个思想感情呀就和那个老大夫，截然相反。谁知道，我看哪，谈论教育质量，必须首先看政治质量，看世界观。你说他那个质量不高，我说不低，还真不低。什么质量？资产阶级的质量真不低。他那个质量啊，是他的，是白色的、黄色的。咱们的质量是红的，无产阶级的。他要他的，咱要咱的，咱们要的是红旗，他扛的是白旗。你说谈到教育质量，脱离了基本路线，脱离了阶级性，讨论什么东西也讨论不清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人家说什么科研项目少，咱就摆了一大堆科研项目；人家说咱们理论知识少，哎，咱们就搞一套理论，等等。这些东西呀，从理论上没搞明白，被动、消极，摆质量就这么摆。首先看政治质量。所以吧，咱们谈论教育质量，有一个鲜明的阶级性。不管那个学校，不管是那个阶级，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阶级利益改造学校的，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接班人。试问，说文化革命以后学生质量低的这些先生们，请问你们，你们这个质量，那个标准，是不是毛主席要求的标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标准？是不是政治家的标准？是不是这个无产阶级广大工农群众的标准？都不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是你那个世界观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标准，把你那个标准啊，拿到美国去，我看也不新鲜。拿到苏联去啊，我看苏联那些凯洛夫的门徒们，也会拍手称是的，也说不出两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呀和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自然观也都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教育思想体系啊惊人的一致。假如说，咱们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教育质量，象十七年那样去培养学生，我看哪，这样干下去，培

养的学生，也只能是对我国的经济基础啊，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破坏作用，只能够在不断地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作用，只能够起到扩大三大差别的作用。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怀着无比仇恨的心理把那些旧学校，旧的教育制度，砸他个稀巴烂呢。列宁同志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又说：“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由此可见，学校的任务，最首要的还是政治任务。毛主席说，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主席对待卫生部，也有过批评。说卫生部，也应改名城老卫生部长，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呢？我看它如果不改变的话，又要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教育部，按照周荣鑫之流所要求的所说的教育部，好象我们的教育部，就是为了搞四个现代化的，是个传授知识部。是这样吗？四个现代化我们是要搞的，而且还要用大寨的精神，用总路线的精神去搞。但是，我们要搞的现代化，应当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个条件下的四个现代化。如果象美国和日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那样的国家，我们不仅不搞，而且呢，我们无产阶级还要用革命用流血牺牲去打碎那个丑恶的四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党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我们的教育战线，我国的教育战线和咱们的国家是一样的。现在呢？基本矛盾仍然是教育这个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个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不是教育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的危险不是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仍然是修正主义。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鱼目混珠地说，你能把三脱离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祸害，他们所说的三脱离，其实所指的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那个脱离，把他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最大祸害。我看别有用心。举个例子么，在一九七四年，我去接待过一位非常傲慢的澳大利亚的教育家。当我们谈到我们正在向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努力地进行改革。他马上就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他说论理论联系实际，你们中国不如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一般地来讲，都是那些牧场主的儿子。他学习啊，在学校，他实践就回到家里来，他的家，实践机会特别多，特别好，条件比你们还好。这就是说，理论脱离实际这个问题，它有阶级性，谁都可以用。不能抽掉阶级内容。这样讲，只能是取消和回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所以，我们同志呢？不能在暂时地斗争胜利当中，忘乎所以。咱们教育阵地，不能说一个学校领导班子解决了，学校就由无产阶级完全占领了。也不能说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学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不能这么看。学校还有那么多问题没有解决。思想路线解决了没有？教育路线清没清？方向明没明？培养目标是不是已经大家都确认了？不是那个情况。教师队伍的世界观改造刚刚开始嘛，教学领域里面斗批改仅仅是刚刚开始，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在学科领域里面，资产阶级的偏见特别特别顽固，所以说教育革命仅仅是刚开始，刚开头。不是过面，咱们教育革命最后胜利还需要咱们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躺在仅仅一点成绩堆里睡大头。咱们教育革命最后胜利还需要咱们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躺在仅仅一点成绩堆里睡大头。局面刚刚打开。在目前，我们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形势，有一个明白的估计。应当承认我们有不少问题，不承认问题，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好经验没有总结，实习和推广，还有教育方面一些理论性的问题

还没有真正的搞明白，办学方向还没有继续端正，培养目标还应当进一步的明确，学校的组织建设、班子建设还总不能令人非常满意，教师队伍的改造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招生制度仅仅刚刚进行改革，还有多的问题没有完善，毕业时的分配政策仍然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考试制度咱们正在摸索，学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新的无产阶级办学计划还没有成型，实现宏伟的规划，这就是设计科技网刚刚开始，开门办学方面，我们抓得还不够好，课程设置至今还有争议，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三结合的教学体制有些单位还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法和教材还要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地改革，需要搞的是革命大批判，澄清咱们思想路线，开辟正确道路，深入教育革命，深入到学科领域。现在我们还谈不上用阶级斗争的精神统帅我们教学大纲，我们也没有完成用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去改造我们的办学计划。也就是说，学校阵地无产阶级远远没有彻底占领，完全改造。不是有的人叫我们承认错误么，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的承认，在前一段的教育革命当中，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抓得还不够紧，对旧的教育制度仇恨还不够深，改革的还不彻底。如果这也满好，那也完善，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搞教育革命了吧，还有的人等待着和我们搞秋后算账，我们就用你们等，现在我们就算，账总是要算的么，一九五八年镇压了我国的第一次教育革命，就是周荣鑫和他的主子们和他反动的一帮，他们干的。这个账要算，十七年的账都要算，七二年那个账也要算，一九七五年这个账更要算，新账老账总算，都要清算，谁也跑不了谁，对于呀，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呀，同志们确实有那种盲目乐观，问题可多了，这次路线斗争仅仅是我们教育战线的事吗？光光是科技战线上的事吗？都不是。教育战线、科技战线仅仅是在修正主义复辟的黑土壤里面首先冒尖的，首先发芽的两棵草。教育战线的这场斗争，仅仅是医学战线上的反击的暂时胜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仅仅是整个阶级斗争这出长戏当中的刚刚拉开的一个小镜头、小序幕，斗争的路子还长着呢！更艰难的斗争还在后头，引鸡一上房、狗急跳墙，不要以为党中央、毛主席给他们开了会，给他们打了招呼，他们就服气了，就彻底解决问题了，他们又不是天真无知的穿开裆裤的小孩，给他们打招呼，他们会跳起来的，骂起来，会骂娘的、骂街的，甚至还有可能破釜沉舟。不是有的人讲么，不要怕做被打倒的人，还鼓励他们的爪牙们，同志们应当清楚，清华大学有两封黑信，写黑信的是走资派和三个投降派。但是也应该看到，没有写黑信的走资派投降派也大有人在，直接插手刘冰等人写黑信的大有人在，没有直接插手的也大有人在，为反党黑信擂鼓助威撑腰的人，至今还在那里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胖猪长得再大也成不了象。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他们说是整人运动，革命造反派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他们全说成是革命群众抓他们小辫子，现在还那么讲，毛主席亲自发动一场批林批孔，他们至今还屁股坐在林彪那一边大骂秦始皇，为反动的儒生们鸣冤叫屈，不是一般问题。是认识问题吗？决不是，思想路线问题，执行工作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什么叫走资派，大家都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在哪里呢？就是那帮狐群狗党，搞右倾翻案的反动的一帮，就是那些对文化革命对新生事物恨之人骨，耿耿于怀的那些复辟狂，就是那

些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上台的克己复礼的得志便猖狂的走资派、翻案派。得志便猖狂这些人，上台以后不到一年就反攻倒算，连象都不装，太露骨了，仅仅是一年时间嘛，甚至于不到一年，咱们就看他那股猖狂劲，看他那股迫不及待的劲，说他是走资派我看都不够劲，够上跑资派了，多么猖狂！我们看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条指示的发表就是对那些走资派们，妄图借助安定团结的口号搞阴谋诡计的有力回击。主席的最新指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条指示的发表，这是彻底的宣布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口号的彻底破产。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但是啊我们又不能对主席反复强调的过去那些精辟论述一点也不能忽视。主席在新年元旦的时候两首诗词的发表，给全体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它激励全体人民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愚公移山的志气，大寨人的干劲，建设共产主义，攀登新高峰。然而，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毛主席在谱写两首诗词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即将不得不爆发，国内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阴谋实行反革命政变。今天主席诗词的发表，确实是对我们党内那些埋头经济建设，埋头粮食，埋头智育这些忽视党的基本路线的人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形势大好，确实很好，越来越好，形势逼人，真是逼人，不仅逼得我们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用大寨人的精神去干社会主义，去变大寨，去搞四个现代化，而且又有的人逼得我们再上井冈山，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楚，不过呢，有的人也确实经常产生一些糊涂观念，咱们这个党，不是个经济党，不是个智育党，不是个粮食党。我们这个党是抓阶级斗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是抓人的意识形态的，是搞上层建筑的，如果我们只是埋头生产，只是在自己那个职权范围内，那个小范围内抓一点基本路线远远不够，不要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世界上世界观就那么两家，路线斗争也从来不是这两个小单位里面孤立进行的，他都是与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而且要受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支配所影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所以我们不光不能单单局限于满足于抓好本单位的这点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尤其是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个原则，确实是原则，但是对于反动的思潮，反动势力一点也不妥协不让步，坚持正确路线，更是原则。党的领导都是靠人来实现的，人都是有思维的，都是有程度不同的需要改造的，世界观，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们还存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解决没解决？所以，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

文化革命以前那些走资派们，他们也就是喊这个口号嘛，党的领导，其实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实际上就是要名正言顺地反党，反对党的领导，搞复辟，推行反动路线。在这次右倾翻案风当中，英雄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坚持了正确路线。他们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体现了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周荣鑫等等奇谈怪论，统统是放屁。清华、北大迟群同志、谢静宜同志一点也没有执行，顶得好。咱们辽宁省尽管有的人拿着周部长的讲话，到省委去闹事，为什么不传达周部长的讲话，就不传达。尽管这样，有的人也顶住了，一个字也不传达，顶得也好。这就是党的领导，这

就是党的原则。周部长讲，他说北京市文教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什么只听毛主席的，剩下的谁也不听，听了以后真高兴，真长志气。如果咱们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文教组，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这样，那该多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主席的思想在全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扎下了根，而且根深树大。这样的话，单凭几个小丑，几个反动儒生，破坏捣乱，造谣污蔑，无成大事，翻不了船，掀不起大浪。也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战无不胜。很遗憾，在我们科技领导机关里面，至今还存在着一种人，这种人他以为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结合进去的，但是呢？没有坚持正确路线，成为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当中的唯命是从的小绵羊。这样的年青干部，只得批评，没有什么代表性，对不起文化革命，对不起革命群众，更对不起主席。这次右倾翻案妖风，全国有理想，搞的有不理想的，好多地方，好多省市还是死角，死气沉沉，死水一潭。周荣鑫他们搞右倾翻案的时候，有好多的省，真动起来了，挺积极的，组织传达，慎重其事，重新研究教学计划，各条战线都有反响，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这场战斗开始了，按兵不动，没有反响，真可恨。搞回潮倒是挺积极，搞反击就是不积极，什么问题？路线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不是我在这里给人家戴大帽子，还搞什么阶级斗争，还抓什么基本路线，多么严重的一场政治斗争，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些问题不要埋怨我口气大，就是讲话放大炮，听说咱们山西最喜欢放大炮的人吗，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文化大革命当时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这样一些老干部，上台以后，对群众组织的代表，对造反派的优秀分子优秀代表，冷眼相待。他们利用安定团结这个口号，在革命派，在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当中，在新干部队伍当中，大抓派性，抓派性头子，给这些青年干部，造反派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有的省份，有的地方，甚至于在机关里面，把那些群众代表，造反派的老代表，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架空，排斥，坐在屁股底下，用泻肚子的办法，把他们泻走了。把他们分配到基层去了，甚至于不分配工作了。有的人还给他们办学习班，承认错误，写检讨，就是打击和排挤革命的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多么严重的右倾翻案。组织上的右倾翻案，最可怕、最关键，不是有个大人物那么讲吗，当有的人向他汇报工作，汇报三结合的班子，他就说：不要给我提什么三结合，提什么老中青，我不愿意听，我不明白，你就提一二把手行了。这种在组织路线上的右倾翻案，从全国看来比较普遍，有的甚至达到非常猖狂的地步，有些省份，省市，县社，就是现在还是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从全国的范围内，这种问题的存在，这种倾向的存在，就自然地、本能地在我国形成了一股右倾势力，强大的右倾势力。困难确实很大，斗争不是那么容易的，据我自己的理解，倒不一定对。现在分析我国的政治状况，斗争状况，从组织上看，从精神上看，从意志上看，从路线上看，用那法权的观点去看，无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占统治地位，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某些领域里面，某条战线上，某些角落里面，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右倾保守势力，在那里蠢蠢欲动，趋向于上场。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也在那里偷偷地增多，默默地加大。据我看，七八九月份，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土围子。也正是这个土围子，被张春桥同志批得体无完肤，骂得心惊胆颤。经过一场斗争之后，叫我

们重新打开张春桥同志的文章，去重新的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理解阶级斗争的性质，尤其深刻。毛主席一再强调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又强调说，要彻底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堡垒一样，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嘛。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就是这继续嘛，性质、任务、对象都没有变。我看哪，主席的这几条指示，就是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搞革命所制定的主要对象，也是我们国家出现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是我们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条，忘记了主要对象、主要矛盾。我们天天都在那里面喊阶级斗争啊，基本路线啊，我看哪也只能是空中的口号，时髦的空话，所以要求我们必须端正学风，从理论上必须搞明白，要理论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能光光住在里边，住在小屋子里边，搞自我革命。有的同志倒读了这么多书，那么多书，在路线斗争面前，你就用呀，他也不对不上号，好象是给人家学的，我看学的再多，等于无用，都就饭吃了。光搞自我革命，光改造主观世界，不搞路线斗争，不搞注重改造客观世界，不能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地看，统一起来，这样的人我看只能是闭门读书，闭门修养，这些那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你要说他是一个口头革命派，他还真委屈。学风必须得端正，不端正学风，也只能说你一个口头革命派。咱们省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各个大专院校涌现出了一批自动地站出来，在没有什么中央文件这个指示精神以前，就对这个奇谈怪论进行批判的这样一些反潮流的闯将，在省委里面，主持开了一个会，教育革命的座谈会，一共十一名，在那个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讲，我说如果咱们全国的革命青年，全国的工农兵学员，都能够象咱们在位同志那样的，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都有咱们这样的路线觉悟，有咱们这样的革命精神，如果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咱们全国青年都这样，主席该有多放心，恐怕主席就能够睡上好觉，能够健康长寿。如果咱们所有的青年，所有的革命同志，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在那里边擦亮眼睛，睁大眼睛，无时不刻地观察着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表演，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都在那里边呢，警惕观察，看谁敢翻案，看谁敢反攻倒算。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国家大有希望，党就后继有人啦。咱们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论它的性质来讲，目的、意义、任务，我看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基本是一样的。上、管、改大学，就是在学校里边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全面专政的一个大的事迹。是特殊使命。这个大学是我们无产阶级办的，是面向工农兵开门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大学的当然的主人。当小绵羊的人不识时务、不识抬举，糊涂，至少是个糊涂虫，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工农兵学员应当在大学里边，应当是这样的，上大学扬眉吐气，管大学，理直气壮，改造大学，理所当然。应当这样。可是有些同志往往不是这样。脑子里边那么多的糊涂观念。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一些旧的传统观念不少不少，他们一点也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有的人还拜倒在学术权威的脚下，恭恭敬敬，唯命是从，没有一点骨气，连半点阶级自尊心都没有。如果这个学校不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来上管改，而且就是单纯的传授知识，那么这

个大学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占领干什么。斗争的规律再一次告诉我们，形势越是大好，我们越是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越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越是要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越是安定团结，越是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出现，越是老一代的革命家，越来越少，老一代的革命家，年迈体弱，我们越是要搞好三结合的班子建设，越是要捍卫文化革命的成果，越是要培养接班人，越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没有什么阶段性。有的人觉得基本路线有的时候好象是有阶段性了，不用了，该抓一阵生产了。糊涂观念。党的基本路线，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些人总喜欢制定这一个纲，那个纲，纲就多了。不管什么纲，都从属于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有些人物把三项指示为纲捧起来了，贩卖出来了，大有文章可做，我看哪他是走资派们提出的一个折衷主义的口号，在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是反动的，搞的不是基本路线，搞的不是唯物主义，搞的是唯心主义，是二元论，是多中心论，多纲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大家应该搞明白。这个反动纲领的制定，它的由来，我们看哪也应该搞清楚。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着我们的教育路线，决定着我们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它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也是我国教育革命的生命线，只有我们年年讲，天天讲，我们就将战无不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变修正主义，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高度的警惕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把革命引向更加深入。

同志们，大家应当高兴的看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以着大破大立，厚今薄古的革命精神，一反潮流几千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摧毁，一整套崭新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制度、教法和教材正在通过实践逐步的建立和巩固起来，中国人就是要走教育自己发展的道路，就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教育革命胜利万岁！

沈毅：领导让我说一下，这个，铁生同志反潮流事迹很多，这个，这个用几十分钟是讲不完的，他，这个，铁生同志是我们辽宁省锦州市兴镇县的，他原先住在兴镇县，他家，他父亲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林科务研究所的一个老工人。铁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造反派，和全校师生一道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六八年带头下乡，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下乡不久，铁生的母亲也响应主席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个铁生所在生产队是兴镇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这个大队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多年来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生产搞得一踏糊涂。铁生到了这个生产队以后，担任第四队队长，在担任队长过程中，带领革命群众，搞大批大干。方才就讲了，他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是一无柴草，二没口粮，三无资金，还有那么多的外债。他就领导贫下中农，战胜了这些困难，并且在斗争当中，很反了那些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七三年考大学的时候，铁生就被贫下中农选送考大学。铁生在以前也有的同志提出要他考大学，他不去。他这一次为什么要去考大学。方才就讲了，是因为他的生产队，他是队长，他的队又新买来了两匹骡子，这两头骡子很不幸，很快就得了病，他因给这两头骡子治病，奔跑了几个月，由于，当地个别兽医不能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就未能很好的治疗，结果这两个骡子，一个死

了，一个是虽然活了，留下后遗症，不能使役，对于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在他脑子里深深打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兽医，如果没有自己的兽医，贫下中农就要遭瘟，就要遭罪。另外一个，因为他这个地区是一个山区，年年干旱，在他领导下治了一些坡地，但是没有根治，特别感到需要在生产斗争当中科学种田，需要解决水的问题，所以，他也想能够学点治水，治水这个方面的一个知识。将来回来农村，回到自己家，把农村改变了。贫下中农选送他以后，当时我们辽宁省，七三年招生，从省委这个角度，坚决贯彻主席七·二一的指示，但是，怎么个贯彻，招收那些学生，在这个问题有争论。各个市、地，在省委会议提出各种意见，但是省委希望各市摸索一下，怎么能够把学校招生工作搞好。当时锦州市委在铁生他们这个县搞过试点，在这个县搞试点，整个考生百十来人，都是贫下中农选送的。有一些按照规定是这么多，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增加了不少。为什么增加呢？就是有些同志不能按照政策办了，结果走了后门。铁生当时是生产队长，生产很忙。事先因为他今年报考啦，县里，社里就准备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复习功课。铁生同志对工作非常负责，坚决不干，所以，整天领导贫下中农铲地，补苗，大搞生产运动。他大致上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将近，确实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有时间去复习功课。他不仅劳动这些，而且晚间回来处理生产队的工作，所以一天劳动，工作对他来说这个担子是很重的，原定计划准备是要再复习一段，但是由于当时锦州市考虑还是要提前考一考，所以，就在七月份，就把这一些同学召集在一起考试，铁生同志接到通知，第二天赶到县里考试，因为，第二天报到，所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仍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其它考生上午已经都报到了，所以公社带队的很着急，就缺张铁生。张铁生什么时候才到的。晚上五点钟以后才到县城，到县城以后其它同志都知道了要考试，好了，第二天就要考试都准备好了，张铁生一听要考试，也感到是很不对头，考试也考不出真正的知识，这么考试有什么好处呢？在他思想就有一个印象。第二天到考场，上午考试。他进考场一看啊，原来规定的名额已大大超过。另外，是特别有一些个他也认识的，同样下乡的，结果在农村由于受智育第一毒害的个别青年，几年来没有很好参加劳动，这一次考试，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再加上课堂的监考人非常严厉，规章制度法规，他对这个事情很不满意。上午勉强的答了卷。中午吃饭时候他因为当时是个生产队长，一般知识青年。所以他也没有注意这钟点。回去到街上吃点饭，完了就也比较疲乏，因为也经常劳动，就躺到考场另一端一棵大树底下有点困，睡觉了，结果这边两点已经到了，他醒了，一问过路什么时候，两点多了，他就糟了，考试已经过去。他急忙跑到考场，到了考场门已经关上，门关上了，敲门，里边答应说干什么的，说考试哩。说考试不行啦，晚啦！铁生说我是贫下中农送我，要我考试。谁送来也不行，这是制度。铁生说你这制度我也制度。你不能去掉我的考试资格。里边说就得取消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违犯了考试制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看门是推不开了。他走到一个窗户一看窗户没关严，推开窗户跳了下去。跳进去了。因为监考有的是他原先念书的老师，说铁生，怎么来这么晚呢！你坐在那儿快答吧！铁生进去了光顾生气他也不答卷，那个老师说，这题不很简单吗，你答吧！还不弄个几分，最后也可能取上。铁生说我不答，我要找你们领导提意见。这个监考的说：你这个

孩子，你上那儿找领导去？你能看着领导嘛！他说我要提意见。他说你先答卷吧！答卷完了再说。铁生心思了心思不答，完了就把卷反过来写了一份答卷。把这封信写了就交了，他是第一个交的。当他站起来往讲台送卷的时候，有几个监考的老师，有一个老同志说：哎，怎么跳窗户的那个家伙答得挺快的。

另外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噢，有一个男老师把卷拿起来一看，啊，这是白卷，没有写字，就议论，他没答，怨不得他这么快能答上卷。一个女老师把卷拿起来，哎，这后面有字。当时眼看考试就要结束啦！就喧腾起来了，就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妈张铁生这小子真他妈混账，就要把我们这一次考试坑啦，上大学的希望也可完啦。有的说，这小子真瞎蛋，他赌一股气完了，和其他几个公社几个青年一堆回到家啦，到家贫下中农问他，怎么样铁生今天考试？铁生说不错。但他心里知道，这个答卷有可能被领导重视，要掀起一场斗争，也有可能自己大难临头，因为自己越了轨。在这种情况下在家里劳动，仍然领导贫下中农劳动。当时他这个答卷就反映到省里了。我们省委非常重视。当时运新同志和其他同志看了答卷以后，认为这个学生很有见识，这份答卷很有份量。当时锦州市呢，负责同志很有压力，省委说你们不要有压力，你们做了好事。因为你们不这样做也不能有张铁生。所以当时，省委责成团省委、教育局负责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了解一下张铁生的情况，因为省委不了解，省委几个负责同志，教育局、团省委、青年办的几个同志，加上锦州市的几个同志到张铁生所在生产队，去那天因为交通不方便，县里派了几个车，派了几个军代表一起去，张铁生在生产队领着贫下中农在山上铲地。这一看来这么多小车，而且还有当兵的，所以群众议论纷纷，说，这回张铁生可闹出事了。就找铁生，这大队通讯员就跑到地里去找张铁生。张队长，张队长，这回有这么多人来找你来了。当时生产队议论纷纷，这回铁生，有的老贫农说，哎呀，铁生，是不是出事了，要出事了咱们怎么怎么的，这是讲了些鼓励话，也有的，因为他一直反潮流，对那些歪风邪气就敢斗，那些落后思想的人，心思这回张铁生该教训教训他了，过去他老是这么批了那么斗了，这会儿领导同志省里市里同志到那和他一谈，问他为什么写这个答卷，问前后思想发展过程，同时说你对这些课程到底怎么办？怎么认识。他谈了一下自己看法，这个当时因为这个东西，有的说，他根本就不明白，从文字来说数学、化学、物理他根本就不一定很好地改造锻炼自己，当然对上大学为什么上大学，他讲得清楚，就是为了回农村，决不是为了往上爬，决不是离开农村，仍然要继续吃高粱饭米，挣工分。所以说你要学什么？他说我要上医学院学兽医，因为他不明白兽医是农学院是医学院，说上医学院上兽医，最后省里领导讲了学兽医省委批准你，但你别骂人，医学院不学兽医。这个这就是张铁生同志在写第一份答卷的当时的过程。我的也是感性知识，也是以后到那个家乡，到县里到市里到省里领导同志的接触过程中，因为懂，作文、政治他也不明白。所以领导同志说，既然这样的话，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你是不是能在给你点时间你再把原卷答一答。铁生说行，你给我五分钟准备，结果他心平气和地他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给领导同志汇报，他就把这些卷重新又答了，答得基本上是满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满分，所以铁生这个答卷不是为了考试答的，不是为了考试写这些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而是为了汇报，这一切情况

铁生同志受到了很大鼓舞，所以一再表示自己在这次革命当中，当时我们这个学校，正好张铁生所在的这个县兴镇县没有招收兽医专业，这个，同时因为这个我们学校负责这个地区，所以当时情况还不够那么了解，至于他以前反潮流的事迹就很多了，以后，我们也去了几次，贫下中农对张铁生同志有很大的评价，这些事张铁生同志上大学前后报纸已经介绍一些过了。其上大学以后仍然继续革命，在七四年七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张铁生上大学，七五年十二月份，和七六年一月份报纸和电台相继地发表了他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讲了多说了，我们这次来呀，主要到山西和大寨来学习咱们省里和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回去以后呢，在教育革命，在学大寨运动当中，能够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我们来了以后，受到省委领导和市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这样地关心这样地照顾，我们表示非常地感谢。

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

注：下面三件材料，是张铁生、刘继业谈话的记录原件

(一)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

九月九日晚张铁生、刘继业同志专程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团省委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先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十一点三十分到团省委机关，德民同志接待了他们。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张铁生：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无比悲痛，但也确实担心。因为，我现在思想上想的是，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重时期。以前，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树，有靠头，以后靠谁呢？当然也可以说有靠头，有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靠，就得靠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在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还有朱老怎死了，一没有拍电影，也没有拍电视，事情发生突然，事后不了了之，叫人不好理解。

去年七、八、九月时，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还有一些同志，有的还叫得挺凶。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这里。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现在邓纳吉是不是有人在支持它，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我认为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研究，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去年养猪会，他有个讲话，后来发了20号文件，他的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今年，两个决议发表后，我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意见，给华总理提了许多问

题，但都没有最后答案。

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叫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截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足以战胜保守势力，但是，今天在组织上没有保证。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机关不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去建设，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许是我们坐井观天，有片面性。但我们认为担心是有根据的，态度是积极的，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们这么远来了，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继业：

担心和有信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很同意今年八月初辽报发表省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时讲的“阶级斗争的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说明，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告全国人民书》的发表，在全国人民中必将产生很大震动。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青年战线，一定受震动更大。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建议团省委把青年战线的典型请上来，希望团省委给帮个忙，让我们这些人有条件在一起学习学习，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目的，是让我们的思想尽快适应这一重大变革。

张铁生：

最近我收到不少南方战友的来信，反映一类老爷、二类老爷、三类老爷没有被揭露，不少革命造反派同样在受压，受打击。以前，有的材料讲到福建、山西的情况，一

些问题不好解决。山西把三、四号文件，也就是华的那个讲话，当作喜讯来传达，为什么抓一、二号文件的传达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这是呼应，是思想上合拍。

这些问题，我不想和更多的人讲，只对他（指刘继业同志）说了一些，以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不过，一旦召开人大，在会上我是想讲的，我要当面提问题，要他当面回答。也许有人要把“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帽子给我扣上，但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什么也不怕，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二)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同省知青办领导同志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张铁生：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非常悲痛。我们要求把我省的知识青年典型尽快召集到一起，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请献忠、春泽同志都来，有好处。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原则上讲，靠主席的路线，靠毛泽东思想，但也要组织路线的保证。这就是班子路线、班子建设问题。我们省委是信得过的。几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司令部。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上，步子是比较大的。虽然保守势力也是大的，但优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革命派。建议省委保持独立见解，象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见解，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昨天同刘继业谈，应往最坏处着想，头脑中不应有绝对的概念。

人民委托我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开得很草率，很紧张，宣传搞得也很差一些。去年七、八、九出现那么多问题。中央两项决议发表后，大家都坚决拥护，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了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否认了帐，是否同邓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感情是对路的。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

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上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象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有一些超阶级的观点。他同王洪文

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我对省委是从内心到外拥护的，愿跟省委干一辈子革命。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不能和别人讲，把自己担心的事情想和领导谈谈。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顾虑、隐瞒自己的观点。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但愿不能这样。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外省、北京都有不少大老爷。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要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大哭是不对的。现在，冷静地考虑问题的不是大多数。理智地考虑问题，用主席思想、指示指导行动的不是很多。这是好人，但是糊涂人，走资派不害怕。走资派最害怕的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应把眼睛瞪大一点。

因而，想请青年们谈谈、统一思想，在省委领导下统一行动。

请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省委领导同志，转告远新同志。

刘继业：

现在，担心大于悲痛。最好的悼念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不是杞子忧天倾。远新同志曾讲，邓纳吉有可能重新上台。这种担心总比麻木不仁好得多。

(三)

张铁生同志最近的一次谈话

九月十四日，我们请张铁生同志谈谈毛主席逝世后的思想情况。现把他的谈话整理如下：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是建党建军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我心里万分悲痛。主席讲过，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道理是这样，但从感情上过不去。

党中央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这决不是一句名词、概念。现在看，光悲痛是不行的，要做好思想准备，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要比光悲伤强的多。

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现在更使人容易理解了。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小平还留在党内，邓小平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邓还是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乘机反扑的。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

爷”那里，把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可怕的是咱们忘记毛主席的遗嘱，丢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也可能邓小平错误的估计形势，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主席不在，但是主席思想是永存的，四卷宝书永放光芒。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现在不是五十年代的情况，也不是当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的情况，中国人民知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有高度的觉悟，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所以走资派要重新上台又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复辟上台绝对不行，这是需要和邓纳吉讲清楚的。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主席逝世后，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困难一些、艰巨一些，做好一切准备，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和突然袭击。当前特别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谓国内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成果能不能保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能不能深入的问题。主席叫我们抓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

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我看主席逝世后光流眼泪而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只能说是没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路线觉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中央有没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主席把话说到家了。下边出了修正主义成不了气候，大老爷出修正主义影响全国。告人民书中一再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自己的理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正确领导。

对咱们这个党要坚持一分为二，对党中央、省委、国家都是这样。很可能将来有人强调一元化，借主席的威信，把自己装扮成党，自己就是党。如果你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你只能是个两腿支着肚子的人，是修正主义的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高原则。

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学会了辩证法，学会了阶级分析。我认为，主席逝世后，过极悲伤意义不大，应当把眼睛擦得更亮，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邓的复辟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有些人流完泪不想问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照样打扑克下象棋，这是糊涂人，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从学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对新生事物冷淡，使新生事物受压，老师就怕表扬，一表扬就孤立。这部分人主席掌权时说好，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散布福利主义时，也就容易站过去。有很多人有不满意情绪不说，克己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屁股就难免坐到人家那边去。接触一个解放军学员，歪戴着帽，我说别这样，他说，你看，谁管？象去年哪！

过去，一直是主席为我们撑腰，靠这棵大树。主席逝世了，还去靠谁？当然不是说没有靠头，靠主席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永存的、靠得住的。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的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孔繁文

（注：这篇谈话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辽宁日报社调查研究部编的《记者汇报》上）

张春桥疯狂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的铁证

注：这是张春桥亲笔写的一张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自供状，是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安排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妄图篡党夺权的铁证。

张春桥所说的“又是一个一号文件”，系指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的中发〔1976〕1号文件。这个文件，公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张春桥就在中央发出这个文件的同一天，写出了他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下面是张春桥亲笔写的原件印文和复制件。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引用的一首诗的出处和注释（抄自《千家诗》一九五七年版）

元 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爆竹，山家以除夕烧竹，竹爆裂之声，山魃闻声畏惧而远避。屠苏，美酒名。曈曈，日初出貌。桃符，以桃木刻符于门，以御鬼也。岁去春来，春风吹暖，以助酒力之福也。一岁之始，家家换却桃符，以贺新正。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得君行政，除旧布新，而始行已之政令也。

关于张铁生试卷的揭发材料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同志揭发：张铁生这个典型是“四人帮”树的，过去《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大肆宣传，与事实不符。张铁生的考卷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见附件一、二、三）。从答卷看，第一、张铁生自己就是一个大学迷。他在考卷上最后写道：“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报纸发表时把这段删去了；第二、张铁生在考卷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道：“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这两段，在发表时也被删改；第三、考卷不是“白卷”，理化试卷答出了两道题，得了六分。

许多同志还指出，今年初，张铁生到处串连，恶毒地散布老干部百分之八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路人，应该回家去抱娃娃，给他们一百元钱一月，这是赎买等等反动谬论，很可能是在“四人帮”授意下干的。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时党委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

注：附件一、二从略，附件三：一九七三年，张铁生写给辽宁兴城考区领导的原信见第155页。

张铁生写给辽宁兴城考区领导的原信(原文)(附件三)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73年6月30日

注：此信曾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和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发表。发表时经过删改，划有黑线的字句是发表时被整句删除的。

关于江青一九三六年为蒋介石“购机祝寿” 演出和争演《赛金花》主角的揭发材料

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三十年代报刊，发现了江青在一九三六年为蒋介石“购机祝寿”演出和有关《赛金花》演出的材料。这一活动是在双十二“西安事变”以前，正处于蒋介石猖狂反共的高潮时期。情况如下：

一、一九三五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疯狂叫嚣“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加紧调动军队向我陕北根据地进攻。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系蒋匪五十岁生日，国民党政府掀起了一个所谓“购机祝寿运动”，大肆搜刮，为蒋匪歌功颂德。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使下，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由反动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出面招集上海电影界人士，策划进一步扩大“购机祝寿运动”，会上决议由黄金荣主持推动在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游艺会演（见附件一）。上海文艺界右翼，随即发起了一个“上海电影界购机祝寿游艺大会”，组织一批电影界人员，于九月二十七日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将所得票款献给蒋匪“购机祝寿”。在演出人员中，有以后成为戴笠小老婆的胡蝶，以及以后堕落为汉奸演员的袁美云、韩兰根、龚秋霞等。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两天上海《大晚报》刊登广告，明白标出“开幕时全体登台合唱党歌（国民党党歌）”，鼓吹“电影界总动员”，“献机以厚国防”，并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空前盛举”，竭力向蒋介石献媚。蓝蕪（江青）参加了演出独幕剧《求婚》（见附件二、三）。

二、一九三六年春，四条汉子之一夏衍推行王明路线，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抛出了卖国主义的反动话剧《赛金花》。当时，周扬曾大肆鼓吹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最中心的主题”（《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吹捧《赛金花》“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论现阶段的文学》，《光明》第三期）。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尖锐地予以痛斥：“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且介亭杂文末编》）据当时报刊记载，江青在业余剧社参加《赛金花》演出，在这个卖国主义的剧中扮演一个妓女（见附件四、五）。另据当事人现在揭发，江青为和另一个演员争当赛金花主角，相持不下，最后该剧社的《赛金花》因此未能演出。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时党委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从略。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梁 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神州悲痛极，环宇齐悼念。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乌苏里江的北国前哨，到南海诸岛的椰林渔乡；从青藏高原的大寨式农田，到英雄的唐山开滦煤矿，悲壮的哀乐声，雄伟的《国际歌》，和高昂激越的《东方红》伟大颂歌，传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激动着八亿人民的心。

在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庄严时刻，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大革命，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进入低潮的严重关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危急时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新的局面，迎接了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高潮的到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顶住了交枪投降的逆流，批判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运用“三个法宝”，领导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

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这个重大课题。当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驱散乌云和迷雾，拨正航向，使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空前提高，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永远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袖的时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总是始终不渝地在‘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99页）而当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他们不但“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203页），相反，却扯起修正主义的黑旗，终于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际上修正主义逆流猖獗一时，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列宁说过，修正主义的特征是“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黑《修养》中，不是在装模作样地引用列宁的话时，居心险恶地剽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吗？叛徒、卖国贼林彪不是把“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的黑话奉为座右铭，公然抛出“称天才”的语录，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吗？自诩为“天才理论家”的政治骗子陈伯达，不是惯于动不动抬出什么“第三版”来吓唬人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以后大刮右倾翻案风，从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条，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授意下炮制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总纲》中，更是集卑

劣手段之大成，肆意歪曲马列和毛主席的话，以达到其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的罪恶目的。我们只有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方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破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鬼域伎俩，看清他们的实质，坚定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党组织来贯彻的。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都是三千万党员，八万万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按不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求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因此，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必然要触犯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拚死抵抗。“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当前，在国内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抓住要害，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的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提高百倍的警惕，坚决粉碎敢于入侵之敌。

前面的征途上尽管还会扑来阵阵邪风恶浪，还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坚定地执行毛主席既定的革命政策，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宏伟蓝图。过去，我们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继续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定会夺得更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主席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谆谆告诫全党：“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在关于

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经过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八亿中国人民，是毛主席在长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用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亲自哺育起来的英雄人民。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所进行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它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亲自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考验，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这是继续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的有力保证。

一百多年前，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是两个青年的时候，面对着资本和王冠统治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们就用《共产党宣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一九一八年，在那四个帝国主义强盗妄图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豪迈地指出：“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今天，在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亿万革命大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永远沿着毛主席既定方针指引的方向前进。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

目 录

- 一、上海市委办公室招待处揭发“四人帮”王洪文吸工人血的罪恶……………（1）
- 二、王洪文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4）
- 三、张春桥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的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5）
- 四、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
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8）
- 五、张春桥写的一首反动诗……………（12）
- 六、张春桥早就是地道的投降派……………（14）
- 七、廖汉生、詹大南同志在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上揭发张春桥的罪行……………（18）
- 八、江青投降主义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
——吹捧投降派宋江是“英雄人物”……………（19）
- 九、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
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21）
- 十、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43）
- 十一、清华大学学生揭发江青写黑诗为复辟阴谋制造舆论……………（50）
- 十二、江青两次来大寨干了些什么？（王金籽）……………（51）
- 十三、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侯隽）……………（56）
- 十四、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 **七条**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60）
- 十五、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68）
- 十六、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80）
- 十七、天津市委召开声讨“四人帮”大会 小靳庄等单位代表揭发
批判江青的反党罪行……………（81）
- 十八、吉林省委常委揭发江青扼杀《创业》和去年在大寨的反党言论……………（83）
- 十九、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洋奴（中共国家计委核心小组）……………（85）
- 二十、“四人帮”在上海大量选拔培植亲信阴谋篡夺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权……………（87）
- 二十一、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操纵舆论工具，宣扬
《按既定方针办》的一些情况……………（90）
- 二十二、徐景贤同志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摘要）……………（95）
- 二十三、迟群传达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的电话“指示”……………（99）
- 二十四、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
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件）……………（100）

二十五、迟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以上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	(105)
二十六、迟群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07)
二十七、迟群给毛远新的信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110)
二十八、上海市委一些人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初步调查.....	(112)
二十九、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118)
三十、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	(146)
三十一、张春桥疯狂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的铁证.....	(152)
三十二、关于张铁生试卷的揭发材料（附 张铁生给辽宁兴城考区领导的原信）.....	(154)
三十三、关于江青一九三六年为蒋介石“购机祝寿” 演出和争演《赛金花》主角的揭发材料.....	(156)
三十四、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57)
三十五、上海工交口干部揭发“四人帮”利用七月的计划会议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 1976.11 [附：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下午] (辽宁揭批查材料, 1976.12.12)	

• 供批判“四人帮”参考 •

5-1-3

上海工交口干部揭发“四人帮”

利用七月的计划会议向党

猖狂进攻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上海工交口干部揭发“四人帮”

利用七月的计划会议向党

猖狂进攻的罪行

在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工交口的同志揭发批判“四人帮”及马、徐、王和黄涛，在今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

一、在会前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材料准备。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夕，王洪文打电话对黄涛说，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这几天那些大官们很紧张，已经是惶惶然。王洪文还告诉黄涛，政治局最近开会，谈到外贸积压问题，要黄涛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作为反革命进攻的炮弹。黄涛当时说，外贸方面材料，马天水已经要财贸组在准备了。在准备会议材料过程中，黄涛多次歪曲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讲什么“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管理难道只是指工厂、企业的管理吗？管理也包括工业管理、经济管理嘛！”又说：“管理也是社教，社教不能依靠他们，工业管理、经济管理也不能依靠这些人！”公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同志。很清楚，他们就是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

接着，黄涛要工交口各组搞材料，准备进攻的炮弹。同时召集一部分基层同志开了几个会，搜集国家计委和各部的材料。最后形成二十份材料，涉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十二

个部委。

在这次会上，怎样进攻，打哪一个部，拉哪一个部，打哪一些人，拉哪一些人，马天水也是有交代的。有一次黄涛从康平路回到工交组，他说：“根据马老意见，这次放炮，不能万炮齐发，还要做工作。”“有些部如××部、××部、××部，政治倾向还可以，要争取他们，矛头主要对国家计委，还有外贸部、交通部等。”

又说：“就是对国家计委，对有些同志也要做工作。”还讲：“在发言中要有几处提到周总理的指示，以免人家讲上海反总理。”

二、在会议期间，黄涛到处串连，煽风点火，发动进攻。

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多次与黄涛密谈，还在黄涛房间里找辽宁省委书记和大连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个别谈话。黄涛同辽宁、吉林有些人来往最多，而且行动鬼祟，极不正常。有一次，黄涛同一个省委书记见面讲话以后，说：“我同他在一起走，目标大，很显眼，不方便。”一语道破他们作贼心虚。还有一次，吉林的一个人来找黄涛，黄涛不在，同上海另外一个同志谈了一下。黄涛回来以后，专门把这个同志找到外面去个别问：他来讲了哪些话？他们之间的联系生怕别人知道，也怕上海小组的同志知道。

经过串连，黄涛和他们几个人都在会上抓住“务虚会”、计划会的问题，矛头直指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

在会议期间，黄涛还根据马天水的黑指示，策动一些部的领导同志配合他进攻。比如：对某部的一位部长，黄涛多次和他个别谈话。开始那位部长的发言，没有提到“务虚会”、计划会的问题，黄涛要他从这两个会开刀。有一天早上，这位部长又到黄涛房间里来了，黄涛说：“部长啊！你要讲了！”那位部长回答说：“是啊，

我是要讲了。”那位部长当天就发了言，大讲“务虚会”、计划会的问题。

又比如，对另一个部的一位副部长，黄涛对他是先打后拉。先是在华东组会议上批了他，压了他。接着又在走廊里个别谈话拉拢他，说什么：“你们部的问题，也不都在你们嘛！你也可以讲嘛！”挑动他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进攻。

黄涛还策动另一个部的一位副部长。黄涛说：“这个部政治倾向还可以。”专门打电话到这个同志家里，煽动他发言进攻。后来，这个同志发了言，但没有照黄涛的调子讲。黄涛很不满意，很反感地说：“不知道他讲什么，稀里糊涂的！”

对华东几个兄弟省的同志，黄涛更是亲自出马，进行串连，煽风点火，要他们从今年年初计划会议入手，进行所谓揭发批判。有一天晚上，他说，明天发言，可以从计划会议入手，我已经对江苏、浙江讲了。他并要上海的其他同志跟山东、安徽讲一下。后来，华东六个省的同志没有一个上黄涛的当。

黄涛还策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一些同志攻计委、建委领导同志。黄涛指使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去找计委、建委机关熟悉的同志谈谈，一面摸摸机关批“条条专政”的情况，一面策动他们起来向计委、建委领导同志开炮。先后找过生产组、办公室、技术室的同志，对他们讲：你们了解情况多，为什么不揭发？要敢于斗争嘛！

但是，部、兄弟省、计委、建委机关的同志，绝大多数人没上他的当，只有极个别的人跟他跑。黄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拿出最后一着，下令上海代表人人上阵。对发言攻得凶的，他当晚表

扬，火力差的就批评。结果是一家独唱，十分孤立，不得人心。

三、编造谎言，发动猖狂进攻，在阴谋败露以后，王洪文、张春桥暗中指使黄涛退却。

黄涛在会上开始气势汹汹，编造了一个大谎言，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出自国务院务虚会，又胡说什么：搞“条条专政”的就是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他还诬蔑国务院、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和邓小平右倾翻案“大合唱”等。他的恶毒发言，一下子就被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抓住了。他的发言，简报没有发。那几天，黄涛象热锅上蚂蚁，内心非常惊慌，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马、徐、王策划的阴谋败露。

正在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王洪文窜到京西宾馆，黄涛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处听到有一份计划座谈会简报增刊（专送政治局领导同志的），连忙取出来叫人核对，看有没有被删掉什么，并且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又取来一份增刊。经核对，就是他讲话的原文。他问王洪文，对他的发言有什么意见，王洪文阴险地说：“我不发表意见”。妄图掩盖他指使黄涛发动猖狂进攻的罪责。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政治局听取了计划会议情况汇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王洪文打电话给黄涛，说简报还是要出的，但是“风源”是国务院务虚会和“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这两段要改。王洪文还说：“这个意见是我和春桥商定过的。”黄涛后来又专门打电话问王洪文：是“风源”两字要改掉，还是整个“务虚会”这一段都不提。王回答说：“全部去掉。”于是黄涛立即照办。可见黄涛在计划座谈会上的进攻和退却都是与“四人帮”共同策划的。

四、在会议结束以后，黄涛秉承“四人帮”的黑指示，继续

坚持反动立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七月三十日晚上，华国锋同志接见会议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会后，上海代表整理记录，准备回来传达用。黄涛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以后，恶狠狠地说：“整理它干什么，你们好好动动脑筋，这里面有文章。”又说：“对这次会议你们要好好想想，我看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

黄涛回到上海以后，在向市委常委汇报时，继续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会议开了半个月，打了一个回合，是一场攻防战。”指责许多部委和兄弟省市的发言，是“奉命的官样文章，很不象样”。攻击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同志是“风头上想滑”。吹嘘自己的发言，“把一潭死水，冲击了一下，搅搅混，起到了一定影响”。他还恶毒地说，这次会议说明“批邓的阻力很大”，“很难设想，追随邓小平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那些人，能掌握起批邓斗争的主动权”。他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华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新华社赴沪记者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供批判用

杨春甫在全国计划 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杨春甫谈务虚会等问题

七月十九日下午，杨春甫在东北组会上作了近三个小时的发言，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要点如下：

一、这次座谈会不是普普通通的会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这次座谈会，是在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央发表了两个决议的形势下召开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会看成是普普通通的会。按照批深、批透、批臭的要求，会议还仅仅是开始。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针，一定要把会开好。

二、走资派就要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找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啊？走资派在哪？就在我们这些人中找。领导权要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大队、公社一级问题不大，县一级问题就大些，一个省被走资派掌权，问题更大了。国家机关和中央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掌握，那就关系到党变修、国变色的问题，我们能不关心吗？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工农兵跟的最紧，越是上边越是疲疲踏踏、马马虎虎。我们与邓小平作战，对负责干部，对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老同志提意见，不是要打倒谁，重要的是分清路线

是非，互相关心。特别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工农兵和小官们就拥护，大官们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受。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中央各部门怎么样？我觉得吹捧邓的谣言非常之多，美化他，说什么“还是他的经验多，他能做工作，他能抓大问题”。吹邓的空气，在七、八、九月之前就有了，七、八、九月就更浓了，全国计划会议时达到了高峰。这不是说明邓在党内有市场吗？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邓的影响如果不大，能出个天安门广场事件吗？不是说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吗？可是问题就发生在毛主席身边，我们怎么能放心！天安门广场事件被粉碎了，但问题并没有完。现在的形势对资产阶级不利，资产阶级处于防守。他们在那里调整力量，窥测方向，到一定时候，是会重整旗鼓的。现在邓小平下台了，我们要考虑，会不会有人给邓翻案？吹捧邓，跟着他闹腾的大多数是有权的。现在在相当一部分人思想并不那么通，看到形势不利，不轻易讲话，“一慢二看三通过”，当不倒翁。阶级斗争复杂，就在这里。

三、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务虚会后很快就出了个二十条、十八条，比科学院“汇报提纲”尖锐得多，邓小平复辟翻案的东西都在里边。这个黑标本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计划会议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案、搞复辟

的高峰。计划会议那一套如果灌下去，还乡团就都回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文教战线盘根错节，顷刻瓦解，但经济战线根深蒂固。计划会议就是掩护邓小平打退却战。当时说，长期规划送上，主席看了，先让按草案执行。还说，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政治局同意，就等主席划圈了。那个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大家提了那么多意见，听了没有？中央打了招呼，会议把我们这些人装在口袋里，一直到二十三号文件下来，才匆匆传达了一下，而且只向各省负责人传达，不向到会的其他人传达，为什么这样守口如瓶？计委领导为什么这样处理，封锁中央消息？《十大关系》（修改稿）为什么不拿出来，《二十条》为什么不拿出来，协作区的问题为什么又无声无息？会议不是揭露邓小平的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掩护邓小平打退却战。计划会议后期，为什么对任丘油田那么大的兴趣？是不是搞大进大出，石油出了缺口，拿这个来给邓小平打掩护？这个会开得头疼死了，大家都要骂娘了，可就是不散，把我们这些人拖在这里，为邓小平打掩护。

杨春甫最后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注：这个材料是鞍山市委第一书记沈越同志最近去北京汇报工作时带回的影印件原文）